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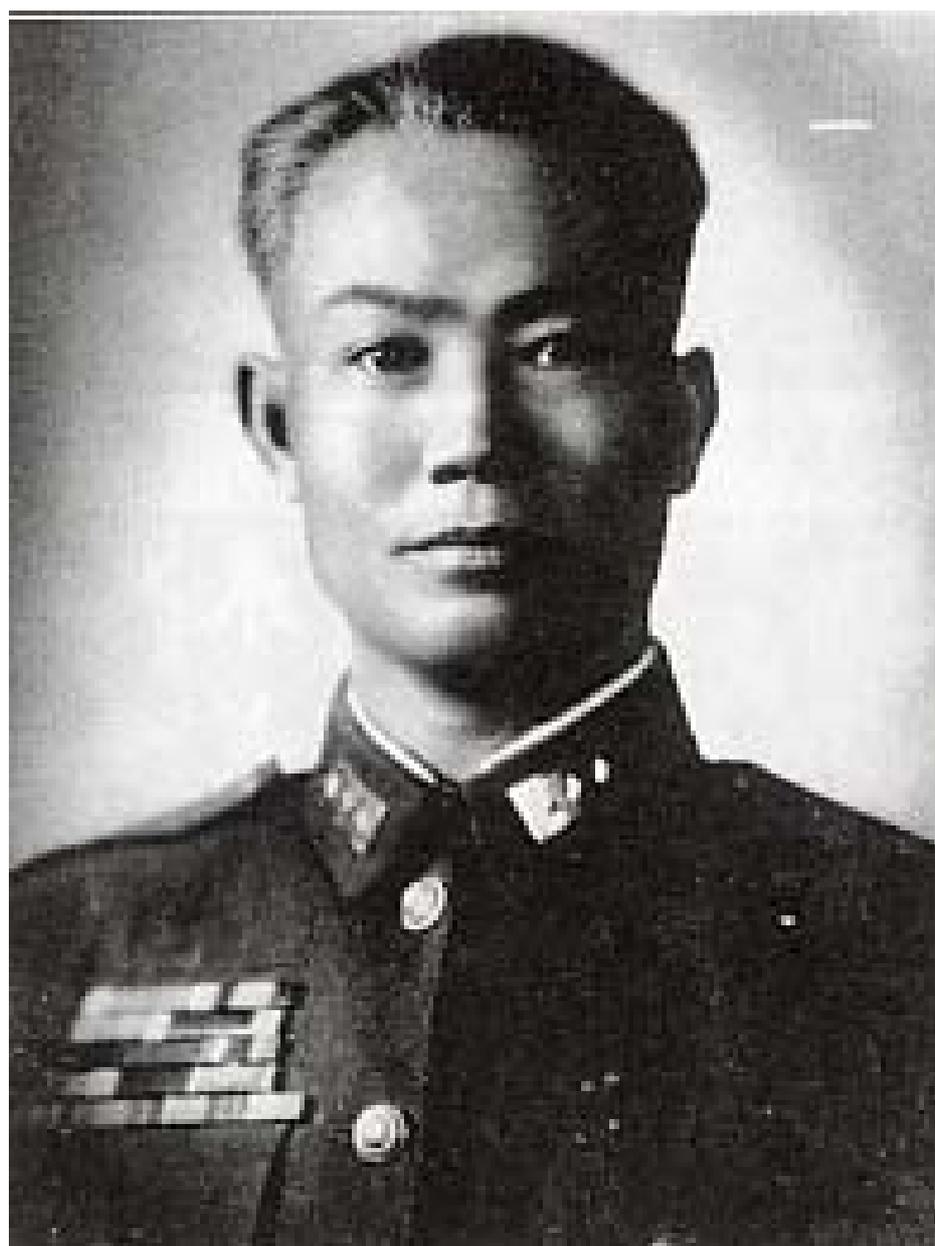
陳誠先生回憶錄

國共戰爭

國史館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初版

析世鑑製作組網際網路首發



辭修同志 千古

光復志節已至最後奮關闕頭
那堪弔此國殤果有數耶

竟忍奪我元輔豈無天乎
革命事業尚在共同完成階段

蔣中正手執

第一部 剿 共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節 共黨爲患的由來

歷代都有匪患，其爲禍之烈，雖在婦孺亦耳熟能詳的，在唐爲黃巢，在明爲闖獻，都曾創造過空前未有的記錄。然以與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以來的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下「中共」或「共黨」）相較，可就都望塵莫及了。共黨已經和仍在製造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他們爲害中國乃至爲害人類的程度，將不止是空前的，而且可能還是絕後的。

共黨就是由蘇俄領導的共產國際在中國一手製造的一種匪患，因其曾自稱爲「中國工農紅軍」，故又可名之曰赤匪。

共黨爲患，始於十六年他們在南昌發動的「八一暴動」。而中國之有共產黨，則始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從一開頭它就是接受俄帝指揮的一個出賣民族利益的組織。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國父倡議容共，何嘗不知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之不能相容，不過容共並不是容納共產主義的意思，更不是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意思。當時李大釗提出共產黨徒加入本黨的申明書中說：「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

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見容共是容納共產黨「人」之加入本黨，亦「歸斯受之而已矣」之義，以國父之寬容大度，對於「人」是不曾有所歧視的。至於一經作了共產黨，便不復再有人性，這豈是國父當初始料之所能及？再則國民革命發軔之始，倍受英、日殖民主義者的重重壓迫，爭取國際上的援助與同情，乃當時革命形勢之絕對需要，剛好俄國此時再三表示他們願意援助中國國民革命的誠意，則國父聯俄容共政策的確立，正是客觀形勢必然的歸趨。後來俄帝猙獰面目之逐漸暴露，還是共產政權罔顧信義缺乏人性的一種表現，但這不是任何人所能前知的。所以根據軍後的成敗，來評論事前的得失，未有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

共產黨徒以個人名義加入本黨之後，立即展開挑撥離間的分化作用，於是乃有「左派」、「右派」、「中派」等等名稱出現。在「革命的向左轉」的口號之下，共產黨在本黨陣營中已隱然露出他們的本來面目，不過共產黨的招牌還沒有公開掛出來罷了。「八一」南昌暴動是羅明納茲（史達林派來中國傳達他的命令的人）策動，賀龍與葉挺執行的。（賀龍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葉挺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燒殺劫掠之後。南竄廣東，於潮汕一帶遭國軍痛擊，被各個擊破，殘部由朱德率領，流竄湘南。

南昌暴動失敗後，共黨偽中央又發動湖南「秋收暴動」，由毛澤東率領農軍團及叛變之武漢警衛團，兩次圍攻長沙，均遭失敗，乃收集殘餘四百餘人，竄至贛西邊境寧岡縣屬之井岡山落草。

十七年（一九二八）春，朱德在湘南落腳不著，亦率所部至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是年五月，始正式以朱毛兩部約三千餘人成立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十七年七月，彭德懷、黃公略兩叛部（原屬第八軍）亦來井岡山入夥，又合組為偽紅軍第五軍。彼等先後攻陷江西之永新、蓮花、寧岡、遂川，及湖南之茶陵、酃縣等地，勢張甚。但自十七年冬至十八年（一九二九）四月，中央令湘贛兩省駐軍進剿，井岡山被攻破。

共軍分竄贛南、閩西、湘西、鄂南各處，裹脅反而愈眾。十九年（一九三〇）一月朱毛先由閩西回竄贛南。是年七月彭德懷曾一度攻陷長沙。朱、毛、黃等共黨首領，遂廣集散部，擴編為三、四、十二各軍，改稱偽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渡贛江而西，與彭德懷會師於瀏陽。十月再犯長沙，不克，除留孔荷寵一股於湘東外，餘皆竄贛，與朱、毛等分而復合。

十九年（一九三〇）冬，中央以擴大會議之亂已定，恐江西共軍坐大，勢將燎原，乃大規模派軍進剿。採圍攻戰略，是為第一次圍剿。圍剿軍共四個師，以張輝瓚之第十八師為主力，分途進擊，適為共軍集中兵力突破一點之戰術所乘，十八師失利，張師長被俘殉國。其餘各師均敗。是役除損兵折將外，還給共軍補充了四千多枝槍。

二十年（一九三一）五月，政府決以重兵作第二次之圍剿，我所部的十八軍就是從這次開始參加剿共戰役的。六月二十五日我受任為剿共進擊軍第二路指揮官，二十八日率部自臨川出發。時共軍主力，正擬竄擾閩西，我軍乃急於七月十二日，抄出廣昌以南之文會，自後予以痛擊，俘獲甚眾。越數日，克黎川，與駐閩友軍取得聯絡，雙方夾擊，共軍到處奔竄。我軍由黎川經廣昌、寧都、興國、富田、東固，轉戰千里。共軍以埋伏躲藏之法，時隱時現，無法捕捉其主力而殲滅之，然已使其不勝疲敝與驚慌。會石友三在浦口叛變，本軍奉委員長電令星夜西進集中吉安，待命策應全局。時友軍公秉藩、王金鈺部均為共軍所乘，第五師師長胡祖玉陣亡，於是廣昌、石城、寧都、瑞金、雩都、建寧、泰寧、黎川等十餘縣，均入共軍手中。是為第二次圍剿。當本軍奉調吉安之際，南昌行營何兼主任敬之（應欽）命令說：據報共軍已南竄，著該軍南下跟蹤追擊，同時總指揮蔣銘三（鼎文）卻電告說：現共軍情勢不明，請兄部就地待命。時友軍朱一民（紹良）在南豐，與共軍正接觸中，希望我東進夾擊，湊趣的是陳銘樞亦於是時來電說：共軍有進擊十九路軍模樣，希望我北上與該軍協作。本軍

行止至是有東西南北進和就地不動五種歧途，可見當時情況之亂。此亦剿共軍事中一段有趣插話也。

二十年秋，政府徵調大軍進行第三次圍剿。共軍知我軍交通困難，補給不易，利在速戰，以「堅壁清野，避實擊虛」為計，不與中央軍主力接觸。我軍正在捕捉其主力予以聚殲之際，適「九一八」事變發生，剿共軍事，又因之暫歸停頓。時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駐守寧都，孫因事不在軍中，其參謀長趙博生固共產黨徒也，乃利用機會，一面勾結共黨，一面煽動所部叛變。旅長季振同及董振堂，均為所惑，旋即一同叛投共軍。共黨中央收編叛部成立第五軍團，轄三個軍。即以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董副之；並以蕭勁光為軍團政治委員，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據共黨機關報《紅色中華》第二期所載，共黨此次獲槍兩萬餘枝，兵員一萬六千餘人。於是赤燄益熾，攻贛州，陷南雄，占領漳州，幾有不可復制之勢。斯時贛南閩西二十餘縣，盡為共軍所據。彼等顧盼自雄，遂於十一月七日蘇俄十月革命紀念日，在瑞金葉坪召開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政綱、憲法、土地法、勞動法、紅軍問題、經濟政策等重要法令，並頒布之。同時宣告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成立。定瑞金為偽都，改稱瑞京，設偽中央政府於此。

此次偽大會選舉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盧福坦、朱德等六十三人為共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以毛澤東為主席，項、張副之。該會下設人民委員會，為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行政機關，亦以毛為主席，項、張為副。此外以王稼穡為外交人民委員，朱德為軍事人民委員，項英為勞動人民委員，鄧子恢為財政人民委員，張鼎丞為土地人民委員，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周以栗為內務人民委員，張國燾為司法人民委員，何叔衡為工農檢查人民委員。中共「國」由此正式開鑼，共黨為患由此更一發而不可遏矣。

綜上以觀，共黨之爲患是在國民革命軍旗幟下寄生長成的，是由剿共軍的補給壯大的。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當然共產黨是禍患的中心領導力量，但沒有武裝的共產黨，只能在言說文字上搗亂，除淆惑觀聽外，尚難成爲大害。共產黨而擁有武裝，於是爲虎傅翼，出而食人，遂成爲無可避免的後果。

不過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的道理，我們尤不可不加以確認。中國自清季以來，民生凋敝，政治腐敗，都到了極端嚴重的地步。民國肇造，一開始就付託非人。袁世凱以一代權奸而爲開國總統，他自己先道德破產，則由他所領導的政府，由他所發動的政治，如何能不成爲一團爛污？因而繼革命的軍事破壞之後，又加上他的人心破壞，遂使民生國計，較之清末，尤有江河日下之勢。當時顯著的現象是：

既得權益階級驕奢自恣，荒淫無恥；

被擯棄的大眾，淪落失所，甚至飢寒交迫；

外侮憑陵，內亂時發，國幾不國。

以上三種現象，互相激盪，就產生以下的結果：

被擯棄大眾之有知識者，有的就想做黃巢、宋江，有的就想做高不危、牛金星，其椎魯無識者，可以投軍爲兵，也可以入夥爲匪，反正吃飯要緊，什麼叫兵，什麼叫匪，還不都是那麼回事。歷代大亂，無不起於飢民和淪落失所的知識分子之眾多，往事歷歷，可覆按也。

所以共黨爲患，直接原因是共黨攫奪武裝的成功，間接但是基本的原因，卻是由於若干年來的政治敗壞人民失所。履霜堅冰至，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第二節 共黨爲患的慘烈

世稱黃巢造反，曾「殺人八百萬，流血三千里」，考之正史，此說並無所據。惟黃巢殘忍嗜殺，則是千真 萬確的事實。楊復光陳破賊事狀，說巢賊「物無不害，惡靡不爲」，已可見其爲禍之烈於一斑。

闖獻荼毒生靈，距今不過三百餘年，仍爲家喻戶曉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園尚存有張獻忠所書之「七殺碑」，其文爲：「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殺！」以殺人爲報天養人之法，是何理性？真是匪夷所思。

共黨以流寇方式起家，對於歷代流寇，尤其是黃巢闖獻，素極奉不崇敬，大有奉爲「先賢」、「先烈」之意。其實他們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他們這三十年來在中國所造的孽，雖起黃巢闖獻於地下，當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大陸淪陷之初，港澳及各地華僑，對於共黨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謂大有人在。然而僅只一兩年的時間，人心爲之大變，希望破滅了，完全變成絕望，好感消失了，完全變成咒詛。至今無論海內外的中國人，除去已失人性的共黨中，形成「新階級」的人物外，對於共黨不存「時日曷喪，與汝偕亡」之想的，可說不可能有這樣的人。

共黨僅僅在一兩年之間，使華僑對它的觀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由於他們太殘酷，使人人覺得在共黨統治之下，生命財產毫無保障，所以才毅然決然的摒棄了對他們的幻想。

共黨之嗜殺，不但數量上跨越黃巢闖獻，其手段之慘毒，也有非黃巢闖獻所能想望者。他們創造發明了許多酷刑，使受害者雖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來關於這類事故的報導，俯拾即是，我們不但不忍卒聽，而且也不忍備言。

單就殺人之多這一點來說，共黨所造成的紀錄，稱得起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江西剿共結束後，中外新聞記者到劫後共區從事實地調查者，頗不乏人，他們都很注意淪為共區之前和收復以後各地區人口的變遷，茲就手邊所有資料，摘錄數條如後：

一、黎川之新羅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後只存千人。

二、寧都縣城原有居民約二萬人，劫後只有八千人，約有一萬二千人被殺害。

以上兩條均見上海德文日報主筆 Mr. Simon Eberhard 所作〈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

三、南豐全縣原有人口十九萬餘人，現在僅存十一萬四千四百餘人，其中男子五萬六千餘人，女子五萬八千餘人。共區女多於男為極普遍之現象。

四、廣昌城外數里許一村莊，有一大屋，約三十間，謝姓。過去可斷為一大家，現則荒涼冷落，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則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歲之小孩，詢之則已二十二歲。又另一村家，則只有中年女子三人，並無男丁。

五、寧都全縣原有人三十四萬，現僅有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萬零一千七百餘人，女丁十二萬二千六百餘人。其中壯丁僅三萬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寧都縣屬之長勝圩，全圩面積約十餘華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餘，自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被共黨慘殺三百餘人，除裹脅以去者三百餘人，現僅存九百二十餘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壯丁僅八十餘人。

七、瑞金原為贛南最富庶之縣份，俗有種一年吃三年之諺，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黨占據時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復時止，原有之三十餘萬人口，被

殺三分之一，被脅迫以去者六千人，僅餘二十一萬人左右。尤以知識分子屠殺淨盡，辦理善後，亦難找得人才。

以上五條均見中央社特派記者鍾貢勛所作之〈江西農村視察記〉。

以上錄有的資料，雖殘缺不全，不足以見共區人口變遷的全貌，但舉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會有多大出入的。我們綜合起來看，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一、在共黨統治下的地區，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普遍的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總計以上七條所列原有人口為八十五萬三千餘人，劫後人口為五十五萬八千餘人）減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於屠殺。

二、共區人口普遍的女多於男，這純粹是人為的現象。因為男丁非被屠殺，即被裹脅以去之故。

三、共區因缺乏壯丁，勞動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園荒蕪，百業俱廢。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雖已年屆成人，而形態猶如兒童。

共黨由嗜殺而造成飢餓，由飢餓而促成死亡，也就等於慢性的屠殺。其被裹脅以去者，名之曰「工農紅軍」，其實是供給共酋人海戰術充當砲灰之用的原料，也還是一種變性的屠殺。所以共黨之殘忍嗜殺，實在已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

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為共黨，便如此嗜殺，而毫無惻隱之心？原因就是惻隱之心，是人性的一部份，故唯「人」才有惻隱之心。人人皆知共黨是唯物主義者，他們是不承認有所謂「心」的。他們認為「心」也就是「物」，人不過是血肉製成的工具罷了。所以把人用在經濟生產上，就是血肉的機器，把人用在戰爭作業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鞏固殘暴的統治上，就成了殺之以鎮猴子的雞了。總而言之共產黨統治政策的一個最大環節，就是屠殺，這是他們一了百了的得

意傑作。其所以敢於如此與古今中外一致擁護的「人道」觀念為敵，沒有別的憑恃，就因為他們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則他們認為屠殺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必要手段。換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產統治的成功，所以共產黨徒不願意放棄屠殺，正如他們不願意放棄統治和政權一樣。

列寧曾說過：「我們不曾在原則上拒絕過恐怖主義，我們也不能這樣。恐怖乃是一種軍事行動，可以加以有利的應用。在某些時刻，它甚至於是必要的。」

這話說的太技巧了。豈止某些時刻，恐怖主義是必要的。自始至終，恐怖主義和共產統治就沒有分過家。沒有恐怖主義，共產統治既不能出現，也不能持久。

邱吉爾的回憶錄上，記載他有一次問史太林：

「俄國在清黨期間（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有多少人被殺死或被永遠驅逐？」

「一千萬人！」史達林很坦白的回答：「這是很可怕的，……但這是必要的。」

以此類推，則大陸淪陷的初期，說被共黨屠殺的人民，有三千萬……之眾，不但不是虛報，而且可能還有不實不盡之處。

三千萬人的大屠殺，真是曠絕古今的一次大屠殺了。

黃巢闖獻嗜殺，並不諱言嗜殺，張獻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揚其嗜殺。唯共黨則不然，共黨殺人，明明是師承列寧、史達林的恐怖主義，以遂行其血腥的獨裁統治，卻往往飾詞造說以相掩飾，並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這種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殘酷，而且卑鄙。以視黃巢闖獻雖兇殘而尚能表裏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屬下下。

所以吳稚暉先生批評共黨，說他們「好話說盡，壞事做完」，最爲要言不煩。比起黃巢輩的「物無不害，惡靡不爲」來，可說是匪化的一種「大躍進」。

第三節 安內乎？攘外乎？

「九一八」事變，給中國帶來了空前嚴重的國難。消息傳出，凡有血氣的中國人，無不憤激萬狀，思與日人拚個你死我活，以紓國難，以雪國恥，就是不幸而戰死疆場，也覺得爲國犧牲，死得其所。

當時國內的情形，除少數地方割據狀態依然未能消除外，最使政府感覺成爲心腹之患的，就是共黨的日益猖獗。政府此時處境，有如內邪外感，交相侵逼，有醫國之責者，對此病國，究應如何治療？先除內邪？抑先祛外感呢？換言之，就是先攘外呢？抑先安內呢？

這的確是一個極端困擾的問題。

就激動的國民心理講，多主張不顧一切，先謀對外，應即全國動員，對日宣戰。

我當時就是這樣主張的一個人。我以身爲軍人，對於時局從不亂發文電，以譁眾取寵。這次受愛國心的驅使，復以軍人有「執干戈以衛社稷」的責任，遂不暇深思，於事變後的第四日發出一通養（二十二日）電，請纓抗日，其文爲：

（上略）倭寇兇橫，藉端啟釁，占我瀋陽，辱我軍民，猶復續開駐韓倭軍入境，節節侵迫，此種舉動，欺人大甚。凡屬國民，同深憤慨，國難之急，至今已極。亡國之慘，轉瞬即見。吾革命軍人，以打倒帝國主義爲職志，此而可忍，何以爲人！職等分屬軍人，責在衛國，願率所部與倭寇決一死戰，成敗利鈍，概不暇計。寧可致死於亡國之前，不願偷生於國亡之日。執戈待命，謹候明示。（下略）

我們的這一請求，當然未被政府接納。原因也很簡單。就因為我個人和我所帶的部隊，可以「成敗利鈍，概不暇計」，可是主持國家大政的人，就不能同我們一樣，也把國家的興亡成敗，作孤注之一擲。

政府是維護國運昌隆民生康樂的一種組織，它存在的意義，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故凡事要計策萬全，不能操切從事，更不能以感情或意氣用事。尤其對於敵國外患的戰爭行爲，關係著整個國家民族的成敗存亡，更不能不特別慎重。就原則來講，必須謀定而後戰，應當不打沒有勝算把握的仗。

《孫子·始計篇》云：「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就「九一八」事變前後之中日兩國形勢論之，中國爲積弱新造之邦，無論就政治、經濟、軍事那一方面講，都不是維新以來國勢鼎盛的日本的敵手。則中國忍不過日人的挑釁，貿然與之開戰，將無異以無算敵多算，這種戰則必敗的仗，自非到了山窮水盡絕對無路可走的時候，最好不要輕開。委員長於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於本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說：「和平未至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就是針對此種情勢而發的名論。委員長的這一申明，雖是在二十四年十一月說的，但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政府的對日態度，始終就都是以這兩句話爲內容的表現。

或者有人懷疑，日人處心積慮以謀我，固已匪伊朝夕，和平終必絕望，犧牲絕難避免，則與其將來開戰，何如即早開戰，與其將來犧牲，何如即早犧牲，免得受盡了氣受盡了辱，而仍無濟於事？這種看法，雖也言之成理，其實大謬不然。

因爲常識告訴我們：「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犧牲縱爲必不可免之事，然而多有一分準備，即可多得一分力量，多有一分力量，即可少受一點犧牲。當然大犧牲不如小犧牲，小犧牲不如不犧牲。不戰而屈人之兵，這種不犧牲而致勝的

戰爭，我們沒有資格爭取。可是減少犧牲的戰爭，我們就應唯力是視以爭取之。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都應當如此做。

對日戰爭減少犧牲的辦法，要而言之，亦不外集中力量一致對外而已。但力量如何才能集中？先剿平心腹之患的共黨斯可矣。力量集中之後，自能一致對外，當可無待坦言。而所謂先剿平共黨禍患云者，亦即本文所說的先安內是也。

早在萬寶山事件發動時（九一八事變前兩月），委員長即曾揭示過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他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故「攘外必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對於這項政策，持之益堅，絕不爲任何遊言浮語所搖動。他說明之所以亡，就亡於一方面既要禦侮，一方面又要剿匪的緣故。他勸說大家不要蹈襲明朝亡國的覆轍，一定先要除此腹心之疾的共黨，然後再齊一步驟，抗日禦侮，才有致勝的可能。他有幾句極扼要的話說：「大家都要明白，我們這次剿匪戡亂，就是抗日禦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沒有基礎。」這道理實在是推不翻的，使我這不勝一時之憤的人聽了，不能不爲之折服。所以也就暫時收拾起北上抗日之心，仍留贛南埋頭剿共。再說共黨是帝俄侵華的工具，在武漢政府時代，大家早已有此認識。則剿共也等於禦侮，不過不是來自日方的罷了。由此看來，安內攘外政策，絕非如李濟琛所說：「對外則虎豹股慄，對內則蟻蝨奮威」（參閱《平亂》第四章第四節），明矣！

事變發生之初，還有一種先抗日的理論，以爲中國內部的亂源，都導發於帝國主義的發縱指使，不直接打倒帝國主義，而日事討逆剿共，乃是捨本逐末。又說先求國內統一，肅清一切反動，而後始能打倒帝國主義者，是爲倒因爲果。我記得當時我也同意這種看法，於「養」電發出後，僅隔二日又發出一通陳述這種意見的電報。今日想來，覺得當日真是幼稚衝動之可笑。由於義憤填膺而請纓抗日，猶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應有之舉，至以打倒帝國主義爲先抗日的理由，是直以「無算」爲「多算」，拿

政治上的一句口號，當作軍事上「無敵於天下」的憑證，豈非不思之至。「打倒帝國主義」這句口號，本是聯俄容共後的產物，蘇俄製造這句口號，用心至為險毒。因為當時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在落後地區，作惡多端，尤其是英國，近百年在亞洲劣跡昭彰，亞洲人民除少數為其所豢養的走狗外，無不銜之刺骨。如前緬甸總理宇素供詞之所說：「吾人寧相信吾人所稔知之魔鬼，而不願相信吾人所不知之天使」，此言可代表亞洲人民對大英帝國之感想為如何。蘇俄洞悉亞洲人民之心情，而又艷羨英帝在亞洲所獵獲的權益之豐厚，於是乘瑕蹈釁，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以鼓動亞洲人民反抗以英國為首的西方殖民政策，好藉便坐收漁人之利。所以「打倒帝國主義」，是蘇俄赤化世界的一大陰謀，但卻是因為英國之多行不義，才使蘇俄得到發展此項陰謀的良好機會。國民黨接受了這句口號，未嘗不知是上了蘇俄的當，但因革命環境之過於孤立，由於嚶嚶求友的本能要求，也就不能不互相唱和起來。及至為日既久，積非成是，幾視此一含有嚴重毒性的口號為一泛應曲當之口頭禪，人人如此，我一人又何能獨異。今日說起來，亦可見當日群言龐雜之一斑。若非委員長有真知灼見的領導，恐怕今日侷促台灣一隅的中華民國也未必存在。

兩廣當局以不抗日為反抗中央的藉口，就另外製造一種口號說：「在抗日的旗幟之下，方能統一軍令」，他們舉出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德意志的統一來作例子，說是先要打勝了外國，然後方能完成統一。姑不論他們口裏說的心裏想的是不是一回事，就說他們是心口如一的罷，可是這種論證，也跡近歪曲事實。我們知道德意志的統一運動，自一八三四年十七邦的開稅同盟，即已開其端。由於工業革命及俾斯麥的治國有方，才達成這一目的。他們早在對法作戰之先，即已完成政令軍令的統一，其所以一戰而勝者，就正是因為軍令政令先已統一的緣故。事實俱在，豈可隨便加以顛倒？

「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解釋，是說外侮來的時候，兄弟先要放棄鬩牆之爭，然後才能共禦其侮。未聞鬩牆之爭不息，同時仍能抵禦外侮者。所以軍政令不先統一，而能禦侮救亡者，此為古今必無之事。那麼先安內呢？先攘外呢？當然安內為先了。

先安內後攘外的道理，本極淺顯易明，在知識分子之間，但能平心靜氣的想一想，聽一聽，自能接受政府的領導，而不致橫生枝節。（當然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們，自當別論。）倒是非知識分子的士兵群眾，對此問題反而往往不易說服。「一二八」滬戰發生後，十八軍奉到命令馬上準備赴援。消息傳出，全軍歡聲雷動，至有如痴如狂者。可是正當準備出發之際，得到共黨有將躡我軍之後奪取贛州打通湘贛直搗武漢的計畫，當時贛省吉安父老集體向我請願不放我走，要我留贛繼續剿共，他們說：軍人以衛國為天職，如果人民都被共黨屠殺光了，縱能衛國，但於吾民何益。我允將此意轉向中央請示。其時委員長已下野，中樞政務由孫哲生（孫科）先生及陳銘樞等負責，給我的覆示是「請兄相機處理可也」，這是讓我自作主張，我應當怎樣決定呢？全軍奉命抗日，士氣之盛，已達極點，一旦改變命令，仍留贛剿共，軍心沮喪，可想而知，剿共亦將難以達成任務。不過當時共軍圍攻贛州甚急，危如累卵，贛民環列請留，情詞迫切，事實上亦不容棄置不顧。在無可如何之下，我只得親赴各軍，將共軍攻贛陰謀，詳予解釋，並告以剿共即為抗日初步之理，士兵心理始略為緩和。他們轉念不能如願抗日，完全是因為共黨扯後腿的原故，於是把滿腔義憤，都拿共軍作為發洩對象，這才解了贛州之圍。說起來好笑，當我們好不容易說服了士兵剿共應先於抗日之際，無奈既無餉又無糧，部隊無法開拔。我們請中央發餉，中央沒有錢，向江西省政府挪借，以省庫空虛，也籌墊不出，要我們向地方直接籌派。我向官兵徵詢意見，大家一致表示寧可窮困而死，也不向人民要錢。正在無計可施，幸虧委員長以在野之身，商請浙江省政府籌借五萬元給我們，才得濟一時之急。餉的問題解決了，糧還是沒有著落。經查泰和縣存有軍糧，因電請南昌行營飭撥救急，不料奉覆不准。部隊怎能餓著肚皮打仗？再電呈行營部隊斷炊情形，請權准動用泰和存糧，這才解決了糧的問題。但每一官兵所能發給的亦僅敷十日之用。在這種七拼八湊之下，十八軍幸而不負民眾的期望，一下子就把犯贛的共軍擊潰。共酋彭德懷僅以身免，他的三個師長一被俘、一負傷、一被擊斃，其餘共軍官兵傷亡被俘者無算，幾於全軍盡墨。假使當時補給充

足，我軍乘勝窮追，必可斬盡殺絕，消滅了無窮後患。這一仗可謂大獲全勝。但我們事後想來，我們當時轉移抗日的軍心而為剿共，也未寧不是捏著一把汗幹的。

「七七」全面抗戰發動以前，「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在這當中將近六年的期間，大局危疑震撼，人心撲朔迷離，實在是中國朝野極端苦悶的一個時代，其所以然之故，就完全由於「先安內？先攘外？」這一問題的存在而使然。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而在內外夾攻之下，有時亦不能不兩面應付，以致有顧此失彼之虞。否則江西共黨之為患，又何致勞師數年需要五次圍剿之多？我們身當剿共之衝的將領，當時處境，最為狼狽，因為先安內後攘外，是純理性的主張，而先攘外後安內，則是偏於感情的想法。用理性剋制感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當時一般自命以及為共黨捧昏了頭腦的所謂進步分子，以指責政府不先抗戰為自我標榜之捷徑，影響人心極鉅。尤其是頭腦簡單的我們軍人，要想轉移我們先抗日的心理，使其不得效死於長城大漠之間，而葬身於深山窮谷之內，其為難於說詞，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們在江西幾年剿共，真是心力交瘁，無以復加。然而今日結果怎麼樣？江西逃亡的殘共竟已成了大陸的宰制者，我們剿共同志的血白流了，汗白出了，力白費了，這是死也不能瞑目的事。在反攻復國大業完成之先，我們後死者的責任是交代不下去的。

第二章 江西圍剿

第一節 贛南成為共黨根據地的原因

共黨禍國，經其竄擾的地區，在抗戰以前，已有浙、贛、閩、粵、湘、黔、川、鄂、豫、皖、陝、晉、綏、寧等十餘省之多。然而盤據最久，為害最烈，且建立偽中央政府，擅設首都者，則只有贛南一地為然。

他們為什麼選定這個地方作為他們主要的根據地？當然不是偶然的。

第一因爲地理環境關係，贛南位於贛江上游，地勢高峻，山嶺重疊，交通極爲不便，這是打出沒無定的游擊戰最理想的地帶。共黨最擅長的就是打游擊戰，所以他們選定了贛南作主要根據地。

而且贛南的經濟條件也很優越。贛南雖然山多，但因侵蝕年久，山間溪谷，多沖積成局部平原，頗適宜於耕種。前章提到的瑞金，就是「種一年吃三年」的好地方。其他各縣雖不都和瑞金一樣，可是出產的種類數量，都很豐富，維持一個經濟生活自給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所以他們就看中了贛南。

第二因爲政治環境關係。江西政治環境最利於共黨發展，其故有二：

一、江西東面的福建，十九路軍駐入以前，政府於此素乏經營，十九路軍駐入以後，即逐漸反動，爲政府之患。江西南面的廣東，形同割據，反抗中央，固已匪伊朝夕。江西西面的湖南，與政府同床異夢，於共黨亦無所害。故共黨據贛南，所慮者惟北面耳。

二、民國以來，江西遭受軍閥的摧殘，爲各省之冠。北伐成功後，人民對於改善政治環境的要求很高，希望非常之大。不想當時國家統一徒俱虛名，軍閥割據，內亂迭起，政府對於改善地方政治，有心無力，贛南山鄉遼遠，遂致更成化外。人民的希望破滅了，在艱苦中掙扎生活，似乎毫無出頭之日。這種環境，是共黨最易欺騙民眾的。所謂貧窮是繁殖紅色細菌的溫床，就是這個意思。這是共黨看中了贛南的另一原因。

第三因爲人口稀少。贛南自昔以來就多匪患，人民不能安居樂業，所以地雖富饒，但戶口並不繁密。洪楊之亂時，居民死難逃亡者極衆，人口愈益減少。事定後，經過十年來的省外移民，人口稍稍繁殖，但是比較起來說，仍是人口稀少的地區。共黨擁有龐大的軍隊，最爲困難的問題就是補給。既要建立一個根據地，就不能流竄就食，

而須取給於當地。當地如爲貧瘠之區，自屬無法供應，如爲富饒之境，則不但人口密集，且必爲重兵駐屯之祈，如何容得共軍竄擾盤據？剛好這時有一個富而不庶的贛南，爲政府注意力之所不及。共黨如選中了這個地方作根據地，大可不費吹灰之力而得之。天下有這樣的便宜事，他們當然不會放棄它了。

第四因爲是軍事上的形勝之地。江西爲長江流域軍事上的樞紐省區。對蘇皖而言，位居上游，自爲兵家所必爭。就兩湖而言，位當中流，上下左右，亦有舉足輕重之勢。故江南用兵，未有不爭江西者。明太祖與陳友諒之決戰地點即在江西。戰既勝，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虛直搗應天，大勢去矣。」可見江西對下游的重要性。太平天國之亂，爭奪江西的戰爭，也是非常劇烈的。鄱陽湖之戰，湘軍雖敗不餒，就因爲能守江西，則上可以安武漢，下可以窺江寧之故。國民革命軍北伐，攻略江西的戰爭，也是底定東南半壁的基礎。北軍之所必守，即革命軍之所必攻者也。共黨有鑒於此，故選定贛南作根據地，以爲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倘能攻取南潯，則問鼎中原，即不難左右逢其源。

此外贛南文化落後，風氣閉塞，人民對於是非邪正之辨，不大清楚。在暴力統治之下，易受愚弄，而難萌反抗的企圖，這當然也是最合共黨理想的地區。

再則朱、毛兩股勢力於十六、七年（一九二七、八）之交，竄擾廣東、湖南失敗後，殘餘力量無幾，不能更圖大舉。爲圖苟延殘喘，乃就近先在贛西邊境井岡山上落草，這可能是走投無路的一時權宜之計。所謂建立根據地的遠大計畫，此時也許根本談不到。既而乘著附近各縣空虛，攻掠頗爲得手，才發現贛南的種種優越條件，都是難得之至的。恰好進剿各軍又再三失利，這才引起他們建立基本根據地的企圖。如此說而是，則贛南之成爲共區，開頭也未嘗沒有偶然的成份。及至坐大以後，才又加進去選定的成份。這種看法，也並不悖離事實。

然則「禍患常積於忽微」，確為不刊之名論，而防微杜漸，始可弭患於無形。

第二節 剿共的政略

盤據江西的共軍，包括偽一、三、五、七等四個軍團，偽第十二軍，偽七個獨立師。偽江西軍區所屬各獨立團及地方武力等，合計約十餘萬人。其所盤據地區，合贛南閩西計之，最盛時期計三十縣。而我政府派軍進剿，前後歷時七年，動員兵力不下百萬。至終雖幸而犁庭掃穴，但仍未能絕其根株，致使長驅西竄，留下後來禍國的種子。

剿共軍事，勞師動眾，曠日持久，何以如是之難？記得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于役北平，在某一次宴會中，胡適之（胡適）先生即曾以此為問，我當時是這樣答復他的：

簡單的說起來，誠如貴本家胡漢民先生所說：「不是無能，就是不力」，但我以為天下事並不如此簡單。民國二十年以前，我未參加剿匪，可以置而不論。自二十年我率十八軍入贛剿匪以來，直到現在，實際經過情形是這樣的。二十年七月，匪軍受我軍壓迫，已如釜底游魂，而石友三之亂作，匪軍遂得苟延殘喘。同年九月，國軍再度進剿，十八軍已克瑞金，而「九一八」事變發生，剿匪軍事因而停頓。二十二年二月，再次大舉進剿，會日寇侵據熱河，進犯長城各口，國軍北調者多，匪勢乃益坐大。二十二年十月末次圍剿開始，在此期間內憂外患，較為緩和，國軍得以專心征剿，匪遂大潰。故剿匪軍事之長期頓挫，實因內憂外患交乘迭至之所致。

再則共黨是接受共產國際領導的政黨。他們有主義，有原則，有作法，無論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都各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我在江西剿共，前後數年，從共區搜集出來的文件，數量之多驚人。事平後加以整理編訂，成《赤匪反動文件彙編》六鉅冊，約一百一十餘萬言。可見剿除共黨，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十二月十日，中央召開第二次內政會議於南京。委員長曾於十四日出席該會致詞，發表幾點重要的意見，他說：

我們在國家這樣危急存亡的時候，當然要想事半功倍的方法來救我們的國家，要救我們的國家，最要緊的第一就是要「寄內政於軍令」。

又說：

現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候，想得到事半功倍的效力，就莫過於在移風易俗上下功夫。……救國最要緊的，不在方法而在我們本身，就是要能正我們的心，革我們自己的命。

「寄內政於軍令」的意思，就是打仗要打以內政修明為基礎的仗，才能有決定勝仗的把握。軍事是一回事，政治是一回事，軍事獨立於政治之外，將士浴血戰鬥於疆場，而官吏貪贓枉法於地方，則戰場勝利的果實，為不肖官吏腐蝕以去，打勝仗也還是要失敗的。所以政治才是根本，軍事只是枝幹，軍事行動的目的，最後還是政治。因此委員長才又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口號。就是說：剿共的力量如在軍事上用三分，在政治上就要用七分，然後剿共才易於成功，也才能達成拯斯民於水深火熱之境的目的。

說到移風易俗方面，委員長苦心孤詣，尤其認為是根本而又根本的工作。他在這方面的種種措施，不光是為了剿共，也是為了禦侮而作的精神準備。他於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一月三十日「剿匪要實幹」的演講中提到「攻心為上，攻城為次」的話，他說：「我們要攻敵人的心，首先就要把自己的心強固起來。」又說：「赤匪最怕的是我們中國固有的美德——禮義廉恥，而禮義廉恥，亦就是攻敵人之心的最好武器。」

總之，委員長所要作的移風易俗工作，是以正心爲體，而以恢復禮義廉恥之固有美德爲用的。我們可以說，早在三十年前，委員長已經主張「心理建設」。

委員長的心理建設之實施，可分兩方面來說：

一、推行新生活運動，以轉移社會人心

新生活運動始倡於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二月，其時委員長駐節南昌，指揮剿共軍事，故即以南昌爲推行此項運動之示範地點。委員長說：

我們現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爲一個復興民族的基礎。要達此目的，必須自江西，尤其是從省會所在的南昌這個地方開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舊佈新，過一種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講<新生活運動之要義>）

他又說：

新生活運動就是軍事化運動，軍事化運動就是要從日常生活做起，一步一步的確實做到「全國總動員程度」。現在許多人以爲知道了站隊、演操、托槍、射擊、跳高、跳遠就是軍事化，……但是軍事化最基本最要緊的條件，還不在乎技藝之末，仍在乎精神之本。所以第一要使全國國民能夠實踐禮義廉恥。……說到真正的軍事化，一定定要根據禮義廉恥，做到整齊劃一的程度，這就是軍事教育的精神和目的之所在。

（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講<新生活的意義和目的>）

所以新生活運動，就是復興國民道德的運動，也就是全國國民精神武裝的運動。果然全國國民都能「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則行同強盜的外敵，和行同禽獸的內匪，還能有存在的餘地嗎？

二、辦理廬山訓練，以轉移軍心士氣

剿共歷久無功，其原因除前面所述者外，剿共部隊良莠不齊，一般軍事幹部，有的缺乏勇敢犧牲精神，有的缺乏剿共戰術訓練，而最關重要的，還是一些部隊之紀律敗壞，不但不能為民除害，反而到處增加人民的痛苦，此為剿共困難之最大癥結。有少數不肖的部隊長，竟將由政府領到的軍費，私存外國銀行，卻說政府不發餉，以挑撥部隊感情使其叛離政府者，以故共區早就流行有「寧可給匪殺，不可給兵紮」之語，用這樣的部隊剿共，往往不免為共軍所剿，自亦無足為怪！

革命軍自北伐完成以來，士氣已漸呈低落現象，經過幾次討逆戰役，精神愈益萎靡的部隊，越來越多。如仍聽其自然，少壯老衰是無法避免的命運。以日就老衰之師，剿彼氣燄方張之共軍，又安能望其有所成就耶？

委員長發覺這是剿共軍的一個極大的危機，因而有辦理廬山訓練的計畫，決定輪流徵調剿共軍幹部，予以短期集中訓練。訓練內容包括刷新一下受訓者的思想，振奮一下受訓者的精神，同時並授以剿共必要的知識與技能，以期整肅紀律，提高士氣，增加戰力。

訓練機構設在廬山，定名為「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軍官訓練團」，時我以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總指揮本職奉派兼任訓練團團長。訓練團第一期於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七月十九日始業，這一次在兩個月時間內，共辦理三期，九月十八日第三期結業。三期調訓學員共三千二百餘人，均為北路軍剿共部隊中之中下級幹部。據當時統計，這三千多學員中，竟有百分之七十不識字。短期訓練雖然不

可能使一個文盲變成一個能讀書看報的人，可是告以爲什麼剿共？爲什麼先剿共？敵我的短長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經過反覆譬說，他們還是可以理解的，乃至表示歡迎相接受的。所謂「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這就是短期訓練的精神和特點。

這三千多學員先後返回部隊以後，以前暮氣沉沉的部隊，好像注入了新的血液，精神煥然一新，戰鬥意志重新旺盛起來。相形之下，江西共軍便成了烏合之眾，再也無法掙扎，而五次圍剿遂得克奏膚功。

委員長發動的新生活運動和辦理廬山訓練，以及「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原則的決定，以我之見，就是剿共所賴以成功的政略。這政略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加強心理建設。曾滌生（國藩）所謂：「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二一人之心之所嚮而已。」他一生兢兢業業的奮鬥，說起來就是爲了挽正人心。委員長之用心，與此正同，也不過欲正世道人心，使之一歸於禮義廉恥而已。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幾句被視爲老生常談的話，自大陸撤守以來，更不爲人所重視，以爲這是已經失掉了作用的符咒。可是我們不妨反省一下，假使人人都無禮義無廉恥，我們就能反攻復國了嗎？恐怕像現在這樣保持一時偏安之局，也將無此可能。禮義廉恥豈是可以菲薄的，不過徒爲「言教」的提倡，不大有效耳。我們還應在現實生活上努力求其實現的爲是。

第三節 剿共的戰略戰術

在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夏秋之交，國軍發動第五次圍剿以前，所有一至四次圍剿，均無成就，反之，還遭受了幾次嚴重的挫敗。歷次剿共戰役，習慣上都稱之爲「圍剿」，這個圍剿的「圍」字，即具有戰略的含義，是很明顯的。不過實際上名實並不相副，像一、二、三、四次圍剿，根本就不可能作「圍剿」的部署。因爲共區東南三面之福建、廣東、湖南三省，都不能爲剿共軍盡力，福建自十九路軍駐入後，且與共

黨進行勾結，以圖顛覆政府。廣東形同割據已久，方以共黨之坐大爲得計，豈肯協力進剿。湖南則自顧不暇，對於中央政令大抵陽奉陰違。故自第一次至第四次剿共軍事，應當說是進剿或追剿，而無所謂圍剿。

委員長於第四次圍剿發動之後，曾給我一封長逾千言的手書，論及剿共戰略戰術問題，極關重要，錄之於后：

辭修總指揮：

昨日之言，意猶未盡，對於戰術一項，又未達我所懷。中認南方地形與交通，以及匪部之火器，皆與十九世紀初期歐洲拿破崙時代等，而實不及普法戰爭時代之進步也。故今日剿匪戰術，多可取法於拿氏時代之原則。曾文正時代剿匪戰術，亦以守爲主，而以攻爲客，不若近世之以取攻勢爲戰略之主也。觀之今日赤匪行動，亦深得此道。又我軍剿匪隊形及其戰場部署，皆主重正面一線配備，且多疏散而匪部則多縱深配備，與集團突擊。匪醜戰術，實以內線作戰，乘機突擊一點，以爲其不易之成法。而游擊戰術與伏兵戰術二者，且幾爲其獨占之慣技。吾人可於此點研究，以定適當剿匪之戰術，則以匪之無遠火器又無飛機高武器，不能妨礙我密集部隊之行動，更可以匪之戰術攻匪。故我軍以後應注意三點：其一、未有十分把握之時，則守爲主，取內線作戰爲研究要點。但一有機緣，則直取攻勢，不可使其逝去也。此匪醜今日取攻勢之行動，但其敗兆亦即基於此，可以必也。其二、應力避正面一線配備，而轉取縱深集團配備。只要吾人能堅持固守，則匪部交通接濟，均無策源，必難持久，此亦必然之勢也。其三、則游擊戰爭與伏兵戰爭，急須實施講求，並設法獎勉，否則無異盲目失聰，終爲匪束手宰割也。今日初看孫吳兵略問答，如獲至寶，而其初對於地形游擊設伏誘敵奇正進退，多合於匪部戰術，對吾軍所犯毛病，鍼砭至當，如我各師旅團長以上之官長，能勤解領悟，善爲運用，則滅匪實無問題，否則自必爲匪所滅也。（下略）

委員長對於剿共問題殷殷垂訓，類此者不一而足，我們爲將領者，自無不感激奮發，使新的戰略戰術，得以貫徹施行。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第五次圍剿準備就緒，先頒定戰鬥序列，分剿共軍爲北路軍、南路軍、西路軍。閩變平定後，又以入閩部隊改爲東路軍，以撫州、吉安、贛州、黎川爲四大作戰基地，分別支援各路軍之進擊。這才是名副其實的一次圍剿。

這一次圍剿，在戰略戰術方面有極重大的改善，最高原則是戰略上取攻勢，戰術上取守勢。換言之，亦即逐步推進，步步爲營，縮小共區，使共軍無法使用其避實擊虛、各個擊破之一貫戰術的一種戰法。

我把委員長新定戰略，融貫成四句口號，以爲實施的準則：封鎖圍進，配合迫進，逐步穩進，乘虛突進。再簡言之，亦即曾胡所提倡的「穩紮穩打」是矣。

不過我們的「穩紮穩打」，比曾胡之「紮硬寨」、「打死仗」，又稍稍複雜一點。我們最重要的作法是：

一、築碉堡

碉堡在當時是最簡單可靠的一種防禦工事。剿共軍每到一地，即擇山川平野具有戰略價值的地點構築碉堡。碉堡築成可以使用人民配合少數軍隊駐守之，可作防禦共軍游擊戰之據點，可作瞭望台之用，碉堡連貫起來，就成了共軍無法突破的防禦線。其在經濟方面，共區雖物產豐饒，但仍賴與外間有無相通，始能維持生活。共區沒有鹽的生產，碉堡完成後，在經濟上就又成了共區的經濟封鎖線，鹽源斷絕，淡食之苦，是很難忍受的。總之碉堡所收效果至鉅，約言之爲：

1. 主動在我，攻守可以自由；

2. 後方得以確保，民眾安然來歸；
3. 共軍不能向共區以外獲得物資，使其經濟枯竭，生活無法維持；
4. 我得節省防禦兵力，移作進攻之用；
5. 共軍之狼奔豕突慣技，無法得逞。

當時我提出「碉成民安」的口號，曾獲得普遍的響應。

二、修公路

凡為我軍所佔領的地區，儘量修築公路，公路所到之處，交通迅捷，累日之程，朝發夕至，軍事上運輸的困難，遂得解決。行軍擾民之事，無過於拉伕運輸者，公路既通，其弊自息。綜合起來，修公路的好處，也不下於築碉堡，茲亦列述如後：

1. 人民安居樂業，可以不受驚擾，並便於軍民合作；
2. 軍中補給，均得適時適地而來；
3. 兵力輸送迅捷，易於集中使用；
4. 高級將領，可以往來指揮，決策迅速；
5. 工商業日趨繁榮，人民生活改善。

我當時對修路提出的口號，是「路到匪清」，也獲得廣泛的共鳴。

三、修機場

修飛機場以利空軍活動，所收效果如：

1. 便於偵察，共軍不易藏形匿跡；
2. 便於通訊，使我軍連絡迅速；
3. 共軍在我空軍轟炸威脅下，大兵團活動困難。

這三項修築工作，是讓我們可以「穩紮」，同時也是可以「穩打」的基礎。憑藉這種基礎，我們步步為營，層層進逼，戰略上已完全居於主動地位，可以「制敵」而不致「被敵所制」，勝敗之機，遂決於此。

關於行軍方面，根據過去經驗，我們也有很多的改進。一個最大的原則，就是謹慎小心。搜索部隊先行，兩翼至少要相隔十里以外，後衛必須很堅強。夜晚宿營，每一舉動都要預先作單獨作戰準備，以防共軍偷襲。然後架設通訊網，以便互相聯絡。一切安排停當，才能休息。

總之，從五次圍剿開始以來，因鑒於過去共軍之「無孔不入」，我們採取對策的要領，就是「無隙可乘」。

我們修築的公路、碉堡和機場，動員人力甚大，雖然儘量使用軍工，還是要借助於龐大的民力。否則五次圍剿的戰略和戰術，仍不免成爲畫餅。委員長常說：「用兵不如用民」，實在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共黨用民，是以欺騙屠殺爲手段的，人民迫不得已，爲其所用，但無不恨之刺骨。剿共是以救國救民爲目的的，要如何才能使民衆樂爲我用呢？這就要靠著修明的政治了。所以委員長主張「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是五次圍剿大政略的最高原則，戰略戰術與政略的互相配合，是五次圍剿終於成功的根本原因。

第四節 委員長的深謀遠慮

共黨自井岡嘯聚，至瑞金建都，發展之速委實驚人。剿共各軍，失利者比比皆是，故各方對共軍，大都談虎色變。當時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也同有此感。有一次他請我吃飯，談到剿共問題，我說先要祛除畏敵的心理，才有辦法，否則大家都畏敵如虎，還有剿共的前途嗎？我爲此言，無非是自求振作的意思。不想這段談話傳到委員長的耳中，說我們輕敵驕傲，委員長聞知此事即下手令給我說：

十八軍聲譽雀起，固爲可慰。據一般觀察，上下官兵養成驕矜之氣。若一遇挫折，必陷由驕匪而輕匪，由輕匪而致敗，以致懼匪之病，所慮不爲無見。望切戒各官兵驕矜之氣，以期長保常勝令譽，完成使命也。中正手令。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委員長期望我們很殷切，我們有呈復一下的必要，乃於二十七日呈復云：

奉讀敬西四五手令，仰見鈞座愛護部屬之至意，不勝感動。職軍自討伐閩馮後，官兵中不無驕矜之氣。職深恐此風蔓延，當時曾提出「不稱功」口號，令各官兵於早晚點名時高呼之。復提出「不畏難」口號，蓋恐驕氣雖戢而惰氣重生也。入贛以來，剿匪訓練築路，無間朝夕，爭勝熱烈之心，隨時隨地表現。會九一八事變發生，而各官兵敵愾之情，不可終日，言行之間，不無激烈之處，外間不察，謂爲驕矜，致勞屢注，心殊不安也。又查一般對於赤匪，無不談虎色變，此種情態，殊爲可慮。職每以赤匪決非三頭六臂，以礪士氣，用轉移觀聽，此種用意，曾於去年面陳鈞座，諒邀憶及。總之，職秉承鈞座革命之精神，對於官兵無不切實督促淬礪，期歸於正。此次巡防永豐、樂安，藉與各官兵聚餐之便，責勉備至，並取消「不稱功」、「不畏難」兩口號，以國家瀕於危亡，我輩身爲革命軍人，不能立時收復失地，湔雪恥辱，而贛中赤匪，迄未肅清，徒苦民眾，尚何功績之可言？又以鈞座有「不怕死」之訓條，我輩遵行已久，死且不怕，尚何畏難之可言？是職之所以拳拳服膺鈞座革命精神者，似未可厚非也。現職已將鈞座手令，傳諭各師官兵，有則改之，無則嘉勉，藉慰睿衰。

後來委員長當面告誡我說：「他們說你驕傲，是宜力戒。」並說魯主席的意思，不可輕視。我說：「憑他們這種精神態度，剿不了匪。我要鼓勵他們，免使他們的畏匪心理，繼長增高，更不得了。魯主席以為我是黃埔生，他心目中的黃埔生，都是驕傲的小孩子。他們第二軍（魯主席於此伐時任第二軍代軍長）也有這個觀念，覺得我們會看不起他們。」

「驕兵必敗」、「兵驕者滅」、「衰至便驕」，這都是古代兵家戒驕之言。為將者不懂得這個道理，覆軍亡國，都是可能的後果。不過兵不可驕，亦不可餒，此所謂「過猶不及」。將兵既能使之不驕，又能使之不餒，斯為得之，進言之非艱行之為艱耳。十八軍於中原戰後，確有一種新銳之氣，一時不患其餒，最可怕的就是驕，委員長諄諄以驕為戒，意即在此，亦「由也兼人故退之」之意。然則委員長所慮者遠矣。

委員長對於我二十七日呈復的信，於十二月三日又有回諭給我，敬錄於后：

二十七日手書欣悉，人患不自知，又惠無逆耳之言以長患耳。今能自反則幾矣。近來與弟對語，別後總覺你說人之短，看人之輕，以你所言者，總括之，幾乎天下無可用之人。換言之，即以無人能出我右者之意存乎其間也，此為任大事成大業者最不可有之缺點，亦即自滿驕敗之起點。吾屢欲面戒而無其時。吾弟確犯此病，以外間聲聞過譽，而不知自檢自戒，無形中生長驕心，故祇見人短而不知自己未有過長之處也。中一生愚拙，惟以約旨卑思切己自反八字，為修身立業之本。故無日無時不在悔悟之中。以自知無所長，故不敢道人短。即歷年敗挫，亦祇有自慚自疚，從不敢怨天尤人。乃以問心無愧，則神明泰然，故敢再接再厲而無畏縮之時。惟願吾弟深注於此，則吾無他憂矣。中年之人如能於韜光養晦之句，時加注意，則猶可及時蓄銳，以收後來發揚光大之效。今弟既已任軍長，而又聲聞於世，是欲求養晦而已不可得，無已，則以存養省察與滿損謙益之戒以補之。臨深履薄，尚憂不逮，而況可揚人之短乎？然論人長短於私室密談，以為在上者參考之資，則當無不可。然而公庭廣眾之地，則非所宜

也。吾甚以此爲弟立身處世憂，望吾弟切思而自反之，並望對所部默察潛移，勿使其稍有驕氣，此乃爲大事成大業者知方知兵唯一之要諦。望吾弟有以詳究之。如稍有暇，應將曾胡各全集及王陽明戚繼光諸書，再看一遍，則養氣斷事，必有長進也。久欲詳談而無閒暇，因來書有感，隨而告之。

此一手諭，除重申戒驕之義外，教我勿攻人短，教我存養省察，真是語重心長，使我感愧無地。不過我那時已三十六歲，有的是幹勁，有的是勇氣，轉戰南北各省以來，目擊民生艱苦，與夫「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的情形，心所謂危，實在不忍默然置之。故往往口不擇言，發爲憤世嫉邪之語。當時何嘗不知道這樣做不應該，但「存養」的功夫太差，仍然做出「看得透忍不過」的事來。而且我另有一想，覺得「獨善其身」與「兼善天下」的工夫，很難兼籌並顧。所以孟夫子也主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人當有機會可以兼善天下時，而「不譴是非」、「不辨善惡」、「不明邪正」，是則「獨善其身」而已，又何有於「兼善天下」？因此我於讀過委員長的明諭後，仍有未能已於言者，乃又呈復於下：

奉讀鈞座三日申刻手諭，訓勉備至，當敬謹書紳，以爲終身修身處世接物之準衡，藉報鈞座教誨之大德。惟職生性既極椎魯，涵養又未深醇，每遇外界刺激，則蘊之於心者，終不免出之於口，雖常讀戚王曾胡之書，實際只可供參考取法而已。若須與往哲精神同遊，無論在事實上所不可能，亦可不必。勤勉力學之，終難避畫虎之譏也。是職除受總理遺教之薰陶外，固無一事不以鈞座之意旨爲意旨也。邇日人慾橫流，在此國難當前，尚鈞心鬥角爲權利之爭，即不然亦必淪於卑污苟賤。是職憤世嫉俗之襟懷，雖不爲世俗所諒，然中心坦白，語無虛偽，則此點差堪告慰於鈞座者也。此後凡職所短，足縈鈞座廬慮者，務懇鈞座以教子弟者教職，俾知憬然悔悟，蔚爲事業之助，則蒙福不僅職個人已也。職自從軍以來，對於部屬，每因求進心切，不無嚴厲之處。然一切均以身作則，自問純出至誠，毫無摻雜私念。而能否潛移默化，以職德量之薄，

固不敢以此自負也。至於驕氣一節，在他人或係出於猜度，然職追隨鈞座有年，而職之個性學力，無不在鈞座洞察之中，今以是勸職，聞之不勝惶恐。嗣後惟有切實悔改，以期無負鈞座知職之明。職亦不欲爲羊公不舞之鶴，重辱救命也。

上面呈復的函件，是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十二月八日發的，過了兩個月，又得到委員長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二月七日的一封手諭，再恭錄於后：

梧生一書，希代交去。近日看書如何？身臨江右，更覺陽明之學爲可貴也。陽明得道於龍場，而立業於江右，故浙東學案，在江右尤爲風行，希相與共勉之。並望注重陽明剿匪時之精神與方法，此固當時匪類智識不如今日赤匪之盛，故消滅亦易。然而其精神之修養得奏功效，亦不可不察也。自來成德立業，而能爲民族人格增光者，未有不從修養精神爲基礎。以修養精神者，決非即可當唯心論者看待，而鄙視之。凡宋明以來，成名之大儒，無論其爲武功或文治，皆由其修養而臻於實踐之力得來也，故望弟對於存養省察、謹言慎行之端三注意也。中於昔年，亦頗矜持不群，輕棄收飲，至今思之，皆爲好譽徇外之心所馳，而毫無把握，更無主宰，然恐悔之晚矣！尚望弟等及時注意，不可放過，則德業有基，不患功業不立也。希督之，《陽明集》撫州有買否？南昌亦可寄來。

委員長以修養省察工夫見教，不惜反覆言之，不惜現身說法以明之。要知道委員長每次受挫而復再起，以一身繫天下之重，宵旰憂勤，日理萬機，竟能抽出時間來以手翰相戒勉，委員長豈亦如一般文人學士以操紙握管爲樂耶？當然不是的。

這是委員長將將之一道。當時像我這樣一個青年將領，奉到委員長的手翰，當然認爲是一種殊榮，而有知遇之感。「士爲知己者死」，是中國士人的一種傳統觀念。我既蒙此殊榮，能不感激圖報，繼之以死嗎？

善將兵不如善將將，將者三軍之司命，能得一良將，不僅三軍之命有託，即國家亦得干城之寄。故委員長對於將將，極端重視。

不過三軍易得，一將難求，與其求之而不可得，不如就已有之材而造就之，此委員長所以不憚詞費而反復賜教於我也。只可惜我以樗櫟庸才，無所成就，辜負委員長殷殷施教之本意耳。

教將亦是提綱挈領執簡馭繁的一種治軍之道。但是人之短長優劣，千態萬狀，一一因材施教，為不可能，故委員長教將，特重心學，喜言陽明，亦「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之意。而委員長之深謀遠慮，憂勞為國的精神，太使人感動了。

第五節 幾次失利與部隊改編

蛟湖霍源之役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二月十一日，我奉命改任剿共軍中路軍總指揮，轄三個縱隊。第一縱隊轄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等三個師，第二縱隊轄第九十、第十、第十四等三個師，第三縱隊轄第六、第九、第五、第七十九等四個師，另以第四十三師為總預備隊。

中路軍作戰計畫，原定於是年三月底以前集中完畢，計第一縱隊集中宜黃、樂安；第二縱隊集中簾橋、東館；第三縱隊集中金谿、潯灣；總預備部集中樂安。此次進剿部署，因鑒於以往指揮系統之過於重複，運用諸多障礙，決定每縱隊實力，以能對共軍主力單獨作戰為原則。又以深入共區，連絡線延長，補給極為困難，決定儘量減輕行李，以便官兵自行攜帶米鹽。當時有「吃在一身，睡在一身，用在一身」，及「找匪打，與匪拚」等口號。這可以看出當時中路軍剿共決心的堅強與作戰的艱苦。

中路軍的作戰主要任務，是南下直搗共軍巢穴。

另編左路軍及右路軍，各轄六個師及一個獨立旅，由贛西、閩南、閩西、閩北，分別向東、向北、向西挺進，期與中路軍對共軍完成大包圍態勢，使共軍眾殲其中，無所逃命。

中路軍原定四月初開始行動，因日閩乘我無暇北顧，竟於二月初調動大軍，入侵榆關、熱河。共軍知我又將應付外寇，亦趁此機會，大舉進犯南豐。幸賴駐軍守禦得力，共軍未得手，即由西南兩方，分途撤退。時我方為爭取主動早日達成任務，以便抽調部隊北上抗日計，我們中路軍奉令變更預定計畫，以第一縱隊之第十一師由宜黃南下，以第五十二及第五十九兩師，由樂安東進，經東陂、黃陂，至新豐市會合；以第三縱隊改在南城、硝石集中；第二縱隊到南城後，轉向康都圩前進。因計畫變更倉卒，準備諸欠妥實，致有五十二、五十九兩師蛟湖、霍源之失利。

先是共軍曾圍攻廣昌，亦未得逞，陽作竄回老巢模樣，實則將主力轉移於樂安東南叢莽間潛伏。二月二十七日，我五十二師行抵蛟湖，五十九師行抵霍源，山勢陡峭，路徑險峻，時天冥霧重，莫辨東西南北，共軍即於此地設伏。待我軍到達，伏兵齊發，槍聲四起，我軍倉卒應戰，苦鬥歷二晝夜之久，戰況之慘烈，為前所未有，兩師官兵傷亡過半，師長李明、陳時驥均於此役壯烈成仁。

黃陂之役

蛟湖、霍源戰後，共軍主力退據東韶、洛口一帶整頓，久久未離廣昌附近，其待機再圖一逞之心，至為顯然。我軍於明瞭敵情後，適宜變更部署，以第三縱隊之第五、第九兩師，撥歸第一縱隊指揮，另以第六師集中金谿、潯灣一帶，七十九師集中宜黃，繼即令一、二縱隊集中黃陂五都河一帶，再以第二縱隊附第五師進占新豐市洽村向廣昌攻擊前進，而令第一縱隊推進東陂附近策應。三月二十一日，我第二縱隊先頭到達廣昌之甘竹市，隊尾正過洽村時，共軍即自動放棄廣昌，以全力攻我第一縱隊第十一

師之黃陂附近陣地。十一師自出征以來，轉戰南北，幾於戰無不勝，攻無不取。當時以第一、第二、第九、第十一各師，為中央之基本部隊，素為共軍所畏懼。此次輕棄廣昌，集中全力以對付這個師，其目的是要吃掉了它，以絕後患，自不待論。共軍使用兵力約當十一師的三倍之眾，激戰竟日，雙方死傷甚重。據報彭德懷亦負了傷，當時誤傳他已陣亡，可知這確實是一次決戰。十一師以常勝之軍，未能藉此機會殲滅共軍，尚非眾寡不敵之故。其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十一師除以兩營為預備隊外，全師官兵均進入此一廣大的陣地，兵力不免分散。共軍即利用此一弱點，施展其集中全力突破一點之慣技，與我展開激戰。我十一師於此役雖未能取勝，但就傷亡而論，共軍實遠過於我。我軍戰志亦未稍挫。古人云：「兵可挫而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不可挫。」自五十二、五十九、十一個師失利消息傳出後，軍中「復仇」之聲，隨處可聞，蔚為一時風氣，是則「志」不但未挫，反而再接再厲了。

三月二十六日，我以三師先後失利，罪無可辭，因呈請委員長，自請處分，其文云：

職於外寇方張之際，奉令剿匪，肅清內盜，才薄任重，自知弗勝，惟當此萬難關頭，懷古人見危授命之意，責無旁貸，義不敢辭。並承鈞座意旨，擬於最短期間摧陷廓清，藉紓中央內顧之憂。不意一月以來，五十二、五十九兩師失利於前，第十一師挫敗於後，影響中央安攘之大計，蒙受從來未有之損失。此中原因固屬甚多，而高級指揮官之計慮未固，部署欠當，終屬咎無可辭，迭據各該部主管長官自請嚴處前來，查第一縱隊指揮官羅卓英，輕敵遷就，有失機宜；第十一師師長蕭乾，復仇心急，顧慮不周；第五十二師一五五旅長滕雲，疏忽命令，致滯軍行，均應按律處分，以儆將來。擬請將羅卓英撤職留任，戴罪圖功。蕭乾負傷指揮，擬予輕減，降為代理。滕雲予以撤職處分。其他師旅團長容有疏忽之處，但臨難不避，與匪拚命，或負傷，或陣亡，或殉節，或迫害，壯烈之氣，直薄雲霄，終非貪生畏葸者可比。即未得戰勝之果，

亦予匪以重大之創傷。擬請將傷亡者姑免追究，其餘團長以下之官兵，擬待飭查具報後，再行呈報。依其功罪，而定賞罰。查前後兩役，上校以上傷亡人員已經查確者，計師長李明，負傷自戕，陳時驥陣亡，蕭乾負傷。參謀長柳善負傷。旅長楊德良陣亡，傅仲芳、莫與碩、方靖均負傷。團長房少斌、陳君鋒、李宴芳、曾孝純均陣亡；周化南、李青均負傷；孫嘉傳負傷自戕，王省岳自戕致傷，彭夢耕失蹤。其餘傷亡及損失，容俟查明補報，分別請恤。至職奉命無狀，措置失當，並懇嚴厲處分，藉鼓士氣。如蒙另簡大員接替斯職，俾奏膚功，奠安黨國，實為感禱。

閱數日，奉批：

剿匪軍中路總指揮陳誠、第五軍軍長羅卓英，於上月率部剿匪失利，實難辭咎，陳誠著記大過一次，降級任用；羅卓英著革職留任，載罪圖功。

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委員長有手令給我，要我切戒官兵驕矜之氣，當時我還覆電申訴，以「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為言。（見前）豈料才隔三月，我們竟一再失利，使國家安攘大計，亦因之蒙受頓挫。推究一下失利的原因，固在改變計畫提前進剿，而官兵驕矜輕敵實亦不能為諱，真使我覺得對不起國家，更對不起統帥。

蛟湖霍源之敗，有的人諉過於天候及地形之不利於我，這是不成理由的。天候惡劣，地形險峻，是雙方共之的！共軍能利用之以攻我，我就不能利用之以反制嗎？贛南春季多雨，年例如此，往往一兩個月雨霧迷濛，不見天日。行軍之前不先考慮及此，就是一種疏忽。至於地形早應偵察清楚，貿然進入地形不明之境，更是一種疏忽。為什麼有此疏忽，輕敵之故耳。為什麼敢於輕敵？當然是「驕」字在那裏作祟。

還有人歸咎於五十二、五十九兩師之番號不利，所以才招致失敗的，這理由就更可笑了。這兩個師是由十一師中兩個獨立旅改編的。補充進去的部隊，都是些紀律不良的雜色隊伍。以此這兩個師素不為民眾所歡迎。師行所至，民眾逃避一空。他們得

不到民眾的助力，只得摸索行進，這才使他們陷入伏中而不自知。失敗之後，不怪本身的不健全，而怪番號之不利，未免太缺乏反省精神了。

十一師那種佈陣法，預備隊留得那樣少，對於敵人「以大吃小」的慣技，完全不拿來放在心上。這能說不是疏忽大意嗎？這能說不是驕傲輕敵的表現嗎？

以上輕敵致敗的責任，都應由縱隊指揮官來負。至於改變計畫，於進備尚未完成之際，急於求敵決戰，以致欲速不達，反而失事的責任，我是推卸不掉的。不過因為外寇的深入，上級固已有此指示，我亦無可如何。

再則黃陂之敗，由於我之事必躬親，也是一大原因。那時我處理公務，不大假手幕僚。以致形神勞瘁，往往數夕不寐。一夕得前方電報，請示機宜，我因疲困已極，竟手持電報睡去，及醒，再行處理，已失時效，此一事給我的教訓甚大。人的精力有限，責任越大，越要分工合作，始克有濟。以諸葛武侯之賢明，過親細務，猶不免於愆事，則我輩常人，事必躬親，焉有不敗之理？經過這次教訓，在我指揮的部隊中立即徹底實行分層負責制。直到現在，我始終服膺這一原則，不敢有所踰越。

十一、五十二、五十九三師之受挫，引起了部隊的改編問題，一時很令人失望。部隊改編，原是軍中常有的事，本不足為奇，不過改編要辦得公私合情合理，方足以去腐生新，提高戰力。否則僅依私人的愛憎即漫無標準的予以改編，則其結果將有不堪設想者。十八軍原轄十一、十四、四十三、五十二、五十九五個師，每師均轄二旅三團，共計三十個團。因前述三師之失利，行營即下令改編十八軍為三團制之五個師，約計需縮減員兵一半左右。一年前委員長曾宣告各軍：「凡因剿匪損失之部隊，定予以充分補充，並永不縮編」，這才是鼓舞部隊不怕犧牲的辦法，誰知言猶在耳，竟將勇敢善戰的部隊，包括有功無過的十四、四十三兩師，一併大事縮編，我們知道這不是委員長的意思，這簡直是對於不怕犧牲部隊的一種無情打擊。當時共黨有一種刊物

叫《火線》，稱委員長是國民黨中的唯一領袖，稱十八軍是委員長統率部隊中主力的主力，只要打倒委員長，國民黨即不能有所作為，只要擊破十八軍，即可造成奪取江西一省或數省之首先勝利。這自是共黨挑撥離間的一貫技倆，不過十八軍是內外嫉妒的目標，倒是不折不扣的事實。「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自古已然，世風日下以降，更成爲普遍存在的風氣。於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乃成爲見怪不怪之事。我當時對此非常憤慨，有一次面報委員長，如此改編部隊，足使軍心渙散，剿共將永無成功之一日。我說：「南宋不能光復故物，是秦檜必欲誅除岳武穆（岳飛）的結果。我雖不敢比擬岳武穆，但委員長左右確有秦檜其人事實。」我爲此憤激之言，今日想來，很失態，很後悔，而當時委員長亦不甚以爲忤也，其德量之宏偉如此。

在此之前，還有一件有關十八軍的故事，亦不妨拉雜的在此說一說，以見當時吾人處境之不易。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元月，我因婚假之便，陪同委員長伉儷及孔庸之（祥熙）先生伉儷泛舟西湖。委員長忽命我銷假回防視事，一座皆感驚訝。我說：「是否有人造十八軍的謠言？」委員長首肯。我當即趕返防地察問。原來國民革命軍自北伐以來，在「黨權高於一切」的口號之下，不僅「以黨主政」，而且是「以黨領軍」的。國民革命軍各級部隊中，均設有黨部，黨務人員在軍中既居於領導地位，其氣燄之高，不難想見。而軍中幹部多來自黃埔，也自成一個系統，與黨方明爭暗鬥，匪伊朝夕。我在軍中，雙方的鬥爭，還不太表面化，這次乘我婚假可能較久之便，彼此互相水火，頗有激起事變之可能。我趕回防地後，即集合所屬講話，我先問他們：

你們是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

你們走不是委員長的幹部？

你們是不是革命者？

大家當然都舉手稱「是」。我接著宣布：「現在軍中因團結精神不夠，頗有造謠生事惟恐天下不亂的情事發生，影響軍譽，實非淺尠。從今以後，如再有違背三民主義信仰，不忠於委員長領導，及有反革命行爲者，不論何人，決即先行槍斃，然後再向上級呈報。」經過這一次鎮壓，軍中派系的鬥爭，始漸漸平定下來。我們總不能說十八軍不是一支較爲像樣的部隊，但「和上下，化異同」，確實也付出不少心血的代價，以上所述亦不過舉其一例耳。

第六節 幾次大勝

克復黎川之役

第五次圍剿江西共軍，是由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開始進行的。是年九月，我軍先有克復黎川之役，黎川縮轂贛閩，爲兩省交通孔道。共軍據之已有三年之久。其地東連光澤、邵武；南達建寧、泰寧；北出金谿、資溪以窺撫州。合贛之東北東南及閩之西北而打成一片，指臂相連，爲共區軍事上之一大重鎮。

二十二年五月間，共軍一、三、五軍團，大舉改編，準備應付我軍長期圍剿。擬先予閩軍以打擊後，再集結全力，以防北路軍之進擊，遂以偽第三軍團及新編各股，編爲偽東方軍。由彭德懷率領，東趨連城。而以偽一、五兩軍團編爲偽西方軍，仍留宜黃、樂安以南地區，阻我北路軍之南下。七、八月間，我駐閩各軍，作戰不利。至九月中旬，共軍聲勢益張。偽西方軍漸向東移，有與偽東方軍連成一氣之企圖。我於此時因奉命攻占黎川以切斷閩贛共軍之聯絡。

時中路軍組織尚未取消，即以所轄周渾元縱隊（轄第五、第六、第九十六等三個師）向黎川挺進。時共軍以偽第七軍團蕭勁光部守備黎川。想不到我軍之猝至也，接戰僅二日即退去。我軍於九月二十七日占領黎川。

黎川這樣輕易失去，共軍如何甘心。乃由偽東方軍及西方軍抽調五師兵力，編為三個縱隊，以為規復之計。第一縱隊攻硝石，第一一縱隊取洪門，而以第三縱隊俟隙攻占黎川。敵計雖狡，無如我軍因應得宜，終未得逞。黎川於第五次圍剿之前夕，為我軍所據有，使贛境共軍始終不得與閩境共軍取得聯絡，實為戰略上一大成功，無異為五次圍剿開一勝利之先聲。

閩邊德勝關之役

第五次圍剿於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間開始行動，組北路軍、西路軍、南路軍，而以東側剿共任務，屬諸駐閩之第十九路軍。十九路軍曾於一月以前與偽東方軍接戰不利，至是該路軍首腦受失意軍人政客之包圍，竟與共軍勾結，而有叛變之企圖。北路軍原定南下進剿計畫，遂不得不有所變更。

北路軍第一路軍原定向沙溪、龍岡之線推進，仍照原計畫規定不變。

北路軍第二路軍抽調一部開往閩浙邊境鎮懾，另以一部開往邵武、浦城，分向延平猛進。

北路軍第三路軍向黎川東南之德勝關、泰寧方面推進，一以堵截偽三、七軍團，冀殲滅其實力，一以掩護第二路軍入閩之推進。

我這時已受命為北路軍第三路軍總指揮，轄守備隊五個師三個補充團、第五縱隊四個師、第八縱隊三個師。

十二月十日，本路軍第五、第八兩縱隊在黎川附近集中完畢，總指揮部亦於是日進駐黎川城。

時共軍偽三、五、七軍團已竄集德勝關附近，以阻截我軍前進。我軍於十二日開始攻擊，翌日即將共軍所固守之團村、華蓋峰及河塘等要地占領。十四日再占領東山，即進薄德勝關。十五日經激戰後，德勝關亦為我軍所攻陷。自十二日攻占團村以來，至十五日攻克德勝關，前後共俘敵五百餘名，斃敵千餘。偽第六師師長張錫龍及偽十三師參謀長均於此役被我軍擊斃。偽十三師幾於全師覆沒。我軍亦傷亡官長六十餘員，士兵七百餘名。

德勝關被擊敗之殘敵，均向泰寧境內退竄，本路軍為加強封鎖，制敵在贛東活動，即於十七日起，開始構築由黎儿亘河塘、東山至德勝關之碉堡封鎖線，徹底制止閩贛兩省共軍之流竄。掩護友軍入閩任務，亦得以完滿達成。

克復廣昌之役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一月二十一日，我入閩第二、第四、第五各路軍在沙溪大捷，已將「人民政府」所屬逆軍解決三分之二，閩變已近尾聲。剿共軍至是無須分心東顧，可以併力剿共。

廣昌為贛南共區門戶，我軍於德勝關之役截斷閩贛共軍聯絡後，次一重大軍事目標，即為攻略廣昌。本路軍於略定廣昌以東樟橫村、邱家隘、寨頭隘等戰略要地後，我即移駐南豐附近，準備南下進攻廣昌。於時南昌行營調整部署，二月十三日我復奉委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仍兼第三路總指揮。

自築碉修路辦法施行後，共軍埋伏突擊等策略，完全失效。為圖保衛廣昌門戶，又不能坐待我軍之進攻，乃集中偽一、三、五、九四個軍團，全力與我軍進行搏戰。以偽五軍團為箝制隊，犯我正面，以偽一、三、九軍團為突擊隊攻我側翼，以圖僥倖一逞。我軍求敵決鬥，方不可得，見其來攻，可謂正中所懷。值大風雨，全線同時迅捷出擊，共軍措手不及，遂大潰。是役共軍使用兵力二十七團，我陸續調集兵力三十

三團，直接參與作戰者二十一團。此為五次圍剿開始後之第一次大決戰。時為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三月十四日。

十五日我第五縱隊攻占白舍，遂即趕築南豐白舍段公路。至四月初旬，此段公路與我第三、第八兩縱隊所築德勝關、泰寧間封鎖線，一均次第完成，我進取廣昌之條件，均已成熟。

四月十日本路軍以第五、第三、第八各縱隊沿日于河兩岸，向甘竹、廣昌推進，沿途共軍，均被擊退。於十一日將甘竹市占領。於是各部隊就地築礮，構成縱深之封鎖線。不數日，亦告完成。乃再步步向廣昌進擊，自十九日起連克要隘多處，至二十六日我已兵臨廣昌城下。

自二十二日以後，偽一、三、五、九軍團，均麇集於廣昌城以北一帶地區，揚言將死守廣昌。共軍首領朱德、毛澤東、秦邦憲、周恩來等，組織「前方委員會」，並均親臨前線督戰。是時共軍接受蘇俄之指導，亦實行堡壘政策，所謂以堡壘對堡壘，可見其垂死掙扎情形之一斑。無如我軍士氣甚盛，所向無前。經過數日之激戰，共軍大敗。偽一軍團中下級幹部，死亡大半，可謂創鉅痛深。二十八日我軍遂將廣昌城完全占領。

廣昌既下，共軍猶欲死守建寧，以圖恢復。本路軍派第八縱隊，協同東路軍第十縱隊夾擊之。五月十五、十六兩日，與共軍激戰於駐馬寨，共軍再潰，我軍又續克建寧。

克復石城之役

共軍自失守廣昌、建寧後，連城、龍岡、筠門嶺等處，又先後爲我各路友軍所攻占，遂採退守戰略，縮短防線，在石城縣屬之驛前，構築堅固之防禦陣地，以阻北路軍之進攻。在長汀縣屬之白依洋嶺，利用天險，構築堡壘，以阻東路軍之推進。

七月初，本路軍已奉到進取石城之命令。決定第一步進占頭陂、白水，於構成頭陂、白水間封鎖線及廣昌、白水間公路後，再向石城進展。我軍行進間，共軍阻擊甚烈。因我步步築碉，穩紮穩打，詭謀均不得逞。乃又採行一種「短促突擊」戰術，以小部隊在短距離內，乘我立腳未穩，即行突襲。但我軍一到陣地，立即構築野戰工事，且後續部隊，相距不遠，於一二小時內，即可增援。故匪短促突擊，亦終無效。

七月杪，廣昌、頭陂、白水間公路及封鎖線，均已告成，乃以東路軍撥歸本路軍指揮之第十縱隊爲左縱隊，沿白水、驛前大道東側，以第七十九、第六十七、第十一等三師爲右縱隊，沿白水、驛前大道西側向貫橋、驛前逐步推進，其餘暫任守備。

共軍在貫橋方面，亦置有重兵，憑堅固守，激戰甚烈。惟因我陸空協同，攻擊精神凌厲無前，卒於八月六日攻克之。

共軍在驛前、貫橋之間，築有強固完備之堡壘工事，縱橫連貫，數十里內彌望皆是。貫橋之戰，是我軍攻敵堅固陣地的開始。在此以前，共軍多攻，我多守，在此以後，共軍多守，我多攻。形勢爲之大變。

共軍在驛前所構築之防禦工事，較在貫橋，尤爲強固。其碉堡結構散在山頂四周，以掘擴散兵壕連綴而成。上蓋樹幹五層，覆土厚一公尺五，外設鹿砦三道。主堡左右，又有多數隱蔽之小堡，構成交叉之火網，攻其主堡，各小堡均可向我側背射擊，故極難得手。

根據攻取貫橋之經驗，仍須加強陸空合作，而尤須有優越之砲兵火力，始克有成。八月二十七日請調之卜福斯山砲營開到。二十八日拂曉五時，以第十縱隊居左，第五縱隊居中，第三縱隊居右，聯合砲兵空軍，向共軍陣地全線總攻。因各軍協同得力，官兵奮戰驍勇，故不及半日，共軍所依爲金城湯池之陣地，卒被我軍一一粉碎。二十九日續向驛前推進，共軍仍節節抵抗，至三十一日午後，遂將驛前完全占領。

敗殘之共軍，紛紛潰竄鐘子寨、中華山、黃泥寨、陳古嶺一帶，日夜構築工事，希圖掙扎。但已無濟於事。

我軍至九月下旬，已將各處前進碉堡公路修築完成，二十六日開始向石城進攻。共軍所構工事，相繼爲我所摧毀。十月六日，我十一、十四兩師及第六師並山砲營，於攻占石城附近高地後，遂即占領石城縣城。共軍至此，知大勢已去，戰志消失，已作準備逃亡之計。

石城克復，共區藩籬盡撤，共軍一面派兵抵抗，以圖阻撓我各軍之進展，一面調集主力，準備西竄。所謂抵抗，只是象徵性的，藉以延緩崩潰時日而已。十月二十六日本路軍第六師占領寧都，十一月一日，東路軍第九師收復長汀，十日第三師收復會昌，第十師收復瑞金，至是贛南共區已不復存在。計自十六、七年之交朱、毛嘯聚井冈山以來，贛南淪爲共黨巢穴，爲時已七年之久。我自二十年（一九三一）率領十八軍入贛，至此亦已四年。在這四年的歲月中，我軍幾無日不與共軍角逐於叢山峻嶺之中，一旦犁庭掃穴，使共區重見天日，也覺得可舒一口長氣。但一念及殺傷之眾，損失之鉅，又不禁爲之嗒然若喪矣。

竭數年之力，糜鉅萬之餉，勞百萬之師，以剿此一隅之共軍，照理講，是應當草薶禽獮，根株斷盡的了。殊不料我們於攻下石城之後，共黨竟開始突圍，其中渠魁如

朱、毛等，盡皆漏網，遂使九仞之功，虧於一簣。這讓我們當時剿共有責的人，真不知應何以自處！

共軍自石城將陷未陷時起，即已準備突圍西竄，至十月杪，綜合各方情報，所得情形如下：

一、偽一、三、五、八、九軍團殘部及偽中央各機關共約五萬人，已於十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日晝夜由信豐、青龍、池江、新城、賢女埠、南康一帶渡章貢水，紛向義安、橫江、楊眉寺等處西竄，其在信豐東南古陂、安息等處與我南路軍接戰之偽一、三軍團之共軍，似為其掩護部隊。

二、留置贛境殘部，有偽「省蘇」約二千餘人，槍數百枝，十月十三日，由寧都城向馬顧、黃石貫竄去，各偽「縣蘇」共約千餘人，槍數百枝，十月二十六日，由安福圩、青塘圩向黃陂竄去，又黃陂、蔡江一帶，有番號不明之共軍二千餘潛伏，偽三十四師之共軍六百餘，及東山壩、馬濟湖等處殘部，於十月二十七日起，俱竄向黃陂一帶集中。

三、閩西方面，偽二十四師主力，十月二十日尚在長汀屬河田附近。

根據以上情報，我當時曾向委員長提供以下意見：

一、共軍突圍部隊，必係偽一、三、五等軍團之主力，而留置雜色部隊於贛南老巢，其偽軍政首領，必隨之流竄。堵截之法，惟迅速抽集部隊，於南（南雄）、大（大庾）、信（信豐）、安（安遠）及桂（桂東）、汝（汝城）一帶，迎頭痛擊。於湘南則趕築碉樓，訓練民眾，堅壁清野，以逸待勞，勿使得定喘息。

二、北路軍應速乘機將守備部隊，除必要者外，一律推進構築興國、寧都及寧都、雩都、贛州線碉堡。

三、以現勢觀之，共黨已西竄，如由進剿部隊追擊，不但鞭長莫及，且亦不可能。此時對軍隊本身及環境觀之，可令周渾元部就近準備追擊外，其餘實有整理並從速肅清殘部之必要。

四、為摧毀贛南共黨之根基計，應劃贛南為特別區，特派能員負責，注意小學教育，以期改造兒童心理。對無主土地，應給予貧民，或補償因修路損失之民眾。再交通網亦應繼續完成，以為將來軍事政治推進之基礎。

這項意見，經奉決定如下：

一、西路軍派軍二師集結耒（耒陽）、常（常寧）一之線相機使用。以一師開資（資興）、郴（郴縣），策應汝（汝城）、桂（桂東），以一師守大汾及桂東，以一師守桂東至廣東橋。

二、南路軍派兩個師一個旅由大庾、信豐向崇義方面追剿。

三、北路軍派第六路軍兼程入湘，第八縱隊在遂川集結後，向西南覓敵追剿，期與南路軍連絡夾擊。

四、本路軍負責築碉築路，並在贛南分區搜剿殘敵。

其時殘留雩都、會昌、瑞金、石城間及寧都、興國之線以北地區之共軍，約計尚有二萬餘人，由項英為之魁首。一以牽制我軍，使不得全力追剿逃竄共軍，一以保留餘燼，作死灰復燃之計，故清剿殘敵工作，也是很要緊的。

南昌行營為適應實際需要，調整部署如下：

一、東南西北各路軍及預備軍戰鬥序列，於十一月底取消；

二、任命何鍵爲追剿軍總司令，薛嶽所屬之第六路軍及周渾元所屬之第八縱隊，改歸追剿軍戰鬥序列；

三、任命顧祝同爲駐贛綏靖主任，下設八個綏靖區，派我爲駐贛預備軍總指揮，轄四個縱隊；

四、任命蔣鼎文爲駐閩綏靖主任，下設四個綏靖區，派衛立煌爲駐閩預備軍總指揮，轄三個師。

調整後的部署，於十二月一日起施行。

本預備軍於奉命後，即著手清剿工作。分期分區進行，以「嚴堵」、「窮搜」爲原則，務期餘孽肅清，使人民恢復安居樂業生活而後已。在開始清剿以前，先構成網狀封鎖線，制敵流竄，再以有力部隊，分駐要點，然後分派小部四出搜剿，並編組狙擊隊用游擊方式，覓敵猛襲，或繞敵腰襲，使無棲息時間以疲之，因之殘敵戰志戰力，完全消失，欲圖倖存，遂爲不可能之事。我部隊所到之處，立即開始散放食鹽，調查戶口，組織民眾，編組保甲。共區人民日漸歸心於我，殘敵欲圖潛蹤匿跡，亦已無此可能。至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三月底止，贛境殘敵，殲滅殆盡，本軍清剿任務，因得告一段落。

第五次圍剿開始以來，我們三路軍在進剿軍中居於主力的地位，此爲人所熟知。經過一年多的苦戰（僅就五次圍剿而言），生者需要稍舒喘息，傷者需要療養，死者需要補充，而同時贛南殘敵還需要我們清剿，所以追剿竄敵的工作，我們沒有參加，這是不無遺憾的事，但也是無可如何的事。

西竄共軍的確實人數，究竟有多少？現在還沒有定論。根據我們當時的情報，是四至五萬人，據史諾的估計，約爲九萬人。兩個數字，相差一半，可能都不夠準確。

折中計算，約為六七萬人。總計贛閩共軍，原只十餘萬人，經過最後最大一次圍剿，竟仍有六、七萬人漏網，這當然不能不說是「功虧一簣」了。

漏網的共黨殘部，由廣東而湖南而廣西而貴州而雲南而西康而四川而甘肅，最後始得立足於陝北。沿途為堵截及追剿部隊所消滅者，達半數以上，最後到達陝北的殘餘，據說還不及萬人。江西功虧一簣的圍剿，固屬不幸，不想繼此之後，又來一次西安事變，以致終有漏網吞舟之事。因為人謀之不臧，致使國運重罹艱屯，何勝浩歎！

贛南共軍突圍的幾個重要原因，即在今日也還有檢討一下的價值。

第一我們情報得到的太慢。贛南共軍突圍行動，於十月中旬即已開始，可是我們於十月下旬才得到情報。共軍封鎖情報的工作十分成功，因此才有突圍的成功。

第二我們過份穩健了。石城攻下之後，共軍事實上已無法再行戀戰。我們應立即猛進猛打，以殲滅共軍主力為急務。可是我們仍照以往一貫成例，築碉修路，以穩紮穩打為能事。這種過份謹慎的作法，雖然絕對穩妥，但卻失掉了千載一時的機會。

第三南路軍有網開一面之嫌。陳濟棠的廣東，是半獨立性的省分，已匪伊朝夕。五次圍剿開始，他雖然沒有拒絕南路軍總司令的任命，但要他真正拿出血本來剿共，誰都知道是不可能的。防止共軍侵入廣東，他當然肯幹，單單為了合圍而不惜有所犧牲，就要另當別論了。「養匪自重」的話，現在我們不忍說，「以鄰為壑」的心，雖在共方亦知之甚審。所以他們突圍，就選定了南路軍防線的地帶進行。這也是共黨知己知彼的一種成功的判斷。

總之剿共數年，卒使共黨分子數萬突圍，這是我們的失敗，實屬無可諱言。但因追剿竄共，國軍忍飢寒，冒霜雪，轉戰萬里，備嘗艱苦，卒使竄共難安喘息，無法盤據為害，大西南得以由此保全。我們知道川滇黔等省地當邊陲，與中央形格勢禁，自

北伐成功以來，始終仍保持一種半封建半獨立狀態。與中央關係極不正常。政府有意加以調整，但以鞭長莫及，只得忍痛罷手。茲以追剿殘共，使免爲害地方，大軍所至，閭閻不驚，西南地方當局，感激中央德意，內向之心，始油然而生。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八月，開辦軍官訓練團於峨眉山之報國寺，西南軍隊亦逐漸納入軌道，而西南統一於中央的局面，由是才成事實。抗戰軍興，西南之得以成爲抗戰根據地者，謂非造端於追剿殘共，吾不信也。如以贛南共軍突圍，爲「失之東隅」，則統一西南，也可以說是「收之桑榆」了。

第八節 張英部的改編

我在本章第三即中說：幾年來剿共勞而無功的原因之一，是因爲剿共部隊良莠不齊，甚至有的腐化惡化，爲人民所痛恨，致共區有「寧可給匪殺，不可給兵紮」之語。以這樣比共軍還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顧及眼前的利害，當然寧願爲共軍所裹脅，而不願幫忙國軍剿共了。

張英所部一個師的剿共部隊，就是江西人民痛恨已極的一支部隊。他們本來都是川軍，在四川也許就因爲紀律太壞之故，不能立足，所以才被調至江西永豐來。不想調防以後，故態依然，其爲害人民之烈，有出入意表者。如包裝泥土偽充煙土強迫人民收買一事，恐怕就是這支部隊獨家的傑作。至於派糧派款姦淫擄掠等事，尤屬司空見慣，不足爲奇。老實說這種部隊實在比共軍要厲害的多。就剿共工作的前途來講，他們實在給共軍幫了大忙。因爲他們成了剿共部隊的害群之馬，他們給整個剿共部隊做倒了招牌。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九月，我做了一件極爲遺憾的事，就是我把張英的部隊給解決了。當時何敬之（應欽）先生任軍政部長兼南昌行營主任，我做了這樣一件大事，無論就軍政系統或軍令系統來講，都應事前向他報告，更加上行營內部分人員正謀利

用張英所部，以整編爲名，藉便安置若干職位，尤不可操切從事。可是我因爲秉承委員長指示，待機解決該部，並不准事前通知任何人，必須絕對保守機密，我祇好準備一有機會，即不顧一切的做了，事後再行報告，並自請擅專之處分。而何主任在未接到我之報告時，已先接到張英報告。因之非常憤怒，並決心辭職，幾乎使我無法解釋。雖然我做此事也是有所秉承，但不願使何兼主任對委員長有所誤會，祇有引咎請罪，不料何兼主任電報委員長時，得委員長覆電竟說明是他命令我做的。因此使何兼主任更加深誤會，無異火上澆油，因而益堅其辭職之決心。後雖經過許多周折，卒使此一誤會渙然冰釋，但我在事隔三十年後的今日想來猶感遺憾萬分。茲特錄當時辦理此事有關文電數通於後，一以表示我對委員長愛護的感激，一以表彰何兼主任的大度並以誌吾之短。

上何部長電 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查現在各部隊軍紀廢弛，均有整頓之必要，而尤以雜色部隊如張英所部，更爲切要。至該部情形爲鈞座所深悉，而整頓方法，緩急容有不同。如曠日持久，爲害地方，影響剿匪情勢，愈形重大。此次職軍班師回防之便，令張英將部隊交還中央改編整頓。實本鈞座整頓部隊之意旨，及職個人良心所主張。對於該部，認爲若不乘此根本改編，縱不淪爲赤匪，亦必爲匪所滅。與其貽患將來，曷若未雨綢繆。所顧慮者，固爲投鼠忌器，然每思一再因循，將來愈不可收拾。故敢迅即處理。雖爲其他以軍隊爲個人工具之少數軍閥所側目，亦所不惜。惟職事前未及呈報，擅自專行，獲罪實深。懇請嚴厲處分，以資儆戒。職祇求有補於黨國，決不辭任何艱險。冒昧之處，尚懇垂宥爲幸。

何部長覆函 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頃奉手翰，藉悉一一。查整頓軍隊，弟已久具決心。兩月前具呈委座，曾主張國事危急至此，非整理軍事，實不足以圖挽救。整理之道，首從節約，必使軍費收支適

合爲準。此後部隊凡有紀律不良擾民有據者，解散之。殘損過鉅不足編制者，裁撤之，兵械缺乏者，暫不補充，零星單位，量予歸併。編制以外，不得添設部隊。夫而後能用其餘力以謀素質之改善，與實力之充足。使平時具經濟之軍備，戰時成強固之國防，區區之意，與吾兄實不謀而合。其所以遲迴審顧不即著手者，以前方正值剿匪，而亟須整頓之部隊又過多，一有舉動，恐致影響全局也。今吾兄乘部隊回防之便，將張師切實改編，一片公忠，正深佩慰。惟此事自始至終，弟竟無所聞知。當事情發動之初，爲免洩漏機密，或者不便電告。但周劉兩師既達永豐，並令張英繳械之時，似不妨舉以相告。乃因未得吾兄報告，致弟莫明真相，對張師真西電尚婉復力加安慰，謂吾兄決不爲此。今事實竟出兩歧，張師官兵，轉以相詰，眾口騰說，弟將何詞以對？此則偶因一時手續程序之差誤，而令弟深用愧懼失威信於他人也。吾兄並非外人，乎素知愛尤深，因來書論及整頓軍隊之重要，特併將弟平日所主張者覩縷奉聞，高明如兄，定荷鑒諒。

再上何部長電 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奉讀手諭，謹悉種切。鈞座公忠謀國，無任欽佩。惟以職一時措置疏忽，致使鈞座失信於張部官兵，聆悉之餘，益增惶悚！職處理此事，未曾預先稟報，擅專之罪，實不容辭。而所以貿然行之者，乃恃追隨鈞座日久，個性爲鈞座所深知，且自信處置完畢後，定能邀鈞座同意耳。然法紀不可不遵，再三思維，惟有懇乞鈞座明令懲職，俾職亦得稍獲中妥。倘鈞座稍存客氣，致影響團體精神，則職惟有赴京待罪耳。

何部長復電

刪戎電奉悉。業密。此事已成過去，望兄千萬不必耿耿於懷。惟嗣後遇有此種重大事件，委座雖有密令於兄辦理，當時務請通知弟處，以免應付困難也。

上委員長電 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張英師軍紀廢弛，爲害地方，且其官長素質原屬匪類，將來勢必不出投匪或爲匪所滅之一途。尤其玩忽命令，貽誤戎機，於剿匪前途更不堪設想。職奉鈞座意旨，及良心主張，於此次班師回防之際，密令羅、周、劉、李等師，慎重接收永豐、吉水防務，並以奉鈞座令著張英自動將部隊交還中央，以便確實整頓。惟事出倉卒，未及預先呈報鈞座及部長。昨謁部長始悉部長已另有整頓該師之妥善計畫，且以解決張部則川軍心寒，不免有投鼠忌器之害。其用意確係顧全全局。惟張英已將職以鈞座名義令其將部隊交還中央之命令轉報部長。恐部長有鈞座事前不先通知及職未行報告之芥蒂，如此則職獲罪良深。懇鈞座嚴懲職擅自專行之罪，或將職此電轉部長以釋部長對鈞座之誤會。職無論何事，祇求有裨於黨國，個人犧牲在所不惜也。再解決情形待得前方報告當即呈報，臨電不勝待命之至。

委員長復電 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昨接何邯長文予電，已復一電文曰：「良密。前據辭修來漢面稱，張英師軍紀廢弛，民怨沸騰，擬切實改造等語。當時以兄未在南昌，故經令其相機處置，並囑如時機未到，切勿操切，故未有直接命令。但周劉兩師現既已執行，勢成騎虎，不如即以命令張英遵照改編，免貽後患。尚希妥爲處置爲要等語。」特復。

再呈委員長電 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張英部改編，職負全責，爲執行便利，遂未預告鈞座及敬公。雖經職引咎，再三解釋，而敬公不免有芥於懷。職再三思維，惟有懇祈鈞座明令懲職以擅專之罪，庶敬公得稍獲心安。不然互信不立，精誠不固，影響前途甚大也。處茲亂世，惟有勞怨自任，方可挽回頹風。區區愚忱，千乞採納。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委員長復電 二十一年九月十七日

刪電悉。忠密。弟能識大體而顧全公私，每令中正於苦難中恆得以自慰，而不至抱悲觀者，亦唯賴此而已。弟處理此事，手續原有欠缺，本應當時即行處分，徒以事多疏忽，致滋誤會，今已另定處分矣。

不久，處分令頒下，內開：

該總指揮驕矜自擅，不遵意圖，著即降一級並記大過一次，以明功罪，而昭賞罰。此令。

我受到此項處分：心裡反覺泰然。因為替國家除掉了一支害民的部隊，是應當有代價的。僅僅我個人受到一點處分，這代價實嫌太輕耳。

我當時遇事敢作敢為的情形，大率類此，實緣太不明事故之所致。今日事故懂得多了，可是也老而無用了。

第九節 仰止翠微峰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雖是一篇寓言，但當歷代兵荒馬亂之際，類似桃花源那樣可以避亂的地方，往往有之，並不一定是幻想。善良的老百姓，為避兵災，臨時逃了進去，因而得以全活的，為數極眾。

臨時逃難的老百姓，目的不過就是逃難，能夠保全性命就夠了。他們既不想跟誰爭，也無意跟誰鬥。所以歷代爭戰的當局，對於逃難的老百姓，多半網開一面，並不斬盡殺絕。像黃巾賊不入鄭公鄉，見鄭玄即拜，更可見強盜也是有人性的，不一定都以濫殺無辜為能事。

世間惟有共軍才專以濫殺為得意傑作。他們對於逃難的老百姓，已然逃到與世隔絕的深山之中，也不肯貸其一死，還要圍攻他們，直到一一死盡才算完事。

江西寧都縣西北山中有一個翠微峰，便是避難人民被共軍迫害集體死亡的一個所在。

翠微峰是金精山十二峰的土峰，在寧都縣城西北，離城約十里。峰極高峻，兩山壁立，中僅一線之路，可貫通上下。形勢奇險。峰頂有良田二十餘石，房屋數十椽，可供二三百人棲止。民國十七（一九二八）至二十年（一九三一）間，附近居民憤共黨肆虐，相率上山，誓與共黨絕。寧都時陷時復，人民亦時來時去，已經過了三四年這樣的生活了。二十年十一月，我二十六路軍一部以寧都叛投共黨，寧民又登翠微峰避難者六百餘人。由溫子和、藍渭臣、季思學等率領之，並有步槍百餘枝，槍十餘枝，據險自衛，與共黨隔絕。共軍對於這批難民焉肯放過，於是就開始圍攻。然因山勢奇險，屢攻不下，且頗有傷亡。山上難民亦以人多糧少，供應困難，健壯者因擬縋山逃亡他處，以便節省糧食。但因山高索朽，大多墮崖而死。共軍於二十年十二月，開始攻山，難民誓死拒守，直至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十二月十九日，終為共軍攻破。山上因食糧不敷分配，早已發生「析骸易子」的慘象。國軍雖曾數度派機空投糧鹽彈藥，卒因峰高地峻，拋投不易，而無濟於事。山破之日，難民或投井，或自殺，或父殺其子，夫殺其妻，而後自殺，全山數百人，無一倖存者。

翠微峰難民死事之烈，方之田橫五百義不帝漢故軍，實無遜色，嗚呼！可以風矣。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十月，我軍再克寧都，見城郊各處，白骨累累，慘不忍睹，乃收集而叢葬之，名曰「義民公墓」。我三路軍副總指揮羅卓英君為作碑記云：

史載黃巢李闖張獻忠之徒，其政令之苛，焚殺之慘，往往違反人性，出乎人類想像之外。曩以為史官或恨之極而甚其辭也。近年赤匪倡亂，各省騷然，國本幾為搖動，民生坐於塗炭。其間被害最久，受禍最深者，莫贛南若。余奉命來贛，前後五載，幾走遍全省。凡耳所刺，目所擊，匪所加於農村與民眾者，視黃巢李闖張獻忠殆有過之

而無不及焉。始歎史官不欺而民可哀也。赤匪竊據贛南，以瑞金爲偽都，寧都爲偽省，嘯聚無賴，裹脅善良，朝夕以分田共產之說相號召。而民眾所受者，食無鹽，居無屋，穿無衣，用無物，偶語者棄市，逃亡者誅戮。蓋匪徒口言同志，而手刃骨肉，不從者，雖父母兄弟妻子之親投之無赦也。一人觸其怒，則株連一家，甚或一村，洗之無遺也。其屠殺手段，盡效古酷刑，而更創新格，蓋皆違反人性，出乎人類想像之外者也。余二十年七月收復寧都，聞寧民死於匪者以千計。而當時避居翠微峰黃竹寨之民眾困守八閱月，尚獲無恙。去歲（二十三年）十月再克寧都，則盈城瓦礫，滿眼蓬蒿，白骨累累，嶽峙荒野，翠微峰之難民數百人，寨破之日，男女老幼，無一降者，亦無一倖存者。赤匪雖極其違反人性之殘暴，然吾民義烈之氣，直薄雲霄，誠足以勵末俗樹楷模矣。每過西郊，睹狐餒餘，殘骸遍地，問之，則民眾殉難處也。亟爲收斂，得髑髏五百餘，肢骨無算。爰就其旁闢爲叢葬之所，命兵工築之，名曰「義民公墓」。落成之日，召集寧都各界代表及軍民八千餘人，舉行公祭，且議以墓側天花宮改建爲義民祠，俾崇祀先烈，永昭來許，而爲文記之。嗚呼！匪擾地方，吾未能保之，民眾抗匪，吾不及助之，徒令一代忠良，從容就義，長作地下無名之雄鬼。今雖爲之收葬，而臨風愴慟，寧有涯耶？

共黨殘暴在不予人民以任何形式之自由，致「不說話的自由」也不許有，人多認爲這是共黨殘暴的代表作。但我覺得不許人民有逃難的自由，恐怕這也只是共黨才做得出來的事。今日鐵幕邊緣對於逃亡難民，輒予槍殺，可見此爲共黨普遍一貫之作風。殘民以逞的政權到了共黨的這種地步，若說他們可以持久不敗，無論如何我也無法相信。

翠微峰的數百難民，不惜集體自殺以爭自由，就是共黨必敗的保證。其義烈之風，使人生高山仰止之感，猶其餘事耳。

第十節 第三路軍追悼陣亡將士

從十七年（一九二八）開始圍剿江西共黨起，至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底，共區收復殘部西竄止，戰場上和地方上的損失如何？全軍傷亡若干？全部俘獲多少？以及整個戰果如何？這一類的問題，不是我這裏所能答復的。我只能就我手邊所有資料，提出一些有關第三路軍的統計數字。第三路軍是五次圍剿期間「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總司令部」所屬的一個作戰單位。而北路剿共軍又是南昌行營所屬各路剿共軍中的一個作戰單位。所以有關整個剿共軍事的問題，當時要問南昌行營，應可得其全貌，現在恐怕只有到國防部史政局去查檔了。

第三路軍既是五次圍剿期間的一個作戰單位，五次圍剿開始於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結束於二十三年年底，所以第三路軍所能提出來統計數字，也是限於這一年以內的。其要如下：

一、三路軍陣亡官長 二六八員

二、三路軍陣亡士兵 二七七四名

三、三路軍負傷官長 七二五員

四、三路軍負傷士兵 七四二九名

五、三路軍消耗步槍彈 五百餘萬發

六、三路軍消耗機槍彈 四百餘萬發

七、三路軍消耗迫砲彈 一萬餘發

八、三路軍消耗手榴彈 八萬餘發

- 九、三路軍消耗山砲彈 二千餘發
- 十、三路軍消耗卜福斯山砲彈 二千餘發
- 十一、三路軍斃傷共軍 一萬餘人
- 十二、三路軍俘共軍軍官 一五四員
- 十三、三路軍俘共軍士兵 四四五八名
- 十四、三路軍繳獲步馬槍 五一二六枝
- 十五、三路軍繳獲輕機槍 六七挺
- 十六、三路軍繳獲重機槍 六〇挺
- 十七、三路軍繳獲手槍 二百餘枝
- 十八、三路軍築公路 六百餘華里
- 十九、三路軍建碉樓 三七五八座
- 二十、三路軍建堡壘 二五二二座

單就傷亡的數字來講，雙方都是萬餘人。（人民死於非命者三十餘萬人）由此可見我們收復的幾座堅城和大部份共區，都是一滴血對一滴血，一條命對一條命換來的。再就彈藥的消耗和武器的繳獲情形來講，得失也約略相當。惟有我們建築的公路相碉堡，便利了軍民的交通，保障了軍民的安全，頗有相當久遠的價值。這種收穫可說大半都是我們將士汗水換來的。羅卓英兄在軍中提出一句極有價值的口號說：「多流汗，少流血」，給軍工築路建碉作業奠定了很大的心理基礎。而柳際明兄於任第五十二師參謀長時，首先提出建築碉堡計畫，其功尤不可沒。（德顧問塞克建議築碉，似在柳

際明之後)本路軍傷亡萬餘人，假如不是羅柳兩兄的貢獻，其數恐不止此。羅卓英兄對於剿共軍事另一偉大貢獻，值得在此一述。即在五次圍剿之前，薛伯陵(薛岳)兄奉派到軍中服務，一時無適當職位可資畀倚。時卓英任第五軍軍長兼第十八軍副軍長，情願以第五軍軍長相讓，而專任十八軍副職。伯陵為一極卓越之將才，自此獨將一軍，與我所部互為犄角，虛實攻守相互為用，共軍聲勢為之大蹙。伯陵之功業偉矣。然使無卓英之讓德可風，當時可能無用武之地。故伯陵之成就，卓英與有力焉。我與卓英共事數十年，其為人也，不爭功，不諉過，和上下，化異同，有將帥風度，亦為傑出僚佐，其平生行誼，多能使人景佩，而讓賢一事，尤足永式。五十年(一九六一)十一月六日，以宿疾不治逝世，緬懷高風，感傷曷既！

戰場上有效的智計，足以減少傷亡，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不過最後勝利的獲得，還是要靠有衝鋒陷陣的敢死之士。我們可以說：沒有成仁的先烈，是不會有成功的英雄的。即使大家成仁成功的志願相同，機會均等，但到後來卻仍不免有幽明異路之結果。此中緣故，哲學家歸之於「莫之致而至」的所謂「命」，其說之是否有據，姑置不論，但「有幸有不幸」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站在後死者的地位，對於成仁者的先烈，能無動於衷乎？能不為之悼念以誌不忘乎？因此在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十二月二十五日，本路軍在寧都軍次，就舉行了一次本路軍陣亡將士追悼會。

這次追悼會開的很悲壯很隆重。到會各機關各部隊代表及民眾約八千餘人。由國民政府林主席代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委員長代表預備軍總司令陳調元，及行政院汪院長代表政務處長彭學沛主祭。我適因胃疾發作在滬就醫，未能及時趕回，大會一切由羅副總指揮卓英主持進行。是日撫州、南城、廣昌等十二縣，因俱有陣亡將士血跡，均下旗誌哀。先後參加本路軍剿共者，計有第三師、第四師、第五師、第六師、第八師、第九師、第十一師、第十三師、第十四師、第二十四師、第四十三師、第四十六師、第六十七師、第七十九師、第八十五師、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第八十

九師、第九十四師、第九十六師、第九十七師、第九十八師、第九十九師、補充第一旅、行營砲兵訓練處山砲第三營、卜福斯山砲營、稅警團迫砲營、二十三師重砲連等二十八個單位，事先均經通知抄寄陣亡將士名冊以便安設靈位。其有遺容遺著及其他遺物者，並請送會一併陳列，以供萬眾瞻仰。

大會收到祭誄文字以及輓聯輓章等數百件，與烈士傳記及烈士題名錄等，於會後彙印《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追悼陣亡將士紀念冊》一種，以資紀念，而昭永式。

我和羅副總指揮的一篇祭文，稍稍吐露了我一點當時不能自己的悲懷，錄之抄後：

維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總指揮陳誠、副總指揮羅卓英，謹率全體官佐士兵，虔具香花果品不腆之儀，致祭於本路軍剿匪陣亡將士之靈位前而言曰：嗚呼！戡亂救民，軍人之責，況當赤匪猖狂之際，神州鼎沸之時，不有犧牲，冬簧能擒渠殲寇，而奠定復興民族之始基。慨自群匪亂華，於茲八載，萬民淪於溝壑，國家陷於傾危。尤復外倚強鄰，內連巨寇，以贛閩為窟穴，湘粵為門楣。更圖進據中原，毒流全國，肆其鼓簧之舌，愚我群黎。迹其披猖殘虐怙惡逞兇之狀，實速甚於明末闖獻之所為。又兼廢棄綱常，推翻禮教，竟將五千年中國文化，摧毀靡遺。嗚呼！匪亂以還，吾民血濺黃沙，屍膏原野者，其數幾不可以詳稽。此革命領袖之所以躬親督剿。為縱深之配備，暨五省之合圍。凡我同胞，無不攘臂而起，爭為前趨，願使碧血奔流於川澤，白骨共砌於城隍。詎忍盜弄潢池，長稽顯戮，至今哀鴻遍野，政象全非。因是五次進剿之役，驚天泣地，奮勇決鬥，有我無匪，有匪無我，犧牲之烈，洵教鬼哭而神悲。人固貪生惜死，喜逸惡勞，奈民族已瀕於絕地，實不容有尺寸之推移。諸烈士編入三路序列，任務似較各方為重，處境亦較各方為難，蓋正當匪燄之薰灼，直抵匪窟之心脾。禍國之賊，不稍悛悔，且更頑強抗拒，多方誤我，以冀為困獸之苦鬥，伺國軍之倦疲。而我忠勇將士，滿腔義憤，橫戈躍馬，猛進

不迴。夜停酣臥，朝罷晨炊。誰甘怯弱，亦不狐疑。戕群匪之頭顱，真堪一飽，喜亂離之歸化，更可療飢。其襟懷之坦白，人格之偉大，爲國捐軀之壯烈，殆亦歷史所少見，先烈所憑依。誠等忝縮軍符，協總師干，艱難共濟，甘苦備嘗，亦無戰不誓同生死，無役不盡力趨陪。於諸烈士之經歷，彌數計而周知。黎川、硝石、樟村、橫村、南豐、白舍、三溪圩、新豐市諸役；廣昌、驛前、貴橋之戰，率皆衝鋒陷陣，殲其渠魁。以血肉與群賊相搏，縱一一以馬革裹屍還葬而不辭。又奚怪乎以怕匪而轉爲仇匪，以避匪而轉爲找匪，使昔之驕恣悍惡，割地殘民者，胥皆聞聲潰竄，望風披靡。而我將士則波流熱血，白骨相撐，河山爲之寂寂，風雨爲之淅淅。嗚呼！嵐煙瘴毒，僻壤窮鄉，居則沐雨櫛風，給養常絕，行則兼程並進，負載奔馳，駐則修碉築路，手胼足胝，戰更捨命效力，視死如歸。一年以來，本路軍之沙場埋骨者，計數已三千有奇。斯皆炎黃之苗胤，民族之精英，同甘共苦，患難相持。在諸烈士成仁取義，蔭子立廟，血食百世，固戚元敬之所謂便宜，誠等則緬懷過去，如喪手足，寧不感念而獻歎。際此剿匪初平，卑力撫綏，芳來黎庶，招輯流離，收復地區，均已噓枯回生，漸具活力，益徵諸烈士之犧牲爲不枉，九泉亦足以自怡。矧劫後人民，幸慶更始，疇不禱祀而涕湊。嗚呼！追悼聲中，三軍縞素，予懷若結，墮淚沾衣。第實際妥慰忠魂，完成遺業者，又不全恃香花之供獻，而恃國難之消弭。哀哉後死，一息尚存，引企邊疆，羞仇重疊，願英靈之呵護，即展旗而東開。吾人信念，如何謀國恥之蕩滌清除，如何謀民生之自由平等，誓本諸烈士生前互勉互助之教義，繼續奮鬥，完成國民革命之紀錄，用奉告於冥垓。嗚呼！每談往事，痛哭徘徊，同生共死，夙願全乖。惟聞雞以起舞，免歲月之空催。倘真誠之可格，必有動於泉台。歇楚些兮聲咽，忠魂英魄兮童其歸來。嗚呼哀哉！尚饗。

輓聯中以本路軍第九十七師孔師長令恂的一副，最能道出五次圍剿的歷史意義和價值，與夫功成身死者之可痛，聯云：

自大庾之北，至鄱湖以南，數百里間若山若水若草若木，重顯精神，此後春秋佳日，士女遊觀，會須安享承平，可曾知執銳前趨，拋幾許頭顱，灑幾多熱血！

戰東陂以還，倡廬山之訓，二三年內曰禮曰義曰廉曰恥，另倡生活，迄今風氣日新，人心丕變，卒克削平禍亂，最堪痛功成先死，贏兩行清淚，博兩字忠貞！

在我們那篇祭文中說：「第實際妥慰忠魂，完成遺業者，又不全恃香花之供獻，而恃國難之消弭。」必如此，我們後死者的後死，才是有意義的，在良心上也才對得起我們成仁的先烈。然而今日如何，大陸已成鬼域，同胞俱陷千古未有之慘境，如不急起直追，消弭今日之國難，則我們先烈先死的代價，真不過是「兩行清淚」、「兩字忠貞」了，我們還有面目見人嗎？

第三章 邊區清剿

第一節 湘鄂邊區清剿

共黨自在贛南建立偽中央後，共軍大股雖均集中於贛南、閩西一帶，但許多小股則仍肆擾於湘鄂豫皖各省，以分我剿共兵力，並互相呼應，以為擴大共區之計。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五月委員長受命為豫鄂皖三省剿共總司令，積極剿辦盤據豫鄂皖邊境大別山區，及盤據江漢之間洪湖一帶之共黨。前者的首領是徐向前，後者是賀龍。至是年冬季兩地共軍均為我軍各個擊破，共區亦次第收復。惟徐賀兩首領均未成擒，徐率殘部竄入川陝邊界之大巴山區，賀則領其餘眾竄入鄂西鶴峰一帶。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五次圍剿開始，鄂南及贛西北各股共軍葉金波、孔荷寵等部，均為我西路軍所擊潰，獨盤據贛西南之共軍蕭克一股，實力原極雄厚，並以狡悍著稱。西路軍雖曾予以打擊，但難傷其要害。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八月，該共軍見我封鎖合圍之勢將成，仍裹脅萬餘人，於遂川以北之衙前、五斗江一帶，突圍而

出，直向川黔湘邊區竄去，圖與賀龍所部會合。是年九月，竄至黔北之錦屏，與賀龍遙遙相望。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秋，蕭賀兩股卒得會合，而將湘西之桑植縣城攻陷。旋即進據石門、慈利兩縣所屬澧水北岸一帶地區，其勢甚銳。查其意圖，一面似在牽制我軍對贛南突圍共軍之追剿，一面似有攫據鄂西，控制長江上游之野心。故剿滅合流後之蕭賀兩股共軍，遂為一時當務之急。

委員長有鑑於此，因於二十四年十月十日設立委員長行轅於宜昌，專負清剿湘鄂邊區蕭賀共軍之責，並派我為行轅參謀長，秉承委員長意旨實際推動一切。

賀龍所部在共軍序列中號稱第二軍團，蕭克所部則為第六軍團，兩股合流後，合編為偽第二方面軍，並組織偽「湘鄂川黔軍分會」，以資號召。第二軍團轄第四、第五、第六等三個師，第六軍團轄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等三個師。另有直屬偽軍分會的幾個獨立團，合計總人數約三萬餘人，步槍兩萬餘枝，機關槍七十餘挺，迫擊砲十門，山砲兩門。

行轅成立後，除將原有湘鄂兩省剿共部隊納入指揮系統外，並加入中央直屬部隊，以增厚進剿實力。各軍編組及進剿前之態勢如下：

一、第一路軍總司令何鍵，轄第十五師、第十六師、第十九師、第六十二師、新第三十四師、獨立第二旅。總司令部設常德。大部集結湘鄂川黔邊境永順、招頭寨、龍山、酉陽、秀山等縣。

二、湘鄂川邊區剿共總司令徐源泉，轄第三十四師、第四十一師、第四十八師、第八十五師、獨立第三十八旅、新編第三旅、新編第四旅、湖北保安團、湖南保安團。總司令部設鄂西恩施。大部集中鄂西來鳳、五峰兩縣間鄂湘邊境線上。

三、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轄第二十七師、第三十師、第三十一師、獨立第四十四旅。指揮部設宜都。集結宜都以南五峰以東湘鄂邊境線上。

四、第二路軍總司令兼前敵總指揮薛岳，轄第一縱隊指揮官樊崧甫，所部有第二十八師、第四十三師、第七十九師、第九十七師。第二縱隊指揮官郭汝棟，所部有第二十六師、第九十八師、第六十三師。預備隊第一〇二師、一〇三師。第一縱隊指揮部設宜都，第二縱隊指揮部設百戶司，第一縱隊向石門、慈利兩縣之合口、新安、通津橋等地集結。

五、湘鄂邊區剿匪總指揮部副總指揮湯恩伯，轄第四師、第四十師、第八十九師。在湖北陽新、通城一帶集結待運。

根據江西剿共經驗，委員長「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指示，自仍為此次剿共的最高原則。依照宜昌行轅組織大綱之規定，凡屬剿共區域以內之政治設施，行轅有指揮監督之權。因此對於整飭吏治、組織民眾、封鎖共區、辦理急賑、撫輯流亡、整理團隊、促進生產諸端，我們都盡其所能的督飭所屬認真辦理。消極方面，我們希望由安定民生，做到不致為淵馘魚為叢馘爵；積極方面，我們希望因改進民生，做到爭取共區民眾棄暗投明，相率來歸。

宜昌既為發號施令的中心，因其地勢衝要，足以屏藩川黔，控制湘鄂，所以我們經營宜昌，也是不遺餘力的。我們當時有一種假想，就是國家遇有緩急之時，宜昌應能發揮薛邑之於孟嘗君、晉陽之於趙襄子的作用。可惜行轅因剿共工作結束而結束，為時前後僅及半年，我們的理想終於無法實現。

在軍事方面，我們決定採取分期進剿計畫。仍以築碉修路為逐漸縮小包圍圈的手段。第一期以樊縱隊進占磨崗隘，其餘部隊則先鞏固自石門、慈利、大庸、永順、龍山、來鳳、鶴峰至走馬坪間之碉線，限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第二期在恩施、來

鳳、宜都、漁洋關、慈利、永順等地，屯足糧彈。第三期，抽調勁旅，分由走馬坪、龍山、江垭各方面同時向桑植共區推進，以期一鼓盪平。

至十一月二十日，我軍第一期計畫，即近完成，五次圍剿贛南共軍的情勢，又重見於湘鄂邊境的共區。蕭賀兩酋，何等狡黠，焉有坐以待斃之理，所以他們把部隊向西移動，顯然已作突圍打算。時共區南面為何鍵所部防地，兵力較為單薄。又何部與共區西面擔任防務之徐源泉部，素質及戰力均較薄弱。故西南兩面，本部有增兵之必要。行轅審度此種形勢，原擬調湯恩伯部集中大庸附近，以補何部兵力之不足。嗣因委員長來電查詢用意，我們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呈復云：

(一)湯部使用於湘西，可誘起湘軍之士氣，如股匪向南突圍時，並可作有力之截擊部隊；(二)大庸向桑植進剿，是為攻匪心腹，桑植收復，則全匪區可望瓦解，並可與孫、樊、吳各軍分進合擊，使匪不能東西兼顧；(三)大庸後方輸送補給較易，且湘西兵力單薄，恐湘軍不能堵截也。但現仍遵鈞旨已令湯部集中宜都矣。

不想共軍果然擇定兵力單薄的潭口、老鴉口二處（均在大庸東北）突圍南竄。他們除以蕭克所部第十八師及一部獨立團隊留置共區外，其餘傾巢而出。時潭口、老鴉口守軍僅有何鍵部第十九師之一個營，眾寡懸殊，無力阻擊，共軍遂突圍得逞。

行轅於二十一日，從各方獲得共軍突圍情報，立即作如下之緊急處置：

一、命樊縱隊集結慈利附近。

二、命徐部延伸防線，接替何部一部分防線。

三、命何部立即先以第十五師，隨後再陸續抽出其他部隊，馳處大庸西南方之後坪集結，與樊部夾擊逃竄之共軍。

四、湯部暫在宜都停止待命。

隨著情況的變化，追剿逃竄之共軍與清剿共區殘部，因关系地方军政，必須分別辦理，始克有濟。乃一面電呈委員長建議，一面親赴長沙就商于何兼總司令。時何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雖兼任總司令職務，事實上不常在軍。

十二月十四日，經委員長決定：

一、派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指揮劉建緒所屬陶廣、李覺兩個縱隊，及樊崧甫、郭汝棟兩個縱隊。

二、徐源泉及孫連仲所部繼續擔任清剿桑植共區。

三、湯恩伯部集結長沙、湘鄉間待命。

突圍共軍經我追剿部隊銜尾追擊及迂迴截擊，一再改變其逃竄路線，先後經辰谿、溆浦、龍潭、隆迴司、江口、瓦屋場、武陽、城步，折向江西街、芷江、晃縣，進入黔東的玉屏、江口、閔家場烏江東岸一帶地區，沿途焚掠一空，人民慘遭浩劫。在追擊過程中，擊斃偽團長劉漢卿、黃炳元二人，俘官兵百餘人，沿途共軍遺屍四五千具。擄獲共軍武器步槍七百餘枝、機槍一挺、駁殼槍十餘枝。我軍亦傷亡營長四員，官兵六百餘人。

共軍竄黔後，除郭汝棟縱隊外，再派郭思演縱隊及郝夢齡軍佈防烏江西岸，川省亦以許紹宗師推至酉陽、秀山等縣，萬耀煌師集結綦江，擬聚殲共軍於烏江東岸。嗣因川黔兩省部隊，原屬重慶行營序列，且本行轅遠在宜昌，指揮補給亦多不便，因呈奉委員長核定，所有追剿蕭賀兩酋的軍事，改由重慶行營統一指揮。宜昌行轅的追剿任務，至此遂告終止。

至蕭賀兩酋留置桑植之共軍，經我徐、孫兩部於十一且二十日開始清剿，至十二月十八日收復桑植縣城，至于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一月二日，整個共區均已肅清。斃敵千餘人，包括偽十八師師長張振崑及參謀長團長等多人，俘敵一千三百餘人，包括偽團長周雅懷、彭正南；政委周海臣、王學勤等。

此一剿共戰役，蕭賀盤據的共區雖經肅清，使鄂西及湘鄂川黔邊區一帶，重獲安堵，後來在抗戰期間很發揮了拱衛陪都的作用，但蕭賀兩酋終得免脫，與圍剿贛南的情形如出一轍，未免同樣使人有功虧一篑之感。

事後檢討此次剿共未能完滿達成任務，其故有四：

一、剿共兵力（含量與質言）仍嫌不夠。所謂「十則圍之」，實為古今外線作戰不變之原則。可是我們這次剿共的兵力，就不夠這個條件。

二、何鍵所部湘軍，各部未能協同作戰。劉建緒以主力置於永順、龍山線上，而慈利、大庸、永順間三百六十里防線，卻責由十九師李覺部五個團擔任，輕重失序。

三、湯恩伯部轉運千里，未接一戰，這是一大憾事。此事全怪我事先部署時，未能詳申意見，致使委員長查詢究竟，不及適時使用，我是咎無可辭的。

四、廣西方面原同意出兵兩軍，協同堵剿，但不肯開出桂境，致使再次可以合圍時，又得乘隙脫出。為什麼省區邊境地帶最易長養盜匪，其故在此。

第二節 晉西清剿

由贛南突圍西竄的共軍，衝過湘、桂、滇、黔、川、康、甘、陝各地國軍的追擊和堵剿，狼狽萬狀，但終於抵達接近俄境的陝北，定居下來，作為繼續叛亂的又一基地。

陝北本為共軍劉子丹股久經盤據之地，贛南殘部逃來後，遂即合而為一，共有三萬餘人。此一合併後的共區，素極貧瘠。隨著聲勢的擴大，供應愈感困難，彈藥尤形缺乏，根本無法補充。

贛南殘部是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月開到的，至二十五年（一九三五）年初，共區境況日非，如不向外發展，勢將無以圖存。因於二月二十日，由毛澤東、彭德懷、林彪、徐海東、劉子丹等分率兩萬餘人，傾巢竄入晉境，以圖發展。

據當時的情報，他們竄晉計畫，首在截斷同蒲路，席捲晉南富庶之區，以舒久困，並進而顛覆山西當局的統治，以求擴大共區。然後希望進出冀察綏等省，掀起國際糾紛，促使中日戰爭早日爆發，藉為從中取利之計。所以他們當時竄擾的口號，是「東行抗日」、「民族革命」、「一致抗日」等等，可見共黨的陰謀是十分狡詐的。

共軍是由石樓縣西方的三交鎮及辛關渡兩地，強渡黃河，竄入晉境的。三月十日與我山西部隊第六十六師楊效歐部發生戰鬥，並未得逞。乃改變計畫，分向南北兩路竄擾。除以一部留置中陽、石樓兩縣地區潛伏，掩護後方交通外，即以偽第十五軍團數千人，經文水、交城，北竄嵐縣、興縣；另以共軍主力第一軍團，竄擾晉南。同蒲南段之霍縣、趙城、洪洞、臨汾、曲沃、襄陵、翼城、浮山，以至侯馬各縣，除縣城外，縣境均為共軍所據。

山西自民國成立後，即為閻伯川（錫山）先生所統治。此時閻先生正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兼太原綏靖主任的名義，為晉綏軍政的負責人。此次突遭共軍竄犯，太原情勢危急，人心惶惶。許多軍政要人的家眷，都已護送出境。中樞知其如此，一面電囑全力防剿，一面示意如有必要，中央願派兵助剿。並可聽其指定認為適當之部隊開入。他們當即召集高級將領開會，以作決定。會中提出三種不同意見：一、全憑自力

對付，不願中央及任何部隊入晉。二、先盡自己的力量打，至認為無望時，再請中央軍開入。三、請中央軍即刻開入協剿。

結果第三種意見，被勉強通過，並決定請調商震所部之一四〇師暨一四一師，以及關麟徵之二十五師為入晉協剿部隊。委員長指示入晉兵力以不超過晉省兵力為度。我當時認為如部隊過少，恐不能達成剿滅共軍任務，莫如多調兵力，但功成後即行撤出。委員長以為然，遂決定再調湯恩伯之第四暨第八十九師，鄒洪之四十三師，孔令恂之九十七師各一部，周晷之第六師，李仙洲之第二十一師入晉，並令胡宗南之第一軍、黃杰之第二師各一旅，亦隨時準備入晉參加。

我奉命入晉的經過是這樣的，當我於三月中旬由漢因公入京，晉謁委員長有所請示，時適有山西代表朱綬光、李鴻文、趙丕廉等三人，正向委員長請派一高級將領入晉統一指揮中央各軍。委員長已向他們提出劉經扶（劉峙）或衛立煌二人，他們都沒有接受。適我晉見，委員長就對他們指著我說：「可否要他去一趟？」他們當面不好拒絕。我以無法分身，請辭，委員長說：「你去去可將過去剿匪經驗報告閻副委員長後即回來。」他們三人都贊成了。經電省請示後，閻先生覆電歡迎，我於是有入晉協剿之役。

我於三月二十一日由京飛漢，二十三日由漢飛晉，是日狂風大作，真是飛砂走石，只得中途折回，改乘火車北上。於二十五日抵達晉垣。我囑咐乘來的火車，不要停火，等我回去，以示絕無久留之意。我當時決定此行的態度是「奉命即赴，事畢即返」。

但相閻先生晤面後，談得很投契，他決定留我不要走，並說當地我的同學很多，要誰幫忙都可以。看他的樣子，是出於至誠，我才答應暫留下來。願隨時提供意見，但不必有任何名義。閻先生隨即決定請中央派軍入晉，並建議委員長將中央軍與山西

原有部隊，編為兩路剿共軍，要我擔任第一路剿共軍總指揮，而以楊愛源為第二路剿共軍總指揮。委員長據報後當即電復同意，我至此也只好接受命令，即於二十八日在晉垣成立第一路總指揮部。內部人員大部即由太原綏署借調，雖譯電員亦不例外，藉使山西當局一切放心。

為免引起萬一的猜疑或誤會，另以三事自勉並互勉我們第一路的僚屬：

一、絕對服從閻副委員長的指揮？不使他有絲毫的不快與不便。

二、絕對竭盡智能，輔佐閻副委員長推進剿共工作，見有缺失，應本知無否盲百無不盡之義，以求有所獻替。

三、所部官兵須絕對遵守中央軍負責任、守紀律之優良傳統，嚴禁干涉地方行政，並不得向地方需索一物、介紹一人。

這樣做下來，中央與山西之間，部隊與民眾之間，的確相處得很好，雙方毫無芥蒂。從前省內反對中央軍入晉的部分人士，所慮者是惟恐中央藉此收回山西的政權，至此疑團盡釋，完全合作起來。後來經過許多事變，山西內向之心，始終堅定如一，良非偶然。

山西當局明白中央援晉別無他意後，中央後續部隊遂分別由正太路、道清路，及風陵渡渡河，源源開進省內，並進入指定之防地。其時第二路軍亦已部署就緒。其任務是進剿興、嵐兩縣之共軍，並肅清永和、石樓、中陽、離石各縣境內共軍。本路軍則負責清剿同蒲南段的共軍主力。因此將總指揮部移駐臨汾、洪洞間，以便指揮。

本路軍作戰計畫，分三期進行。第一期以打通同蒲路南段，及收復汾河東岸地區為目標。此為防阻共軍繼續東竄，並為逐漸縮小共區必要之步驟。此一期作戰任務，於四月上旬即已達成，並未經過激烈戰鬥。

第二期作戰，以第一、第二兩路軍南北呼應，將北竄及南犯共軍壓迫於軍汾公路（軍渡口經離石至汾陽）以南黃河東岸而殲滅之為目標。自四月十一日開始行動，十七、十八兩日，關麟徵部與共軍第一軍團激戰於大寧縣境之午城鎮堡村、蘇家莊一帶，大敗之。共軍素稱精銳之第二師所屬之第四、第五兩團，幾於全被消滅。

此時共軍第一軍團與第十五軍團，已全部會合，另由陝北開來共軍一股，亦東渡增援。共軍聲勢驟增，閻先生恐其突越汾河向北進犯，太原勢將不可收拾，令我至太原會商，我知道「進犯弱點」是共軍的一貫技倆，乃建議採取碉堡政策，先求鞏固現有防線，以堵共軍奔竄，並即令第一軍胡宗南部由潼關入晉加強北部軍力，然後再逐次縮小包圍圈，以作聚殲之計。當時閻先生恐委員長不願第一軍入晉，表示猶疑，我說不妨先以副委員長名義令調胡部入晉，再電報委員長，以免文電往返緩不濟急。我為此議，是知道胡宗南不會不聽命的。果然胡部遵令開到，即命其加入第二路序列，以保太原。

各部隊築碉工作，進展甚為迅速。本路軍全部防線五百五十餘里，截至五月上旬，共築碉樓經驗收給獎券，為八百一十六座，簡易的土碉尚未計入。時第二路所築碉堡，亦已大致完成。

第三期作戰，仍以殲滅共軍主力為目標。

五月三日，偵知共軍主力已逐漸西移，為防共軍渡河逃竄，本路軍與第二路軍，均抽調得力部隊由南北分途夾擊。我軍到達黃河東岸時，共軍主力均已渡河西竄，不及西渡者，僅殘部千餘人，旋即被我軍次第肅清。

這一次剿共戰役，至此告一段落。

共軍竄回老巢後，我即面請閻先生飭撥車輛運送入晉各軍一律回防，閻先生起初尚以為何必如此之急。我說中央軍主力多已集中晉省，倘他處萬一有事，中央兵力運用，即不免遭遇困難，故不如速撤之為愈。閻乃允調鄒洪、孔令恂兩部先回武漢。後來兩廣事變，這兩部兵力就都派到很大用場。

檢討此一戰役，我軍有其成功處，也有其失敗處。當共軍渡河東犯之始，其勢甚銳，其謀甚狡，其野心亦甚大。故不及一個月的時間，晉西半壁，幾全為共軍所蹂躪。然自三月底中央軍陸續入晉後，在與晉軍協作之下，亦僅以一個半月時間，追亡逐北，盡復失地，共軍除損兵折將外，不得不狼狽竄回老巢。他們的狡謀一未得逞，他們的野心全成泡影，這當然不能不說是我軍的成功。

但戰爭的目的，在能殲滅敵軍使其不能起而復抗。此次只以一步之差，使共軍主力終得渡河西去。我們作戰的目的，並未完全達成，自然要說是失敗了。

撇開軍事不談，在政治方面，自此以後，山西與中央方面建立了互信的基礎，始終不渝，可說是一種極大的收穫。此與因剿共而統一西南的情形，約略相同。老子以「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為「南面君人之術」，信然！

第三節 晉陝綏寧邊區清剿

晉西剿共軍事告一段落後，我一面辦理第一路軍總指揮部的結束事宜，一面呈請各軍復員，以求實現我「聞命即赴，事畢即返」的夙願。不料閻副委員長以共黨雖竄離晉境，但並未消滅，堅決不放我去，並電請委員長派我為「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司令」，負責完成剿共未竟之功。我既無意留晉，總司令的崇銜，尤覺不敢承當，因更堅決求去。後來經閻副委員長與委員長往返電商，決定兩點：

一、中央入晉部隊，大部復員，但仍留湯恩伯所部第四師暨八十九師；李仙洲之二十一師及關麟徵之第二十五師駐屯晉陝邊區。連同原駐陝北之高桂滋第八十四師及高雙成第八十六師，擔任殘共之清剿。

二、派我暫時擔任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仍受閻副委員長之節制。

事已至此，我只得勉強應命。即於六月一日，將四省總部組織成立。同日奉頒本部戰鬥序列如下：

一、第一路指揮官湯恩伯，屬第四師、第八十九師、稅警團之迫擊砲營。

二、第二路指揮官關麟徵，屬第二十一師、第二十五師。

三、第三路指揮官屬第七十二師、第二〇九旅、獨立第四旅、砲兵第二十四團。指揮官未派定前，第七十二師暫歸湯指揮官指揮，其餘旅團暫歸總指揮直接指揮。

四、總預備隊指揮官高桂滋，屬第八十四師。

五、守備區司令官高雙成，屬第八十六師。

六、總指揮直屬部隊為騎兵第四旅之第八團，及航空第六隊。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六月一日總指揮部組織成立，次日，兩廣事變爆發，六月五日，我即奉召離晉飛漢，以後即銜命為解決此一事變而忙迫奔走，日不暇給。八月十五日，奉命兼任中央軍校廣州分校主任，九月五日，又奉命兼任中央軍校校務委員，九月二十五日，復奉命兼任委員長廣州行營參謀長，雖然都不必負什麼實際責任，但就是名義上的負擔，也讓我無暇兼顧四省邊區剿共的事。九月十七日，中央軍校武漢分校舉行第一期學員畢業典禮，委員長派我代表前往致訓，十九日，漢口發生吉岡事件，武昌行營主任何雪竹（成濬）和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暢卿（永泰）兩先生，以事態

嚴重，堅留我幫同他們應付這件事。我們決定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周旋到底。日方知我們有決心有準備，事態反而很快的平靜下來。十月初旬奉命于役香港及廣西，分晤蔣光鼐、蔡廷鍇、李宗仁、白健生（崇禧）諸人，商協力抗日問題，十月中旬，回京覆命。方擬遵從醫生的勸告，得一短時期的休息，藉便詳細檢查一下身體。不想綏遠方面日偽竄擾，此時突告緊張，且有日軍直接進犯的消息。於是又奉委員長命，於十月二十三日飛抵太原，以與晉綏當局共商抵禦之策。計自六月五日離晉，到此舊地重遊，不問此間諸事，差不多快要五個月了。

不過當我於六月初離晉之先，四省剿共總部的工作方針，已經決定：就是一方面固在肅清西竄的殘共，而最著重的則在藉此機會建設晉綏的國防。當時的決策是：「運用中央的力量，以保晉綏，建設晉綏的防務，以保西北。」日人得寸進尺的野心，中央早已知之甚審，由侵吞東北而覬覦華北，由進擾察綏而侵據西北，是他們滅亡我國的極顯明的預定計畫。所以我們不能放鬆清剿陝北殘共的原因，也還是爲了鞏固西北的國防。犯晉共軍西竄之後，四省剿總成立，並不因我在職與不在職，而影響既定決策的推進。幾月以來，對於構築國防工事，修築必要公路，都已有相當的成就。中央撥付晉綏國防上事經費，第一期即達三百萬元，修成的公路，亦達一千餘公里。這種工作，都是在不使外人聞知的情形下進行的，後來在抗日戰爭中，都發揮了它們應有的效用。

關於邊區剿共方面，其經過情形，略如下述：

一、渡河集中及占領瓦窑堡

我軍追剿部隊，於六月五日，自軍渡開始渡河，於綏德附近集中。據當時情報得悉，陝北共軍主力，分兩路西竄：徐海東股竄三邊（靖邊、安邊、定邊），毛澤東、彭德懷、林彪各股竄阜城、環縣一帶。其留置於瓦窑堡（安定縣東南）、永平鎮（延

川以西)一帶的共軍，爲偽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各軍，及偽北路軍等。六月七日，我八十四師主力到達清澗附近。該師高建白旅於年前守清澗被圍，聯絡中斷，堅守不屈，至是圍始解。七月二日，我湯部八十九師，經激戰後，正式攻占瓦窯堡。

二、分區清剿

我軍進占瓦窯堡後，爲徹底肅清共軍巢穴，及鞏固河頭基地，再圖向西進剿起見，乃策定分區清剿及築碉修路計畫如左：

(一)以八十六師主力，集結橫山、石灣、周家簽間，構築碉線，防共軍流竄，並清剿附近散共。

(二)以八十四師構築及守備綏德、三皇茆至周家簽間碉線，及三皇茆至瓦窯堡間碉線，同時對安定附近散共，予以掃蕩。

(三)以八十九師擔任瓦窯堡、清澗至河口（黃河邊）碉線之構築，並協同第四師清剿散共。

(四)以第四師一部守備綏德、清澗間碉線，並修築綏清公路，主力清剿定家鄢（綏德東南）附近散共，至七月中旬已一律肅清。

(五)自宋家川經綏德、米脂至榆林之線以北的散共，由第七十二師、二〇九旅及騎兵第八團擔任清剿。至八月底止，宋綏線以北，螞蚱塔（黃河岸）米脂線以南的散共，均已次第肅清。

三、占領延川

由贛南逃出的朱德股，在川北與徐向前股會合。桑植逃出的蕭克、賀龍股，到處奔竄，其後朱、徐、蕭、賀均分道竄入甘境。西北剿共總部爲防堵彼等與毛澤東等股

會合，將原駐膚施、蟠龍鎮一帶的第六十七軍王以哲部及一〇五師劉多荃部，調赴平涼。本部擬會合延長、宜川一帶的孫蔚如軍，打通南北交通，以確定此後向西進剿的基礎，決定先行肅清清澗、延川間散匪，完成該線交通及碉線。經抽調第八十九師及新到第二十一師之先頭旅，由王師長仲廉指揮，自清澗向南築碉前進。九月五日，到達永平，未遇抵抗。十九日，在永平附近的太子溝、火燒溝等處，擊退偽第二十九軍及偽北路軍。二十二日進占延川城。

四、綏東戰起，進剿停頓

日寇侵華，步步緊逼，自本年五月下旬以來，增兵華北，先後已達九千餘人。一面強化冀東偽組織，擴大走私；一面嗾使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擴充蒙軍，入侵綏遠，以呵實現他們建立傀儡「大元帝國」的夢想。幸賴四省剿總成立之始，就顧慮到了這一點，當即抽調湯恩伯部應援入綏。本來陝北剿共部隊，均已派由湯恩伯統一指揮，至是乃改派高桂滋接替他的職務。但因有力部隊的抽調，剿共軍也就不得不暫取守勢，以求鞏固已經占領的地區。

五、「雙十二」事變爆發，剿共功敗垂成

因日寇圖我華北、西北的活動日益積極，我奉委員長電召由廬山隨節到洛陽策劃抗日大計。

在洛數日，因綏遠局勢緊張，奉命於十月二十三日飛晉，與晉綏當局商定抗禦日偽方略。十一月十四日，日偽犯我綏北之紅格爾圖，二十三日又犯我綏東之武川，均被我軍擊潰。我軍遂乘勝於二十四日收復百靈廟。二十七日我親赴綏遠前線視察，甫與前方將領商定綏東察北的作戰計畫，即奉委員長電召速回洛陽，面商要事。十二月二日始再飛赴太原，因飛機故障，改乘火車，於五日抵達潼關時，復奉委員長手諭，囑逕往西安。我於此時，已獲有張學良謀變情報，即於七日轉往西安，除報告委員長

經奉決定將收復商都肅清察北計畫，付之實施，以徹底粉碎日偽建立「大元帝國」的迷夢外，並進言張學良態度可慮事，當奉面諭即日準備赴德報聘萊希諾將軍之訪華，並商中德進一步之合作問題。我已預定於九日首途出國，因於前一日又獲悉張學良與楊虎城勾結共黨計畫，於九日晨趨赴臨潼委員長行轅告變，奉諭暫緩動身，仍留西安策劃我軍部署，想不到當日回西安後，即因重感冒病倒，逾日而「雙十二」事變即爆發矣。這一事變，固使當時綏東抗日計畫，成爲畫餅，而影響最大的，還在剿共方面。其時中央曾萬鐘、胡宗南等部及第九十七師軍於同心城及鹽池一帶，阻共軍於西北；四省剿共總部所屬各軍軍於陝北及沿河一帶，阻共軍於東北。假使此時張楊不變，以彼等所部就原駐防地，阻共軍南竄，則合圍之勢已成，聚殲之期不遠，謂歷年剿共未竟之業，可畢其功於此一役，未爲過之。惜乎張楊喪心病狂，竟於此千載一時之良機，製造此千古未有之奇變。遂使功敗垂成，浸假且進而造成蟻穴潰堤之鉅禍，可不痛哉！

第四章 全面戡亂

第一節 和談經過概略

因爲西安事變的發生，使剿共工作功敗垂成，已如上章所述。隨著事變的解決，在「共赴國難」美麗的宣示之下，我們剿辦了近十年的共產黨，竟又搖身一變而成了我們抗日的夥伴。從前的共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從前的共軍首領朱德和彭德懷，被任命爲該路軍的正副總指揮。

此一鉅大的轉變，自今日視之，覺得我們當日的行動，幾乎幾近兒戲，但在當時，卻是有所不得已的。客觀的形勢與局外的批評，都不允許我們不向「共赴國難」的路上走。而且國難嚴重至此，大家都有同感，就是共產黨也是人，何至全無人性，竟會借「共赴國難」之名，而來趁火打劫呢？古人說：「君子可欺以其方」，我們不必諱言，當時舉國上下，其實都是受了中共、俄共的欺騙而不自知的。

共產黨在抗戰陣營中的活動總目標，就是儘量擴大他們的武裝力量，以爲將來奪取政權的資本。他們的這種行徑，抗戰開始不久，我們即已認知，但是因爲大敵當前，不允許我們再鬧家務，我們惟有儘量容忍，以圖保持團結抗戰的形態，而免自亂陣營。

在八路軍初成立時，估計他們的武裝力量有兩萬五千人。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九月，共黨中央委員林祖涵向國民參政會中報告：「在七年多的戰爭過程中，共產黨的軍事力量，已在依正當的途徑發展，現在計有軍隊四十七萬五千人，相民兵二百二十萬人。」幾個月後，毛澤東在延安舉行的共產黨第七次大會上報告說：「當我準備這篇報告的時候，我們的正規軍已經擴充到九十一萬人，民團增加得超過二百二十萬人。」

在抗戰開始以前，共黨在陝甘邊區盤據過的地方，不過二十一、二個縣，共有人口不過一百幾十萬。但到抗戰進入第七年後，毛澤東曾報告說：「解放區現在已發展得北到內蒙古，南到海南島，包括有十九個省份，和九千五百五十萬人民。」他所說的十九個省份是：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陝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和福建。

共產黨在抗戰的招牌之下，壯大了，叛亂的資本一天比一天雄厚了。他們歷次的報告，就是他們不打自招的供狀。

共產黨擴展的地盤和武裝，強半是由吞噬我們敵後的軍政力量而來的，我們越退讓，他們就越進逼，我們越怕鬧笑話，他們就越肆無忌憚，當時管這種現象叫做「摩擦」，說得似乎輕鬆之至，其實所謂「摩擦」，就是遮掩共黨向政府叛變的遁詞。

自有所謂「摩擦」以來，留心國事的人，無不憂心忡忡，認爲外患並不難於消除，唯有共黨製造的內憂，恐終將成爲膏肓不治之疾。政府對於此種情勢，當然具有更深

切的瞭解，但始終都作弭患於無形的打算。始而採用「勸告」、「提示」等方式，繼而竟不惜分庭抗禮的和他們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談判。

國共之間的和平談判，從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即已開始，直到三十六年（一九四七）政府下令動員戡亂，在這中間的八年中，可以說始終就沒有放棄過。不過談判是時斷時續的，最後是毫無結果的，正與所有自由世界與共產政權各種談判的經過如出一轍。

國共和談的細節，累牘連篇也不易說清，這裡沒有這麼多的篇幅從事於此，而且也無此必要，以下我只想約略談一談和談的梗概。

幾年來和談的問題，歸納起來，不外：

一、共軍擴編問題

共產黨在抗戰的招牌之下，非法擴充軍隊，已如前述。對於這些軍隊，他們提出來的要求，就是變非法為合法。「共赴國難」之初，改編的第八路軍（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共轄三個師，兵額不過二萬人。以後又收編葉挺、項英的江南各地共軍，成立新編第四軍，共轄四個支隊，兵額約萬餘人，至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七月，十八集團軍已奉准改編為三個軍六個師，三個補充團，另再增兩個補充團。新四軍亦奉准改編為兩個師。

三十三年（一九四〇）五月共黨要求擴編其軍隊最少為十二個師。同年六月又要求擴編為十六個師。

三十三年十一月赫爾利大使由延安攜回毛澤東親筆簽字之草案，要求組織聯合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此聯合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應承認所有抗日軍隊。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開始的「重慶會談」，歷四十一日結束。關於軍隊問題，毛澤東同意縮編共軍為二十四個至二十個師。

三十四年十二月馬歇爾特使銜命來華，調處國共爭端，因而有三人小組之成立。三人小組簽訂了三個方案，一是頒布停戰命令，二是恢復交通，三是整編軍隊。在整編軍隊案中，國共軍的整編比例，是五比一，即如第一期整編全國軍隊為九十個師，共軍可保留十八個師，第二期整編全國軍隊為五十個師，共軍可保留十個師。不過這三個方案，共方根本沒有履行的誠意，他們自始至終就沒有停止過軍事行動，更談不到恢復交通。則在戰爭狀態之下，那裡還談得到整編軍隊。

二、軍隊駐地問題

第八路軍初成立時，指定其作戰地區為晉北，歸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節制指揮。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七月，指定冀察兩省及魯境黃河以北為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地區。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三月，共黨要求黃河以南共軍，俟戰後再開入指定地區。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月，共黨要求戰時就地抗戰，同年六月，共黨要求中央承認其華北、華中、華南根據地。

三十三年十一月，共黨要求組織聯合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軍隊應聽命於此聯合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言外之意，共軍行動不受現政府任何限制。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在「重慶會談」中，毛澤東同意將應整編的部隊移至隴海以北，及蘇北皖北集中。殆至三人小組成立，協議國軍與共軍的配置為：第一期，華北配置政府軍與共軍統編的四個集團軍之外，再駐三個政府軍。東北配置五個政府

軍，一個中共軍。華中配置一個中共軍，九個政府軍。第二期，華北配置中共軍七個師，政府軍十一個師。東北配置政府軍十四個師，中共軍一個師。華中配置政府軍十個師，中共軍二個師。當然這都是一紙空談。正當簽訂此項協議之同時，共方宣稱其在東北已有「民主聯軍」三十萬人，要求政府承認。

三、地方政府問題

二十九年七月，政府准許劃定陝甘寧邊區範圍（包括十八個縣）改稱為「陝北行政區」，暫隸行政院，但歸陝西省政府指揮。

三十二年三月，共黨要求陝北邊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區另行改組。這是讓政府承認他們陝北邊區以外所占據的地區。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六月，共黨要求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並承認其為抗戰所需要的各項措施。

三十三年十一月，共黨開始要求改組當時之國民政府為聯合國民政府。中央政府既可成為聯合的組織，則地方割據形勢，當然不會是不合法的了。

三十四年（一九四三）八月重慶會談，關於「解放區及地方政府問題」，往復商談，迄難解決。共方漫天要價，政府據理力爭，起初他們要五個省的主席，三個特別市的市長，和八個省的副主席，最後他們要求各「解放區」暫維現狀不變，留待憲法規定民選省級政府實施後，再行解決。

國共和談的問題，自不限於上述三種，但共黨爭持最力的，卻不出以上三個範圍。所謂軍隊擴編問題，質言之實即擴大叛亂資本問題；所謂軍隊駐地問題，實即擴大叛亂地區問題；所謂地方政府問題，實即擴大割據地盤問題。政府為了撐持「共赴國難」

的關係，也希望共黨萬一有恢復人性之一日，所以不借委曲姑息以求全，想從談判中解決問題。可是在幾年來的忍讓折衝之下，還是一切歸於白費。

原來共黨參加任何談判，都是遵循以下三個原則的：

一、不斷的增加要求，以後案變更前案。

二、只要求對方讓步，自己絕不讓步。

三、充分利用和談機會，充實準備，擴大宣傳。

總而言之，共黨政權是一個絕對的黷武主義的政權，他們的目的是在鞭笞六合宰制寰宇，在此一目的未能達成之前，任何行動都是爲了爭取戰爭的勝利。和談當然不能例外。談判的基礎應當是誠意，沒有誠意的談判，只能製造浪費，如何能獲得結果。而且即使獲得結果，不是也可以拿來撕毀的麼？

三人小組的協議案，共黨何嘗信守過其中的一字一句呢？

在三人小組成立幾天後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會員包括國民黨八人、共產黨七人、青年黨五人、民主同盟九人、社會賢達九人，是一次接受共黨要求召開的極爲重要的會議。會中通過五項協議，都是政府爲了和平，不惜忍讓一切所獲得的結果，無如共黨出爾反爾，對此五項協議，仍視同具文。

譬如會議中爭執最多的問題，是國民大會代表的產生問題，但最後終於達成協議，其略爲：

一、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

二、依選舉法規定之區域及職業代表一千二百名照舊。

三、臺灣、東北等新增各該區域及其職業代表共一百五十名。

四、新增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

但會後共黨一面擴大軍事叛亂，一面延不履行政協所作之協議。四月二十一日周恩來函政府代表張群、邵力子、張厲生三氏，同時中共代表團發表聲明，說明目前不能考慮參加國民政府人選及提交國民大會代表名單。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之協議，遂為共黨所破壞。政府至此仍以最大忍讓精神，宣布國民大會延期。七月三日，政府宣布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十一月八日，國民政府主席蔣公發表嚴正聲明，其略為：

一、為貫徹和平政策，已明令關內外國軍，除為防守現地所必需者外，停止其他軍事行動。

二、現國民大會依法選出之代表，均已如期報到，國民大會實不能再予延期。且召開國民大會為政府還政於民惟二口法步驟，亦不能再予稽延。因此政府已決定國民大會於十一月十二日如期開會。

三、政府保留中共及其他黨派在國民大會應出席代表之名額，仍望其隨時參加制憲。

共方對於此項聲明的反應，完全失去理性，除詆毀停戰是「繼續大打的作戰」外，公然要求「下令停開一黨包辦的所謂國大」。共黨如此為所欲為，否定他們自己參加的政協所作的協議，充分證明共黨反覆無常誅求無厭的特性。和這樣一個反覆無常誅求無厭的集團，談和平，談團結，談合作，如何能下枉費精神？

政府徇「第三方面」之請，國大於再度延期三天後，於十一月十五日正式開幕，周恩來於是月十九日飛返延安，和平談判由此中斷。但他們還在南京留下一個中共代表團聯絡處，以表示和談尚未完全絕望的姿態。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一月，馬歇爾特使奉召返國任國務卿。我政府不因調入之離去，而放棄恢復和談之努力。但因共方態度愈益蠻橫無理，無法進行。一月二十九日美方聲明退出軍事三人小組。時共黨利用京滬渝各地所留置之聯絡人員，陰謀策動對政府之各種不利事件，擾亂社會，破壞經濟，散布流言，政府不得已乃限令彼等於三月五日前一律撤退。至此和談希望乃不絕如縷。

是年五月二十日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在南京開幕。六月二日閉幕。會中通過了一項和平提案，列舉三點：

一、請政府再度申明，繼續貫徹「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方針；

二、請中共迅派代表來京，與政府雙方無條件恢復和談，本「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之原則，積極研討，迅速實行；

三、本次大會閉幕後，由本會主席團及駐會委員會，本此次大會決議之精神，於最短期間促成和平之實現。

這可以說是戡亂動員前夕最重要的一次和平呼籲了，不想過了兩天，共黨竟公然拒絕了此項提議，他們叛亂國家奪取政權的野心，已不復加以諱飾。政府的忍耐，亦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時期。這才在七月十八日公布「動員戡亂綱要」，下令總動員，以剿平共黨叛亂。

從立「共赴國難」以後的國共和談，前後歷時八、九年，到此才算告一段落。

共黨萬無與其他政黨和平相處之可能，我們從北伐時起，即已有極清楚的認識。和談之無益，不待動員戡亂之日而始知之。然而我們爲什麼不斷作此無益之事？根據我的分析，約有以下數因：

一、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是中國人固有的傳統精神。

二、以爲中共未始不可恢復人性。

三、在中共真面目全盤暴露之前，其偽裝欺騙技倆，極爲高明，國內外同情他們的人頗不爲少，政府不能不顧及輿情。

四、在抗戰期間同時剿共，兩面作戰事實上不可能。

五、勝利後國人望治情殷，和平爲舉國一致的呼聲，和談爲全世界民主國家一致的希望，甘爲戎首者，必爲國人所共棄。

六、勝利後，國家百孔千瘡，需要美國援助之處甚多，而當時美援政策，是建立在「不打內戰」的基礎上的，而以改組政府統一國家爲條件。美國的居間調處，我們事實上不能不予接受。但美國的此種條件，反爲中共所利用，以破壞國家之統一，及使政府改組成爲無望。因此美援政策，本爲促成中國之統一及政府之改組的，反而使中國統一及政府改組成爲不可能。

七、在抗戰結束時期，我們的部隊多在西南地區，由西南轉運至華北、東北，非有半年時間不可。故爲爭取半年之部署時間，和談對我亦並非無利。

總之，和談在政治軍事及其他各種關係上，是極爲錯綜複雜的一種行動，在理論上是應該的，但說大陸因和談而淪陷，亦不無其理由。不過根據我們痛苦的經驗，欲與中共和談來解決問題，終究是愚蠢的。

在馬歇爾特使調處和談期間，我因病在滬療養，初未參加，病稍愈後回京，曾經當過幾次政府代表，我當時覺得馬帥對於中共情形太隔閡，有讓美方瞭解一下中共實質的必要。光和馬歇爾本人談還不夠，同時也要和他助手談。後來在李惟果擔任翻譯之下，我和馬歇爾助手談了兩次，我首先說，我的話可能偏於主觀，但也未嘗不可供你們的參考。於是我將共產黨過去許多經過詳細的告訴他們，我第一次看到一個美國將領掉眼淚，他說這樣說來，和談是無望了。我說：「不然！中國人的道理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只要你們瞭解，這事還有可為。譬如作戰，先有了情報，瞭解敵情，才可以下決心，定計畫。」可惜我們這次談話，因為馬帥先入之見太深，也沒有發生多大作用。

後來馬帥準備回國，我去看他，有十幾位外國記者包圍我，其中有一位問：「你看這次馬帥是失敗還是成功？」我說：「成功！」他很驚奇的說：「大家都認為是失敗，你怎麼說是成功？」我說：「馬帥對中共今後可能多少有一點認識。」接著有人問我：「到底馬帥如何？」我說：「馬帥是個模範軍人，是個標準美國國民，是個忠實的基督教徒。」我不知馬帥以我為何如人。他在「離華聲明」的文告中，有「雙方之極端分子」之語，他是否把我列在「極端分子」之林，很難說。

第二節 綏靖時期

抗日戰爭的終止，就是共黨叛亂的開端，但在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七月十八日政府頒布「動員戡亂綱要」之前，政府對於共黨的叛亂，因受馬帥的牽制，只採取被動應戰的態度，以維持中美的友誼，所以我們管這一段時期，叫做綏靖時期。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日，共酋朱德以「總司令」名義，發布受降第一號命令，大意說：

一、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依據波茨坦宣言規定，令敵人部隊繳出全部武裝。

二、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令附近一切偽軍反正，解除武裝，聽候編遣。

三、各解放區所有抗日武裝部隊，如遇敵偽抗拒，即予以堅決消滅。

四、我軍對任何敵偽所占城鎮交通要道，都有全權派兵接受。

盟邦接受日本投降，約定在三十四年八月華盛頓時間十四日下午七時，即重慶十五日晨七時，同時公布。而共黨在八月十日即已迫不及待，要單獨接受投降。他們不但目無政府，而且也目無盟邦，其橫行無忌情態，可謂暴露無餘。接著在八月十一日，朱德仍以「總司令」名義，連續發布第二、三、四、五、六、七號命令，這幾號命令包括以下各要點：

一、令原東北軍呂正操所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原東北軍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原東北軍萬毅所部由山東、河北現地，向遼寧進發；現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之李運昌所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

二、令賀龍所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聶榮臻所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

三、為肅清同蒲路沿線、汾河流域及準備進入太原受降，令賀龍統一指揮山西解放軍。

四、為肅清中國境內交通要道之敵偽軍隊，並準備受降，令所有沿北寧路、平綏路、平漢路、同蒲路、滄石路、正太路、白晉路、道清路、津浦路、隴海路、粵漢路、

滬寧路、京蕪路、滬杭路、廣九路、潮汕路等鐵路線之解放區抗日軍隊，統應積極舉行進攻，迫敵偽無條件投降。

五、令華北對日作戰之朝鮮義勇隊司令歲人，副司令朴孩三、朴一禹，立即統率所部，隨同八路軍及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兵，消滅敵偽，以便達成解放朝鮮之任務。

六、令進入城鎮要塞之各部隊司令員負責實施十項軍事管制：(一)規定管制區域，指定警戒部隊，委任衛戍司令，實施軍事戒嚴；(二)略；(三)略；(四)控制一切軍事性質的機關、倉庫、工廠、學校、兵營及要塞；(五)控制一切輪船、火車、軍用汽車、水陸碼頭及郵政、電話、電報、無線電機關，實施嚴格軍事檢查；(六)控制一切軍用和商用的飛機場及其倉庫。（其餘從略）

以後還陸續發出給岡村寧次，及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爭取受降權的電報多通。其措詞之狂悖，態度之蠻橫，無所不用其極。回憶八年前共黨承認在政權統一軍權統一的條件之下「共赴國難」的時候，豈僅前卑後倨而已，簡直是「盜憎主人」了。

共黨這七道受降命令，無異就是他們蓄意推翻政府奪取政權的宣言，這不必等「明眼人」才看得出，任何人都不難一望而知。

自是以後，各地共黨即紛紛蠢動起來。大規模的叛亂，在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內，有八月至十月的上黨之戰，十月至十一月的漳河之戰，十月至十二月的包綏之戰，十一月間的北寧路臨錦之戰，十二月至翌年一月的熱遼邊區之戰，戰鬥均甚劇烈。上黨與漳河之戰，我軍均不利，其餘各戰役，我軍均稱得手，但未能捕捉敵軍主力而殲滅之，誠屬遺憾。然在魏德邁將軍協助之下，我軍得適時進駐京、滬、平、津等名城，並使有力部隊得在秦皇島登陸，進而收復臨錦，也尚屬不失機宜。

軍事三人小組隨著三十五年度以俱來，上半年共黨在關內的騷動，較爲緩和，但在俄軍掩護之下，全力爭奪東北，深植其軍政勢力於廣大的東北鄉間，成爲後來奪取大陸的堅強基礎。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五月，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成立國防部，六月一日我奉命出任第一任參謀總長。當此烽火瀰天之際，我因身體多病實在不敢當此重任，但軍人以服從爲天職，只得以慄慄危懼的心情，勉強應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八月二十九日，我復奉命兼任東北行轅主任，參謀總長的任務，事實上無法兼顧。計自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六月，至三十六年八月，我濫竽了一年零三個月的參謀總長，大陸雖不是在我任內淪陷的，但第一任參謀總長的謀劃不臧，未能樹立整軍建軍的基礎，總是咎無可辭的。現在想起來，猶覺深負統帥的知遇和國民的付託，而有無地自容之感。

我在參謀總長任內，致力最多的是建立各種制度，諸如人事制度、兵役制度、補給制度、訓練制度、預算財務制度等，都花過很大的氣力。再就是出發戰地撫循士卒，傳達統帥意旨，與各地區高級將領策劃剿共部署，也還收到一些激勵士氣的效果，一年間我曾到過的地區及時間如下：

第一次出發：

日期：三十五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

地點：鄭州、徐州、濟南、青島

第二次出發：

日期：三十五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日

地點：北平、瀋陽、歸綏、太原

第三次出發：

日期：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地點：蘇北

第四次出發：

日期：三十五年十月四日至七日

地點：北平

第五次出發：

日期：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至二十日

地點：張家口

第六次出發：

日期：三十六年一月十六日至二月十七日

地點：鄭州、徐州及魯南前線各地

第七次出發：

日期：三十六年三月三日至十七日

地點：徐州、濟南、青島

第八次出發：

日期：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十一日

地點：徐州及魯中前線各地

第九次出發：

日期：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

地點：徐州

這一年來我幾乎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各戰地往來奔走，對於全盤軍政軍令的策劃，顧慮難免疏失，自不待言。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二月十五日，方于役鄭徐道中，曾就戰地觀感所得，列舉亟應改進十事，報告統帥參考，茲記其要點如後：

一、從速調整戰鬥序列，並嚴格檢討部隊長人選。現任軍師長，多半皆屬資深，其平均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上，此現象與北伐初期適得其反。故昔日作戰勇猛犧牲之精神，不復再見於今日。年衰、泄沓、低能、企圖心不旺盛者，隨處皆可發現，馴至有貪污致富，畏死戀棧，常保其地位者。反之，共軍高級指揮官莫不年輕，能吃苦耐勞，活躍於第一線，此層似有重新檢討必要。

二、調整裝備。劃分輕裝備師，重裝備師。加強團以下火力，準備進入山地作戰。現有部隊，有美械國械之分，美械多戰防砲、火箭砲、火燄放射器及砲兵，今後因美援停止已不能維持。擬就國械區分輕裝師與重裝師，輕裝部隊著眼加強火力與機動，步兵團增編一重機槍連，輜重改用馱馬與人力，準備進入山地作戰。

三、選擢卓越之指揮官，固定配屬幕僚，以當方面之任。平日責令研究戰法敵情，及預想戰場形勢，兵要地理，按情況派任戰場指揮官，指揮作戰。戰況轉移，隨時歸併撤回，如此，既不因人廢事，亦不因事失人。

四、加強能作戰部隊，逐次整頓，不能作戰部隊，從速裁併。默察部隊實情，就中能作戰而戰力較強之部隊，不過十之二一，因之剿共軍事，不得不遲重進行。處此國力凋敝之今日，惟有在軍事預算限度內，區分輕重緩急，能作戰部隊，儘先充實，而更加強其戰力，其餘不能作戰部隊，先在使用上，研究配合使用方法，誘導其自強奮起，更視狀況，加以整頓編併。

五、分期調整部隊編制，將二四制逐漸改爲 三三制。二四制在中外學理上，早成過去。徵之對敵作戰，愈暴露此制之弱點。一個師部兩個旅部，各控制一個團，已去三團兵力，其在第一線部隊，僅有一個團擔任戰鬥矣。

六、變更青年師性質與任務，分置戰略要地，編訓戰略預備隊。目前作戰，已將所有兵力，使用於第一線。過去曾奉核定，以整一、九、四十九、六十七、八十三等師，十六、五十四、六等軍，爲戰略預備隊，控制整訓。今年此等部隊，皆已加入作戰。剿共軍事，似不能在早期內結束，戰略預備隊之控制，仍極重要。最好將現有之青年師，變更其性質與任務，改爲 戰略預備部隊，限期裝備，訓練完成。

七、正名定分，敵我分明。過去因和談之故，反而師出無名，馴王敵友不分，是非莫辨。處今日時局，惟有從正名始，使敵我陣容，旗幟鮮明，庶助我者興起，袒敵者遠颺，則大局之澄清可期。

八、闡明政府態度，對武裝叛亂土匪，必予撲滅。目前敵我情形，完全兩樣，共黨一切皆爲 求取軍事勝利，發動整個力量，黨政軍配合無間。反觀我方，則一切責難軍事。此種觀念，此種現象，亟應於此時闡明，而加以糾正。

九、糾正和談錯誤思想，以破心中之賊，而樹立全軍必勝信念。蓋兵事在作氣，有如戲球，當其盛時，千槌不破，一針之洩，即歸於幻滅。年來士氣低沉，和談實爲主因。

十、取締共黨在後方都市之活動。我後方都市，共黨公開或秘密機關，所在皆有，任其獨往獨來，偶加監視，亦不能阻止其活動。職意共黨在我後方都市活動，其有危害國家，破壞社會秩序有據者，應加以拘捕禁閉，不可顧此失彼，因小失大，以貽噬臍之悔。

以上就是我在綏靖時期重要建白之一，其實也都不過是技術上的淺見，談不到廟堂嘉謨。然而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國是紛如亂絲，以言「一言興邦」，談何容易！

從我九次外出視察的時間相地點，不難看出綏靖時期戰事的重心，是在津浦、隴海兩線的交叉地帶。津浦、隴海兩線是聯合海陸貫通中國南北東西的兩大動脈，這兩大動脈貫通無阻，其餘各處小有疾患，均不足以成大害。反是，這兩大動脈不能為我掌握，則敵人進退自如，可攻可守，即成為剿共軍事的致命傷。這一點敵人認識得很清楚，所以他們投入這一方面的兵力特別多，如晉冀魯豫野戰軍區的劉伯承所部十餘萬人，新四軍陳毅所部山東野戰軍區十餘萬人，華中軍區約二十萬人，合共不下五十餘萬人，約當全部共軍的一半以上（此就三十五年九、十月間形勢而言），共黨的企圖如何，實至明顯。我統帥部對於此種情勢，亦早瞭如指掌，故為爭取此一戰場的勝利，也是唯力是視的。

其次為北平、錦州、熱河三角地帶內之共黨，必須加以殲滅，以穩定華北東北之戰略基礎。如此對東北方面才能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又張家口戰略價值亦鉅，為切斷中俄共之連繫與補給，我亦有加以占領之必要。惟當時政府中有以為政府是全國人民的政府，不能過於有所偏重，津浦、隴海、平、錦、熱、察固然重要，其他各省又何嘗不重要。山東、蘇北的人民，不應使其陷入共黨的魔掌，其他各地區的人民，又安可聽任他們忍受共黨的蹂躪？因此中央不能把持重點主義，而陷於備多力分，這是剿共軍事失敗的一大關鍵。為此議最力的，就是當時的參謀次長劉為章（斐）。他的建議不但使軍事陷於被動，而且還造成中央與地方之離間作用。比起共軍「敵情

不明不打」、「實力不夠不打」、「地形不良不打」，有種種選擇的自由來，自不免相形見絀。打仗最基本的秘訣，就是「制人不制於人」，也就是今日所說的爭取主動。我們在主動方面不如敵人，所以在綏靖時期，各戰場上雖亦互有勝負，但在戡亂時期，終於一敗塗地。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五月，四平街、長春的收復，十月，張垣一的收復，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三月，延安的收復，都是綏靖時期重大的勝利，惟津浦、隴海兩路，始終未能打通，深入東北之部隊，後方完全失去憑藉，顯示我們綏靖時期的重要企圖，迄未實現。我幾次飛赴鄭徐，雖亦不無一時之功，但對於大局，究屬收效有限。

第三節 全面戡亂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七月，政府頒布「動員戡亂綱要」，對付共黨叛亂的軍事行動，遂由綏靖時期進入全面戡亂時期。

對於禍國殃民的共產黨，明張天討，這是一種名正言順的必要措施，凡有人心，無不表示擁護。不過共黨猖獗，有增無減，我們雖然舉起戡亂的大纛，但仍因備多力分的關係，很難以爭取主動。

是年八月杪，我奉命兼任東北行轅主任，對於全面戡亂軍事的策劃，自更無法顧及。不過參謀總長的名義，一直拖延到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五月，始得奉准辭卸。故戡亂軍事的失敗，以地位言，我所負的責任，實比任何人大。

戡亂時期的剿共軍事，以三十七年九月下旬濟南的失陷，作為一個轉捩點。在此以前，可以說勝敗之機，猶未大定，國軍努力的機會，還有爭取的可能。但在此以後，顯然已成江河日下之勢，狂瀾既倒，無可挽回矣。

津浦、隴海兩路的交叉地帶，是綏靖時期的主要戰場，前節已經言及，這一戰場包括山東全省、豫東、皖北及蘇北等地區。濟南為山東心臟，濟南一失，整個山東就全成了一塊死棋，而打通津浦，連貫南北，遂全然絕望。其在共軍方面，既已掌握了山東，自可抽調山東的共軍，轉移使用於其他戰場，於是無論東北、華北、華中，均將造成我軍之力日消、敵軍之力日長的趨勢。

本來在綏靖後期，剿共的形勢，大致是六個戰場互相對峙的，這六個戰場是：

一、東北戰場：包括東北各省及冀東、熱河。

二、華北戰場：包括晉、冀、察、綏各省。

三、中原戰場：包括蚌埠以西，潼關以東，黃河以南，長江以北之河南、安徽、湖北等省。

四、蘇魯戰場：包括徐州以北，滄縣、德州以東之山東全省。

五、陝甘寧戰場：包括陝西全省及甘、寧兩省邊區。

六、華東戰場：包括蚌埠、商邱以東，徐州以南，京滬以北地區。

以上六個戰場，兵對兵，將對將，雖然不像球賽那樣一個人看守一個人，但就大體來講，雙方互相控制，旗鼓相當，那一方也沒有顯著的壓倒優勢。所不同者，共軍較為機動，避實擊虛，容易撿一些小便宜而已。可是濟南易手以後，情形就不同了。共軍抽出山東的兵力，加在什麼地方，就造成什麼地方顯著的優勢，「一人難敵四手」，道理本甚淺明，敵人的優勢，當然就是我們的劣勢了。

剛好在濟南易手之前一個多月，我政府頒布了一項「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元券，收兌法幣及金銀外幣。起初情形尚好，但沒有多久，首先便在上海發生了

搶購潮，隨即蔓延各地。人民搶購，商賈避賣，社會秩序，亂成一片。最慘的是奉行政府命令的安善良民，將辛辛苦苦積存下來的金銀外幣，依法兌出，不旋踵卻變成赤手空拳的難民，這件事影響士氣人心太大了。大家都對政府失掉了信心，政府的施政，恰與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在這種情形之下，戡亂軍事，如何還能夠看好？

濟南又適於此時易手，軍事崩潰之局，遂更無可挽救。

果然，共軍於奄有山東之後，即以全力奪取東北，十一月二日，瀋陽棄守，東北戰場結束。十一月九日，徐蚌會戰開始，雙方使用兵力，合計不下百萬，這是戡亂軍事中最大的一次決戰。戰事歷時兩月，我軍敗績，華東戰場結束。東北共軍於東北戰場結束後，擁入華北，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十五日陷天津，是月底在局部和平名義之下，進入北平，華北戰場除太原孤島外，亦已結束。

徐蚌會戰將近尾聲之際，如大家協力同心，退保江南，雖一時不足以云恢復，但畫江爲守，如東晉、南宋故事，也不見得全無可能。然後整軍經武，勵精圖治，俟敵之隙，徐圖進取，則句踐可以復國，少康可以中興，成敗興衰豈有一成不變之理？不料當時賢俊，不此之圖，竟又倡導起和平來。與共產黨談和平，除投降外，是不會有結果的。這種經驗，政府中人，應有同感。共黨在羽翼未豐之前，尚以和談爲發展實力奪取政權的手段，則在彼大獲全勝之後，反要他們和我們和平相處，豈非不可思議之事？

政府中人首先向總統呼籲和平的，是當時擔任華中剿匪總司令的白健生（崇禧），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二月二十四日他打給總統的電報說：

民心代表軍心，民氣猶如士氣，默察近日民心離散，士氣消沈，遂使軍事失利，主力兵團，損失殆盡，倘無喘息整補之機，整個國軍雖不辭任何犧牲，亦無救於各個之崩潰。不僅中國版圖變色，我五千年之文化歷史，將從此斬斷。言念及此，憂心如

焚。職辱承知遇，垂念餘年，當茲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猶豫之時。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盡，對鈞座爲不忠，對民族爲不孝，故敢不避斧鉞，披肝瀝膽，上瀆鈞聽，並貢芻蕘：(一)先將真正謀和誠意，轉知美國，請美國出而調處，或徵得美國同意，約同蘇聯，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恢復和平談判；(三)雙方軍隊應在原地停止軍事行動，聽候和平談判解決。以上所陳乃多數忠貞而有遠見者之共同意見，不敢壅於上聞，伏乞鑒核察納，亥敬。

十二月三十日又上總統一電：

當今局勢，戰既不易，和亦困難，以言繼續戰爭，則戰力懸殊，外援不繼；以言和平，則敵焰方張，不易接受。觀其近日廣播：宣布戰爭罪犯，可以判斷其乘我士氣不振，繼續用兵，使我京滬平津失陷，革命武力消滅，以遂赤化整個中國之野心。顧念時機迫促，懇請乘早英斷。職意將謀和誠意迅告友邦，公布國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眾擁護和平，對方如果同意，藉此可開和平之機。如其黷武窮兵，殘民以逞，則國人不直所爲，友邦亦難扶助，所以怒我而弱寇也。總之我方無論和戰，必須迅速決定，整個團結，方有生機，萬不可被敵分化，以蹈各個擊破之慘境。職因病不能赴京面報，謹再電呈，伏乞睿察。亥全。

在一週之內，連電主和。當時華中剿總所屬，尚有九個軍，這是不可忽視的。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二日總統因以電復之云：

亥敬、亥全兩電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諒荷閱及，披肝瀝膽而出，自問耿耿此心，可質天日。今吾兄既已傾吐精誠，重啟和平之門，假令共黨確能翻然悔悟，保全國家之命脈，顧念生民之塗炭，對當前國走，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決，則中正決無他求，即個人之進退出處，均一唯全國人民與全體袍澤之公意是從。唯言和之難，卓見已詳，如何乃可化除共黨赤禍全國之野心，以達成保國保民之和；如何乃可防止共黨翻雲覆

雨之陰謀，以免戰禍再起之害，想兄熟慮深籌，必已有所策劃。甚冀惠示其詳，俾資借鏡，令大計雖已昭明，而前途演變，尚極微妙。吾兄所謂整個團結，方有生機，萬不可被敵分化，以蹈各個擊破之慘境之言，實獲我心。尤望兄力循此旨，激勉華中軍民，持以寧靜，藉期齊一步驟，鞏固基礎，然後可戰可和，乃可運用自如，而不為其匪所算則幸矣。

在白健生（崇禧）通電主和的同時，野心家們製造流言：「蔣總統不下野不能進行和議，抑且不能獲得美援」，於是於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總統乃宣告引退，並依照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由李副總統宗仁代行總統職權。李代總統接事後，和談之門大開，這才知道共產黨可以接受的和談，實在只是投降的別名。共黨於提出「五點和談基礎」、「八項和談條款」之後，又加上「二十四項補充要求」，四月十五日並以最後通牒致政府和談代表，限於四月二十日以前，全部接受。並聲明不論戰爭或和平，共軍均須渡江。李宗仁等於備受共黨揶揄玩弄之餘，才對和平斷了念，而殘破的江山和部隊，再也抵抗不住共黨的衝擊了。

蔣總統的引退，頓使軍事政治各方面失去了領導的重心，這是不消說的。和談既已無望，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計，大家應重新接受總統的領導，猶不失為亡羊補牢之計，萬想不到播遷後的政府，內爭依然很劇烈。大概是在四五月之交的時候，李代總統還有逼迫總統出國的行動。他有一封信給總統，提出六項條件：(一)憲法所賦予代總統之責權，須實施無阻，尤其關於軍政的人事權；(二)存臺金銀運回；(三)存臺美援運回；(四)取消以黨統政；(五)取消非常委員會；(六)總裁出國謀國際援助。這樣他才可以擔任代總統，否則仍請總裁出山，他出國謀國際援助。信中還提到和談失敗，是我方誠意不夠的結果。這封原信，我沒有看見過，連總統的覆信，都是得自朋友的轉告。總統的覆信，大意首述政治領導者，應有忍耐心，不可處處諉過於人。共黨是不肯妥協的，和之不成，竟自認我無誠意，何待敵人卻如此寬恕？關於六項條件，總統認為(一)至(五)

項是李的責權，金銀歸中央銀行，美援歸國防部主管，均有冊籍可查，李應自行行使其職權。至第(六)項，如果中國有一片乾淨土，即仍在國內盡我國民責任。假使我到國外而援助無望，仍可說我在國外牽制，我又是罪人了。關於要我出山問題，你們當時曾說，我如下臺，則美援可來，和亦可成。我認爲 情形要比現在更壞，你們不信。但我今既下臺，則亦不能再上臺了，此非你我私事可私相授受的。我即離開上海，遁跡山林，不問國事矣。李這時正在桂林，接信後即到廣州任事，其結果還是一籌莫展。

中國的政局，在搞派系的人們看來，總覺得你們搞不好，非我們來不可，因而互相傾軋，直至國破家亡而不悟，事之痛心，寧有過於此者！

政府於四月二十五日，南遷廣州，十月十三日，廣州撤守，又西遷重慶，李代總統於十一月三日離渝飛往昆明，中樞無主，蔣總統既已引退，乃以國民黨總裁身分於十四日飛抵重慶，即電邀李代總統返渝共商一切。李不但不返，且自昆明飛往南寧，旋再轉飛香港，託言就醫，蔣總裁與當時行政院長閻伯川（錫山）先生歷經派員飛港敦請返渝，均不聽。時共軍已進逼重慶，政府再西遷成都。十一月三十日重慶失陷。十二月七日政府遷臺辦公，延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成都亦告不守。西北各省於政府播遷聲中，相繼淪陷，大陸遂爲共黨所奄有。當政府遷臺之日，李代總統更由港飛抵紐約。幸蔣總裁始終在川，從旁策劃，政府始得倉卒撤出，否則當更不堪設想矣。

先是政府西遷之始，對於軍事部署，決定以雅安爲後方，時國軍主力爲胡宗南部。宗南來臺，曾與我談及此事，我當即表示：這樣部署不妥。就當時戰局看，拿雅安作前線，猶恐爲時已晚，貴陽一失，雅安即成三面受敵之地。雅安只合作收容第一線，後方應設在西昌。西昌有糧，且有通雲南之路，爲當年遠征軍所修築者。西昌所缺者爲 彈藥棉布，軍中他物可棄，此二物不可棄。宗南聽到我的話，很高興，準備到川後，即照此部署。不想後來他的第一軍奉調赴渝解圍，致爲共軍各個擊破，真是不幸。

不過要不是第一軍開渝，政府也可能撤不出來。總之，宗南是無罪的，後來卻竟因此受到彈劾，可謂不白之冤。

第四節 東北與我

日本侵華，是由東北開始的。起初日人的希望，以能奪取東北為己足。假使當時我們認為東北可以不要，則八年抗戰也許不致發生。那麼反過來說，八年抗戰之所以發生，也就是因為我們不甘心放棄東北。

但經過八年浴血抗戰之後，如果勝利的果實，不包括光復東北在內，則千百萬軍民的死傷，難以數計的財產損失，都將成為無謂的犧牲，而所謂神聖的抗戰，也不過只是一場悲劇的演出罷了。

然而在抗戰勝利的前夕，我們東北的主權，竟遭受到盟國無理的出賣，這真是夢想不到的事。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二月四日至十日，美總統羅斯福、英首相邱吉爾，與蘇俄總理史達林會議於克里米半島之雅爾達。會中除討論聯合國及德國失敗後歐洲土地劃分事宜外，以要求蘇俄對日作戰為主題，而簽訂了一項出賣中國東北的協定，其文為：

三大國領袖同意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事結束後兩月或三月內，蘇俄應加入同盟國方面對日作戰，其條件如下：

一、外蒙古現狀（蒙古人民共和國）應予保持。

二、俄國前於一九〇四年被日本偷襲侵害之權利應予恢復。即：

(一)庫頁島南部及其附屬各島應歸還蘇俄。

(二)大連商港應予國際化，蘇俄在該港之優越利益應予妥保，並恢復旅順租予蘇俄為海軍根據地。

(三)通達大連之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應由中蘇合設之公司共同管理。並經諒解，蘇俄之優越權利應予保障，中國保留在東北主權之完整。

三、千島群島應割於蘇俄。

協定中關於外蒙古及上述之港口及鐵路，應得蔣介石委員長之同意，依據史達林元帥之建議，美總統將採取步驟以獲得此項同意。

美總統所採取的步驟，就是壓迫中國與蘇俄簽訂了一項「中蘇友好條約」。這項條約於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二十五日經兩國政府批准公布。條約內容大致就是雅爾達協定的合法化。條約中保證俄軍於對日作戰勝利後三星期開始撤退，其最後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六日，美國第一枚原子彈投落廣島，八月八日俄國宣布對日作戰，隨即派遣軍隊長驅直入我國東北及熱察兩省，不及一週，日本天皇已頒布無條件投降之敕令。俄軍此時才進入中國幾天，兵不血刃，就成了中國東北廣大地區的勝利者，接受日本的投降，並掠奪東北價值鉅億的工業設備和物資。這且不言，最使中國蒙受無可忍受的損失，就是在俄軍卵翼之下，使共產黨在東北深植下強大的武裝力量，造成後來政府接收的困難，而戡亂戰事終至遭受挫敗，亦即造因於此。

依照「中蘇友好條約」之規定，俄軍至遲應於三十四年十二月三日，全部撤出我國國境，可是他們百般刁難，不肯依限撤出。同時阻撓我政府軍隊進駐東北。直到共軍大量侵入東北，並獲得俄軍繳收日軍裝備後，俄軍不待我軍接防，遽於三十五年（一

九四六）五月三日全部退入蘇境。因之整個東北除瀋陽、錦州少數孤立據點外，都成了共黨盤據的巢穴。

所以抗戰勝利，我政府所接收的東北，除去幾個孤立據點以外，別無他物。真正攫得東北廣土眾民的，是共黨。而真正獲得鉅量工業設備和物資的，是俄帝。為不甘東北淪陷而苦戰八年的中國，到頭來卻一無所得。這種勝利的苦果，是怎樣產生的？追本溯源，不能不說是雅爾達協定之所賜。

我政府起初派熊式輝為東北行營（三十五年九月改為行轅）主任，負責辦理接收事宜。而以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主持軍事。原望軍政分治，協調合作，以期有所建樹，不料合作不成，反而互相牽制起來，以致軍事力量與行政效率，都相對的為之削弱。再則軍政雙方，都缺乏通盤籌劃的計畫，而一般不肖人員以劫搜為接收，較之關內其他各地，殆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士氣人心，均發生嚴重的惡劣影響。東北大局，既如上述那樣的險惡，再加上我們軍政方面的不爭氣，遂愈益不可為。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七月，美總統特使魏德邁將軍蒞華，曾赴東北訪問，認為東北現狀，與人謀不臧有開，於是我政府乃有調整東北人事之考慮。八月十二日，我以參謀總長身分，奉派飛瀋視察。除訪問東北元老，代表主席致慰外，即約集東北軍政黨團首長，檢討有關東北各項問題。十五日飛四平慰問軍民，時當我軍大勝之後，發現有不肖軍人乘機掠奪民間財務情事，當予議處，然對於軍紀敗壞，深覺痛心。十六日再飛長春、吉林、小豐滿等地視察，原擬再多留幾日，藉圖充份瞭解東北實況，惟因主席電催返京，只得於二十一日結束了這一次東北之行。

返京後，即奉主席召見，於報告東北情形後，對於調整東北人事，先擬請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兼任，李不願，乃定由國防部長白健生（崇禧）兼，白亦不肯接受，卻竭力主張要我去。我想國步艱難至此，倘能為主席稍分一點憂勞，自是義不容辭的，

不過參謀總長職務則必須准我擺脫。主席考量之後，卻只准我兼，不准我辭，在我兼任東北行轅主任時期，參謀總長職務交由參謀次長林蔚代行。議既定，我只好遵命而行。

兼任東北行轅主任的命令，是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發表的，稍事摒擋，即於九月一日飛抵瀋陽。

當時東北情形，雖然剛在四平街打了一個勝仗，但就整個大局來講，絕對無法挽救，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東北耆宿張作相、王樹翰、馮庸、高惜冰等十一人，知道我將要來東北，曾就東北黨政軍各方面的情形，寫給我一封信，對於當地現狀，頗有一些簡單扼要的描繪。如說：

軍事方面：「今者大敵必須國軍，小敵亦必須國軍，奸匪竄擾無已，國軍疲憊不堪。」「奸匪之在東北，擁有強大背景，據有優厚資源。」

政治方面：「東北情況雖屬特殊，而機構制度實多與實際需要未能切相配合。尤以機構之繁多，編制之龐大，事權分割，效力低劣，為目前之大病。」「各省負責人選，應付非常，動關成敗，必須慎重簡拔，不可稍存姑息。」

軍精民食方面：「東北目前收復地區，不過二十餘縣。本年遼北戰事春耕十廢其九。奸匪所至，存糧劫掠一空。因之產糧區域，已發生嚴重之民食問題。迨至青黃不接之時，其危機之嚴重，益將不敢設想。因之軍糧若在東北採購，就令徹底禁止人民貪米，亦將搜羅無方。」

黨團方面：「東北在光復後主持黨務者，聞有出賣黨證志在斂財者。種種劣跡，馴至地方公正人士，胥與絕緣。」「剿匪若不能對政治黨務下有整頓決心，則軍事縱有十分把握，而此等惡劣分子為淵馭魚，恐黨國之患，不在外而將在內。」

東北與熱河唇齒相依，我到東北不久，接到過熱河省參議員關鐵錚的一封信，從這封信裡，又可以讓我們瞭解一下熱河：「熱河當前勢態，全省二十縣，現在政令所及僅有七縣。而七縣所屬多者七、八鄉，少者三、五鄉，其環繞縣城為匪所據者，近只一、二十里，遠亦不過三、五十里。即以首縣承德而論，省政中心，重兵駐在，而亦市內四鎮金甌無缺，此外二十鄉，吾之所有亦不過殘破不整之七、八鄉耳。所謂我占點線，人有面積，人據生產之區，我守消費之地，現在秋成伊爾，我將一無所獲。」

這樣的東北相和熱河，我來了，又有什麼用？可是你也不來，我也不來，要主席自己來嗎？所以我之此來，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種行動。俗語說：「死馬當活馬醫」，就是我此來的工作方針。

我到東北後的作法，概括起來說，只有十二個字，即：整飭內部、安裕民生、培養戰力是也。

至於怎樣「整飭」？怎樣「安裕」？怎樣「培養」？「卑之無甚高論」，我只提出一個「正常化」的口號，以為一切設施的準則。所謂「正常化」，就是因為當時目所見的耳所聽的都太不正常，不能不加以糾正罷了。

譬如當軍官的職責是練兵是打仗，軍官都能盡其職責，而不分心外務，這就叫做正常。反是，他們放著應盡的職責不管，卻忙於開報館、辦學校、干涉地方行政，甚至開舞廳、辦工廠、走私、做生意，這當然就不能說是正常了。再如地方官吏的職責，是組織民眾、安輯地方、充裕財源、推行建教，這就叫做正常。如不此之圖，卻一味的要練兵，要擴張地方武力，便不能叫做正常了。

東北光復後，機關林立，冗員充斥，許多人都遊手好閒，無事可做。以致是非、功過、勞逸，均無所稽考，影響政治風氣及行政效率者，至為深鉅。最可怕者，就是共諜，最容易在這種夾縫中潛伏，擾亂我們的內部，暴露我們的機密，使我們完全陷

於「可勝」的劣境，而難以自拔。說起潛伏共諜的案子，真使人不寒而慄。舉其大者，如前保安長官公署的作戰課長、行營無線電臺總臺長、南車站總站長，居然都是共諜。尤可異者，瀋陽防衛司令部之政治部主任，與中央派來東北主持調查工作之首長，即為共黨在瀋陽情報工作之最高主持者。此外機關學校以及新聞通訊單位，被共諜滲入者，其數更無法計矣。這現象太不正常了。所以我們才決定裁併龐雜機構。先把行轅本身政治、經濟兩委員會，合併而為政務委員會，以資倡率。尚未接收的六省兩市，亦均分別設有龐大的省市府於瀋陽，實在太不成話。均著先行縮編，並令進駐於各該省市接近地區，以便隨時前進。又管理敵偽財產的機關，原有三個之多，實無必要，也決定合併成一個。所有裁併機構的編餘人員，一律編為政治大隊，加以甄別訓練後，再派赴各地工作。此亦化無用為有用之一道也。

裁併機構的最大收穫，就是內部較為整飭。因為內部整飭，良莠混雜為不可能，共諜滲透的危險，也就相對的大為減少。

東北接收後，奢靡浪費現象，隨處可見。魏德邁將軍來東北時，對於當時官員之紙醉金迷生活，亦大感驚詫。我來了以後，覺得當此萬方多難之時，哀鴻遍野之地，而國家官吏醉生夢死如此，實屬匪夷所思。有心大力整頓，又恐投鼠忌器。乃決定以身作則，力行節儉。並提倡不盛宴賓客，不作餽贈，不准公務人員參加賭博等不正當娛樂，風氣稍稍改觀。

東北廠礦機器，多為俄人劫掠而去。小豐滿電廠原有六部巨型發電機，俄人掠去其四；鞍山鐵廠原有鍊鋼爐九個，俄人掠去其六，為共黨破壞二個，僅餘其一可供使用。撫順煤廠亦因設備缺欠，產量銳減。故東北需要機器至為迫切。為增加生產計，乃以東北多餘之煤及大豆，換購境外之機器，旁及米麵棉花紗布等物，以補境內生產之不足。

又爲調節及充裕物資起見，規定輸出物資，只許換取外匯或與其他各地交換貨物。商人匯款出境，必須保證購人民生日用必需品，但絕對禁止官僚資本混入投機。

以上防止浪費，增加生產，爭取境外物資等項措施，都是爲了安裕民生而發，自不待言。

關於充實戰力方面，我們作了以下幾件事：

一、軍人不務正業，如上文所說開舞廳、走私、作生意等等，如一律放任不管，則久而久之，誰還肯練兵打仗，出生入死？故均嚴格加以取締。軍人如都能恢復正常軍人生活，自可收充實戰力之效。

二、瀋陽大街小巷到處都可看到游雜部隊之番號，其他各地亦大同小異。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前後的廣州，有官多於兵，兵多於槍的怪事，東北當日情形，亦正可與之媲美。這般人騷擾百姓則有餘，以言剿共戡亂，實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因規定凡未奉政府核准之任何名義之游雜部隊番號，均須一律取消。其中如有素質較好之官兵，另派國軍中予以適當安插，餘則交由地方政府使設法從事生產工作。

三、東北地方原有十三個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屬部隊，另外尚有十二個步兵支隊，及騎兵部隊大小單位甚多，大都空虛紊亂，不堪作戰。爲充實戰力，乃加以整編。將步兵分別整編爲三個軍，將騎兵改編爲騎兵司令部，轄三個旅及兩個獨立團，其餘編爲三個團。所有整編部隊其待遇與裝備均與國軍同。

又爲便於指揮作戰，復將原有及新編之十一個軍及其配屬部隊，編爲四個兵團司令部，分別統率。如此單位略爲簡化，層次比較分明，指揮較有系統，軍紀亦稍見嚴肅。

四、東北各省尚各擁有保安團隊，大多只存番號，無實力之可言。但經費均照編制開支，虛糜國帑，莫此為甚。因亦一律加以編併。除遼寧、遼北、吉林三省保安司令部原有二個保安團各編併為一個團，安東、松江、嫩江三省保安司令部各改為民政廳保安科，原有一個保安團保留一個保安隊作為省府守衛之用外，其他各省保安司令部及保安團，一律取消。剩餘兵員以之充實保留之保安團。編餘幹部即集中訓練，以之從事共區內之地下工作。

以上關於整飭內部，安裕民生，充實戰力，我們所做的事，絕無好高騖遠之處。總面言之，還是前邊說的那句話，我們只是糾正一些太不正常的現象，使之歸於正常而已。

此外應當說一說的，是我到東北後指揮作戰的經過。

我到東北之前，敵人已經發動過五次攻勢，我於九月一日到東北，九月六日，敵人就發動了第六次攻勢。

東北敵我兵力，在前五次攻勢中，大致不相上下，不過共軍補充得快，戰鬥的傷亡，隨時可以補充起來。而且被裹脅的新生力量，有如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到他們發動第六次攻勢時，敵我兵力已眾寡懸殊，幾成二與一之比。我當參謀總長，這情形是清楚的。所以在未離京之先，已有請派兩個軍加強兵力計畫，但當時有人以東北冬令無法作戰為理由，阻撓增兵計畫之實現。殊不知東北春末解凍後，雨季水汛，繼之以青紗帳起，才真正無法用兵也。

共軍第六次攻勢，由九月六日開始，直到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一月八日，暫時算是告一階段。在這次攻勢中，共軍使用兵力，計由林彪指揮的第一、二、三、四、六、七、八、十、十一等九個縱隊，又熱河兵團所屬第八、九兩個縱隊，合為十一個縱隊，所轄三十四個師、八個旅，總兵力約達四十萬人。其他公安及軍區部隊兵力，

亦在十萬人以上。國軍的兵力有正規師二十六個師，暫編師十一個師，可參戰人數約在二十萬左右，尚不及共軍的半數。

就當時敵我態勢來講，共軍據有廣大地區，容許其機動集中。我則侷促於都市的點線防守，雖在運用上能分區力求集中，而在主動上已經失卻機先。

我軍作戰指導，以培養戰力為前提，以確保戰略要地，再謀待機打擊共軍主力為方針。故使用必要兵力守備水吉、長春、四平、瀋陽、錦州、葫蘆島等地區，而以有力部隊機動控置於鐵嶺、錦州，先排除北寧路障礙，再圖打通瀋長路交通，並待機依城野戰，集中優勢兵力，為各個擊破共軍之計。

這一歷時四個月之久的作戰，經過重大的戰役，是以下四個：

一、包圍瀋陽戰役：共軍以熱河兵團八、九兩縱隊對北寧路錦州相錦西，林彪之七縱隊對新民、八縱隊對營口，自九月六日至十月十日，先後發動攻擊，企圖大規模迂迴包圍瀋陽，均為我軍所擊敗，戰局得暫趨穩定。

二、再犯瀋陽戰役：自十月七日至二十三日，共軍以第一縱隊趨鐵嶺東南，以第四、十一兩縱隊趨撫順營盤，展開戰鬥，企圖破壞北寧路竄擾瀋陽，被我軍分別擊潰，戰局曾一度開朗。

三：永吉、北寧路戰役：共軍以二、六、十等三個縱隊大舉圍攻永吉，再以七縱隊破壞北寧路新民打虎山段，意在南北進犯，使我顧此失彼。戰鬥自十月十六日起至十一月十八日止，纏鬥月餘。我軍先解永吉之圍，另以一部擊破共軍之第七縱隊，共軍無所獲。

四、公主屯戰役：此次戰役始於十二月中旬，終於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一月上旬，共軍以第八縱隊竄白旗堡繞陽河，以第九縱隊竄打虎山，以第四縱隊竄海城、遼

陽，同時以第一、二、三、七，四個縱隊猛犯公主屯。敵情判明後，我認爲 共軍以四個縱隊犯我一點，正予以我殲敵之良機，乃令新五軍陳林達部堅守公主屯，盡力拘束共軍。另令第九兵團司令廖耀湘指揮最精銳之新三軍、新六軍爲 打擊部隊，並以七十一及四十九兩軍協同攻擊，分途急進。以當時情況言，我已穩操必勝之券。不意廖兵團未能遵命行動，前進遲緩，僅距公主屯十公里之差，致使新五軍於苦戰五晝夜後，爲共軍所擊破。共軍亦隨即他竄，使我功敗垂成。

公主屯戰役之後不久，我因胃疾如劇，也就奉命離開了東北。我本想與東北共存亡的，但亦無補於大局，林蔚文（林蔚）兄曾有信勸我休養說：「國家乃國人主共有，而郅治非歲月之可期。」又云：「國政不怕無人來治，而有病之身縱欲盡力亦無從爲力。」可謂至理明言。

我本有胃病宿疾，但不甚措意。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任遠征軍司令長官時，因感責任艱鉅，而處境甚爲 惡劣，時作劇飲，以資破悶，致釀成胃出血之症。當時雖經治癒，但三十四、五年（一九四五、六）均曾復發。此次北來，到瀋未久，病即發作，以當前局勢嚴重，隱忍不言，唯有盡力苦撐而已。其後病勢日重，仍依病榻約見軍政要員，指授方略，並日夜以電話指揮軍事。一位美國朋友來看我，認爲 以重病之人，負此重責，非但公私有害，且爲 極殘忍之事。主席對我更爲 關懷，曾派飛機送名醫戚壽南到瀋診治，認爲 非有較長時間休息不可，主席復親臨瀋陽，見我力疾苦撐，恐於公於私均有不利。回京後，即電召我回京療養，並派衛立煌爲 東北行轅副主任兼東北剿匪總司令，專負軍事責任。衛到任後，東北付託有人，我乃於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二月五日離瀋飛京，旋即轉滬就醫。

衛在東北，前半年尚勉可維持，到了十月上旬，共軍猛犯錦州，採用了所謂「三合一」戰法，即錦州一破，瀋陽、長春均可不攻而下，即可席捲東北。十月十五日錦州不守，二十三日長春陷落，共軍以鉗形攻勢合圍瀋陽。我方以廖耀湘所部十餘萬人，

從新民分向新立屯、黑山攻擊，企圖收復錦州。廖所部皆國軍之精銳，但仍遲還不進，一如前此赴援公主屯時行動，遂被共軍擊潰於遼河西岸，全軍盡覆。共軍乘勢合圍瀋陽，瀋陽守軍不戰自亂，至十一月二日，遂為共軍所陷。東北亡。

雅爾達協定，是使東北陷入敵手的遠因，鐵案如山，殆屬無可否認。不過雅爾達協定，並沒有出賣華北、華中和華南的協議，如說東北為華北的屏藩，東北不守，始造成華北以至整個大陸的不守，雖亦可言之成理，但這不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的道理，我不想這樣說。我覺得我們應當反躬自省。

至少東北之亡，我是不能辭其責的。無論站在參謀總長的立場，或是行轅主任的立場，我都要負一大部分東北淪陷的責任。所可問心無愧者，就是我已盡心竭力而為之，未敢絲毫怠忽職守，當胃出血病況嚴重之際，至不惜繼之以死，如是而已！

第五節 國民大會對我的譴責

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二月五日，我由瀋陽飛返南京，除晉謁主席及作必要的公務洽商外，即專一於求治胃疾。據美軍醫院的檢查結果說，非先經較長時間的休養，俟體力恢復後，無法進行根本的治療。當然南京不是合宜於養病之所，因於二月底移居上海。上海較適於避囂，且為國防醫學院之所在地，便於就近診治。

三月一日呈辭本兼各職，未能邀准。

這時中外友好，多有勸我到美國就醫的。三月十七日主席也同意我到美國去。帶職出國養病，未免太不成話了，因於是月三十日，再度呈請辭職。但仍未能邀准。

三月二十九日，第一屆國民大會揭幕於南京，這次大會的主要任務，是選舉總統、副總統。但共黨及政治野心家卻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製造政潮。分析政潮，不外

「黨同」與「伐異」兩大門類，在近三千名代表的國民大會中發動政潮，自然波瀾壯闊，轟動中外，可想而知。

我也是國大代表之一，因為在滬養病，未能出席。想不到政潮中「伐異」的主要對象，就是我。

攻伐我的最大口實，是作戰失利，其次是整軍、收編偽軍等問題。有幾位代表說得順了口，索興揚言：非斬陳某之頭，不足以謝天下。還有主張把我扣起來，免使逍遙海外的。假定政府當真就依此定了讖，因而挽救了危局，我是很願意領受的。

不過攻伐我的代表，究竟是少數而又少數。他們本來提出一個第九十八號議案，要我負戡亂失利的責任。不想過了幾天，原提案人中有十幾位，竟又自動提出原案保留的意見，這意見是：

對於第九十八號原提案人之意見。原提案對於共匪叛國，國軍失利，應由參謀總長陳誠負責一節，以在提案之前，尚未聽取政府軍事報告，故對軍事之失利，不能不由參謀總長負責。茲聽列政府報告，一切軍事措施，係經最高軍事會議決定，交由參謀總長執行。是此項責任，自不能完全由參謀總長負責。原提案辦法第一項，擬予保留。

這項意見交由審查委員會審查，聽說東北代表鄒作華、霍天一，山西代表梁敦厚等多人，堅決主張保留，審查會遂決定保留。翌日提出大會討論，亦一致通過。這一政潮的高潮，遂歸於平息。攻伐我的代表，前一日箭拔弩張的情形，至此亦全然消滅。

國大代表要殺我的頭以後不久，有人捏造「國民革命軍人同志會」的名義，散布一種傳單，罵我為「陳奸」，宣布我有十九可殺的罪狀。今日看來，雖是一種笑料，

但可反映當時在戡亂陣營中，共諜滲透造成黨同伐異的情形，是何等的可怕，即此一端，已足可使戡亂失敗而有餘矣。我的十九大罪狀，文長不及備載，僅錄其眉目如后：

一、殺貪污成性的陳奸誠。

二、殺庸愚無能的陳奸誠。

三、殺國人皆曰可殺的陳奸誠。

四、殺摧殘東北民眾武力害死孔憲榮將軍的陳奸誠。

五、殺污蔑元首的陳奸誠（說我常批評總統所用之人）。

六、殺分化削弱國軍增強共軍的陳奸誠。

七、殺罪大惡極的陳奸誠（指整編軍隊而言）。

八、殺不自知其醜的陳奸誠。

九、殺對內內行對外外行的陳奸誠。

十、殺害總統於不義的陳奸誠（說我偏要擁護總統做專制領袖）。

十一、殺忘恩負義的陳奸誠。

十二、殺危險時詐病，太平時出風頭的陳奸誠。

十三、殺神經不健全的陳奸誠。

十四、殺婢妾姿態的陳奸誠（說我最嫉妒胡宗南、湯恩伯）。

十五、殺招搖撞騙的陳奸誠。

十六、殺私設特務的陳妍誠。

十七、殺淺薄迷信的陳妍誠。

十八、殺植黨營私的陳妍誠。

十九、殺擅作威福的陳妍誠。

這等於一封匿名信，原無重視的價值，然而它所暴露的，卻是不擇手段的傾軋，無所不用其極的醜詆。我是統帥部的幕僚長，招致到這樣大的誣讟，無論如何，我是應當反省的。不過共黨一向不擇手段，以及熱中權位的人，不可理喻，也是鐵一般的事實。自古至今，這般人可以原諒外在的敵人，但對於內在的異己則絕對不能寬恕。

我在這種空氣之下，當然不便再作出國就醫的打算。國防醫學院的人才設備，都臻上乘，他們也很有把握根治我的病，因而決定留滬治療。至此我的職責問題，必須作一解決，以便安心療養。我先當面請求總統（主席蔣公於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當選為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准我辭職，得其面許，然後於五月十日提出書面辭呈：

呈為呈辭本兼各職，以專責成，而便安心治療宿疾事。竊職荷曠世之殊恩，身任參謀總長，復兼東北行轅主任、海軍總司令、中央訓練團副團長，抱病以來，雖蒙各派代理，分別負責。一時之計，容屬可行。久則殊礙事機，上增鈞座之憂勞，不勝惶恐。故去年每次晉謁，屢陳悃忱，本年「寅東」、「寅卅」函電請辭，均未蒙准。茲根治宿疾，須動手術，手術之後，又須長期療養，雖於本月二日，蒙俯察愚衷，面賜矜全，但仍未見明令發表。值此戡亂正殷，軍機緊張，安危所繫，尤宜名不虛假，權責分明，以紓廛注，而赴事功。為此，再申前請，准予辭去本兼各職，公私俱便。

這以後我才得擺脫了名義上的負擔。

六月四日住入江灣國防醫學院。十二日施行手術，由上午十時開始，至下午二時始竣事，經過情形良好。但醫生堅囑以易地療養爲宜，因於十月六日飛來臺北，這是我到臺灣來的原委。

從十月六日起，一直到十二月底，政府任命我爲臺灣省政府主席之時止，這其間將近三個月的時間，可說是我平生所過最閒適的日子。也是我閉門思過的難得機會。我確實發現我的過錯很多，而修養太差，易於開罪人，更是我的大病。不過反覆想來，終覺我縱不肖，也不致招來像假名傳單那樣的肆口漫罵。有何怨毒，至於此極？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國大會場上對我的譴責，今日想來，也只可付之一笑，不過當事件發生時，眾口喧騰，是非莫辨，我倒真有點按捺不住。曾於覆林蔚文（林蔚）兄信中（四月十四日），發過一點感慨，申述一點意見，茲錄存原信於後，以供來日談助：

連日國大開會，代表中對於弟之詆毀與責難，於各報中閱之甚詳。國家乃國人之國家，正如兄所言。政治原屬卑污殘酷之事，吾人早已言及。古人所謂「大將方知報國難」一語，今日吾人所體驗者更爲明確。連日來弟再四思維，在此國家多難之秋，軍事極端緊張之時，正所謂風雨同舟，一般不顧及此，一意推卸責任，專心爭權奪利，恐非至同歸於盡不止。至於弟個人，非但毀譽早已置之度外，即生死亦從未計及。惟因弟而累及吾兄，極感不安耳。但吾人對於國大，無論如何，所可斷言者，多數代表絕無問題。而少數者，或出之於誤會，或激於國家危急，而真正無知識有作用或被人利用者，自更屬極少數。再退一步想，當九一八前夕，尚有石友三之稱兵作亂，與西南諸公出兵相應。甚至抗戰前夕，尚有軍閥發兵出動，傾覆中央之舉，與西安之事變，今日僅在會場上發傳單，與利用極少數無聊小政客搗亂，實在已不可同日而語矣。如大會中確能保持不傷及主席，能夠分謗分怨，亦份所應當。至於所提諸問題，亦不值一笑，茲分述如左：

(一)地方自衛：此問題姑置其無作用者不說，僅就政策言，改團爲警，並非吾人決定。既已決定，其責任自非吾人所能負與應負。去年六月下旬，中常會白先生對弟已有責難，當時立夫先生因此曾問過弟究竟如何，弟已告以政策與權責與弟無關。

(二)整軍：此問題之政策與原則，均在弟未到中央以前所決定。弟到中央僅負執行之責。而當時實際負責執行者，尚在陸軍總部。此事就政策言，絕對正確；就執行言，亦無多大錯誤。然今日反對整軍者，亦即當時反對中央不整軍之人。出爾反爾，所謂偽君子最難處，其指此輩之謂乎？弟尚記得，當時大家均認爲整軍絕對需要，但絕對困難，而不整軍，則絕對危險。一直至敵人打到貴陽，大家才下決心，與其坐而待亡，何如克服整軍之困難？但當時又誰肯任此勞怨？再檢討整軍：究竟裁了多少兵？實際上只是裁併機關與空頭單位而已。換一句話講，如不裁併機關與空頭單位，如何充實國軍？同時國家財政，如此困難，人民生活，如此痛苦，能否負擔七百二十萬人的虛額糧餉？

(三)收編偽軍：此問題當時確有人建議，但全部收編，事實上大有問題。以弟所能記憶者：(1)何以對抗戰之國軍？(2)何以對被壓迫殘殺之民眾？(3)何以維持國家民族之正氣？以上三項，姑且不論，再就軍費一項言，自抗戰結束後，決定國家總預算原則，所謂收支平衡，所謂軍費不得超過總預算百分之五十，以連年軍費言，非但不能收編偽軍，而且僅有之國軍，亦不能養活，其他可知矣。

(四)關於作戰方面：弟身爲幕僚長，就地位言，自應負責。但此中不能告人之事，實在太多。僅就山東與東北言，山東軍事失敗，莫過於新泰萊蕪之役，此役之計畫，究竟誰建議於主席，主席如何決定，弟在徐州，均無所聞。吾人絕不怨天尤人，應就事論事，吾人絕不願與偽君子計較耳。再就東北問題言，如要算帳，應由雅爾達三巨頭會議與政協會議算起，而軍事只能算是末節。總之，東北問題不要說弟身爲參謀總長並兼行轅主任需要負責，即就中國人立場言亦應負責。惟回憶當時，有主張放棄

者，有主張外交解決者，有主張指定區域，讓與共匪者，有認爲已成死馬，但不能不作活馬醫者。主張雖有不同，而爲國家作久遠之謀則一也。猶憶當時岳軍先生見告，已與主席決定，准天翼兄辭職，要弟暫兼。弟第一句即說：這救了天翼，害了我了。後因命令已發表，不顧成敗得失，只有前往。當時勸弟前往者，莫不以國人皆知東北爲死馬當活馬醫相勉，中國人最大精神在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弟深之是火坑，最後只有跳下去。但當時經再三請示主席，非即增加兩個軍，不能使在東北之國軍，能爭取時間，稍加整頓。（四平之役後，各軍均殘破不堪）當時主席已應允，決抽調兩個軍，增援東北。結果被人阻撓，僅遣將而不派兵。東北如此重要，爲一人之私，非但欲置弟於死命，而且不顧國家民族之存亡。長此以往，真不知國家被這般小人誤到如何地步也。（反對的理由，是大別山要緊，東北冬天，那能打仗？但大別山現在戰果如何？老百姓最清楚，而東北則已不可收拾矣。）

總之，弟今已成爲封建集團以及自私自利者之目中釘，在彼等對弟自非打倒不止，惟望彼等以捷克爲戒，不可造成中國爲捷克第二。（此點弟實有所聞，不知南京方面，有無發覺）假使彼等陰謀不能成功，以中國匪共手段之惡辣與高明，屆時彼輩縱欲如捷克外長，跳樓自殺，亦不可得也。弟決心跳出政治毛屎坑，然仍望彼等懸崖勒馬，以免國家民族陷於萬劫不復也。

是非有無公論，這話很難說。不過當時我所受的構陷和轟擊，至少在中華民國短短幾十年的政治史中是空前的。尤其在我避地養病中出此，簡直是落井下石。所以也很引起好多人的公憤，函電馳慰，紛至沓來。胡適之（胡適）先生來信說：「此次國大開會，我很感覺一大缺陷，就是您不在場。前年制憲的國大，您出力最多，收效也最大。今年國大會場上曾有人大罵您，但也有許多人著實想念您。」高惜冰先生等人來信說：「彼等少數淺燥之士，不存正義又不辨是非，絕不能代表東北人士之意見。」舉此可見一斑。

當國家危難之際，廟堂之上，黨同伐異，自古已然，然未有如此次國大會議之甚者。發言盈庭，致使軍事遷就政治，政治遷就謠言，非至軍心動搖，無可挽救不止，悲夫！

第六節 反攻復國機運的重建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二月二十七日成都淪陷後，除西康一隅猶有一部分國軍又繼續抵抗數月外，大陸國土已爲 共黨所奄有。共黨爲 患至此，不惟爲 千古未有之奇變，抑且爲 千古未有之奇聞。

由大陸各地陸續撤出之國軍，僅有少數流入越南及滇緬邊境，其餘大部均分別退守沿海島嶼，而以臺灣爲 一最大收容站。這些部隊及其指揮機構，紛歧龐雜，不可名狀。約略統計：有三個總司令部，十一個兵團級司令部，還有六十幾個軍。聲勢浩大，駭人聽聞，但究問一下戰鬥力，雖然未致完全喪失，可是所餘的也就很有限了。

我於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五日奉命主持臺灣省政，二月奉命兼任臺灣警備總司令，七月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奉命結束，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並命我爲軍政長官，其轄區爲臺灣及蘇浙閩潮汕沿海地區。因爲我有這些職守，對於收容整編撤出大陸部隊的工作，遂爲責無旁貸之事。整編部隊，招尤賈怨，我已有豐富而痛苦的經驗，但是不整編成嗎？有名無實的部隊，已經拖垮了整個大陸，更何有於這些一殘存的島嶼。

在整編中的部隊，是不能驅之作戰的。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八月，共軍陳毅部犯閩，劉伯承、陳賡等部分道犯粵，閩粵局勢，危在旦夕。臺灣與福建僅隔一寬約百餘里之海峽，閩粵不守，必將一鼓作氣進犯沿海島嶼，而以臺灣爲最後奪取目標，這是不成問題的。以共黨手段之惡辣，絕

不會讓我們有喘息的機會，更不會讓我們建立一個海上根據地，生聚教訓，作為將來反攻復國的基礎。

我於奉命主臺之始，即感覺責任過於重大，大陸局勢，一如巨石自高山滾下，決無中途停止之理。臺灣如倖能保全，則復興尚有希望，臺灣如與大陸同歸於盡，即無異宣告中華民國的死亡。當然我所想的也就是敵人所想的，敵人必將乘勝攻臺，人人知之。雖在婦孺，亦不例外。

我就在此時負起保衛臺灣的責任，教我如何不惶懼萬分！撤退來臺的部隊既不能用，原在臺灣部隊亦僅有孫立人所屬的一個師，及省政府一個旅，當得了什麼用？

其時總裁正在廣州，我即派人攜函恭請總裁返臺，以便就近請示機宜。總裁本擬飛渝部署西南軍事，於是臨時改變行程，遄返臺北，聽取我的報告。

我於陳述臺灣虛實後，擬請調兵增援臺灣。時大陸退集東南各軍，僅有劉安祺、胡璉兩個兵團，較有戰力，但均已調防廣東，無法抽調。本來這兩個兵團，是駐防海南島的，於政府遷穗後，五月間我曾到過廣州一次，有一天在陳伯南（濟棠）家裡晤及兩廣將領陳伯南、白健生（崇禧）、薛伯陵（薛岳）、余幄奇（漢謀）諸公，談及東南局勢，我說臺灣是一個眼，海南是一個眼，此兩地必須確保，始可以言恢復。他們說：海南沒有軍隊。我說：只要大家看法一致，山東劉安祺的部隊可以調來，糧食由臺灣供應。大家同意了，劉部遂開海南。我曾囑咐劉安祺，這是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所在，除了總裁的命令外，部隊不能亂動，胡璉部隊後來也去了。但當共軍犯粵之際，廣州卻倡出大廣州主義的口號，逼著總裁下令調劉、胡兩部赴援廣州，劉部正在海南部署清剿馮白駒，事遂中輟。我適於此時有調兵援臺之請，當然十分困難。幸好胡璉兵團共有八師之眾，國防部准其保留五個師，多餘三個師之糧餉補給，中央

未予以承認。我見有此機會，乃建議總裁准將此三個編餘的師調臺增防，一切糧餉補給，由臺省地方供應，一以減輕國庫之負擔，一以增強臺灣之戰力，當蒙總裁核可。

此時這三個師方駐防汕頭，於奉准調臺後，即令其移防金門。金門為在廈門以東約八公里之小島，全島周界約八十八公里。屬福建省金門縣。全縣除本島外，轄有烈嶼島（即小金門），及大小嶝等島嶼。全境多山，宜於構築工事。就防衛臺灣言，金門為一防衛臺灣海峽最理想之前哨陣地，能密切監視福建沿海共軍動態。就反攻大陸言，則為一登陸福建之踏腳石，極有助於建立灘頭陣地。廈門既非我有，金門萬萬不容再失。為了反攻復國，這是我們軍事上必爭之地。

而就共黨的企圖來說，攻略臺灣是他們一定要達成的目的，但不先占領金門，就很難進攻臺灣。所以在對金門作戰之前，他們提出來的口號是：

一、打下金廈，解放全閩。

二、打下金門，為兄弟部隊，奠定進攻臺灣之基地。

三、打下金門，為人民立下功勞。

四、打下金門，保證海上交通。

可見金門也是共黨軍事上必爭之地。

共軍於十月十七日竄擾廈門，二十四日黃昏即集結登船，於二十五日二時開始向金門進犯，於后沙、古寧頭間，強行登陸。守軍因眾寡不敵，陣地全被突破。正當緊急萬分之際，適我由汕頭移防金門之三個師開到，即時加入戰鬥，阻遏共軍攻勢。拂曉展開反擊，觀音亭山、湖尾鄉等處被楔入之共軍，經我痛殲，伏屍遍野，大部投降。

殘部竄古寧頭固守待援。經我海陸空軍及戰車之合力圖殲，共軍頑抗至二十七日上午十時，除生俘萬餘人外，其餘悉被殲滅。

此役共軍使用兵力，計八個團及其他特種部隊，共約二萬數千人。其進犯第一梯隊之三個團，係由共軍第八十二、八十四、八十五各師中抽調久經戰鬥之基幹部隊所組成，而各該師又為 陳毅部之精銳。此次用以進犯金門，勢在必得，結果竟至全軍覆沒。此為戡亂軍事發動以來，最成功的一次殲滅戰，中外觀聽，都認為是一大奇蹟。共軍經此挫敗，除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八二三」砲戰外，始終未敢再作擾犯金門的企圖。

十月二十五日為本省之光復節，例年均有慶祝活動，全省運動會亦於是日舉行開幕典禮。共軍適於此日進犯金門，可能含有打擊本省軍民士氣的作用，也未可知。這一天上午依例舉行慶祝會，我懷著沉重的心情，步上主席臺，念金門戰事的勝敗，關係臺灣基地的安危，使我心情更加沉重。而臺下十餘萬軍民同胞，都是和我同憂樂的，我正不知拿什麼話來慰藉他們才好，適侍衛告我前方有無線電話打來，接聽之下，知道金門痛擊犯敵，我軍已穩操勝算，這一消息，使我驚喜過望，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我回到主席臺時，剛好由臺南傳遞之運動會火炬，抵達主席臺前，我即當場宣布金門大捷消息。於是臺下歡聲雷動，踴躍鼓舞，歷久不止。平生經歷最動人的場面，未有過於此時者。

事後想來，凡事若有前定，假如不是胡璉兵團有這多餘的三個師，又假如不是總裁當機立斷，准我們使用這三個師增防金門，則金門必繼廈門之後為敵所據，是毫無疑問的事。金門不保，臺澎門戶洞開，則今日復興基地的臺灣，能否為我所有，可就很難說了。

繼金門大捷之後不數日，又有登步反登陸戰之勝利。這一次勝利雖不如金門之大，可是於旬日之內，接連造成兩次勝利，足以振奮士氣，恢復信心，自屬不言可喻。

登步是舟山群島中的一個主要島嶼，與舟山本島唇齒相依，故守舟山者必須守登步。

我登步守軍爲八十七軍朱致一部之兩個團。舟山最高指揮機構爲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所設之舟山指揮所，指揮官爲郭懺司令。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一月三日，共軍以優勢兵力向登步強行渡犯，守軍不支，一部陣地爲 敵所攻占。郭司令深夜以電話報告，擬放棄登步。我當即告以登步決不能放棄，登步放棄，則舟山諸軍均將成甕中之鱉，無可倖免。乃令其先將可能抽調部隊就近增援，我當由他處另派大軍馳援。翌日援軍開到，立即登陸反攻，敵亦頑強抵抗，激戰三晝夜，我軍在海空有力協同之下，卒將犯敵擊潰，登步得以確保。

登步無恙，舟山形勢遂益形穩固。直到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五月，我軍主動撤離舟山，敵人迄未敢逾越雷池一步。

金門登步之捷，本來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兵敗如山倒」這一有歷史性的觀念，賴此得以掃除。使我們重行相信「勝敗乃兵家常事」之語爲 不妄。我覺得「聞勝無驕」易，「聞敗無餒」難，金門登步之捷，證明兵敗之後依然可以獲勝，則聞敗無餒，也就沒有什麼難了。惟能聞敗無餒，乃可以再接再厲，愈挫愈奮，而使最後勝利必歸於我。所謂反攻復國機運的重建，亦即指此勝利信念之恢復而言。至於確保金門在軍事上的重要性，猶其餘事耳。

第五章 結 語

第一節 失敗的檢討

共產黨是以共產國際為背景的匪類，對抗共產黨的戰爭，早已成了自由世界共同的責任。這一戰爭的性質，不單單是軍事的，而且是思想的、科學的、生活方式的種種方面的綜合比賽。自由世界的反共戰爭，勝負究將誰屬？目前為時尚早，還不能遽加判斷。因之中國局部的剿共軍事，最後的勝敗，現在也仍在未定之天。本於一旅興夏、三戶亡秦的史實，自由中國的反攻復國，仍是大有可能的。

本節所說失敗的檢討，當然是就以往剿共失敗的檢討而言。

如以上各章所述，國軍剿共軍事，始於江西圍剿，繼之以邊區清剿，最後乃有全面戡亂之決策。江西圍剿與邊區清剿，國軍都曾獲得相當重大的勝利，但都未能斬草除根，致使漏網之魚，釀成後來的吞舟之禍，功敗垂成，實太可惜。全面戡亂期間，本來也是勝敗互見的，但是最後的勝利，則為共軍所獲得，我方幾於一敗塗地。所以本節所檢討的失敗，實際就是戡亂軍事的失敗。

從大陸軍事逆轉以來，至今已十有餘年，對於戡亂失敗的檢討，舉國上下，乃至友邦人士，都曾提出過極珍貴的意見，足供今後反攻復國的參考。我在這裡先拉雜的摘錄其中的一部份，以見一斑。

總統對於大陸失敗的教訓，有過很多深入而精闢的指示，美不勝收，錄其尤要者：

我們剿匪軍事所以遭致今天這樣的失敗，決非偶然：第一、因為我們國軍在抗戰期間，一致對抗外敵，忠勇犧牲，實力消耗，而且長期戰鬥，精神疲憊，共匪則在八年當中，逃避抗戰，擴充實力，處心積慮，專門研究，如何消滅國軍，如何推倒政府。所以他們認為抗戰勝利以後，以武力叛變，有必勝的把握；第二、他們認為我們高級將領，皆已養尊處優，成了軍閥，多半已年近五六十歲，個人都有家庭妻子兒女的牽累，和社會腐敗的環境，發生密切的關係，因之革命精神喪失殆盡，只圖自保實力，不能堅飭紀律，再來帶兵奮鬥，更不能萬眾一心，通力合作，發生協同一致的效

果。因此他可以各個擊破我們，消滅我們；第三、他看到國軍各級官長，平時精神萎靡，學術荒疏，自軍長以下，以至於連排長，大家都不研究學術和典範令，更不注意偵察敵情和地形，隨便擬定計畫，隨便頒發命令，而不能縝密研究切實準備，所以到處都是打糊塗仗，我審查過去各軍失敗的戰役都是由於所定計畫既不依照學理，而且違反原理原則，同時部隊與部隊之間，又不知互助合作，協同一致，以求彼此補救其缺點，發揮其長處；第四、他看到我們高級官長對於部下的基本動作，如瞄準、射擊、偵探、連絡，不去切實注意考驗，以致士兵戰鬥技術落後，不能作戰，加以軍隊的給養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飽穿不暖，而官長尚茫無所知。官長對於士兵視同路人，不但痛癢不相關切，甚至怕和士兵見面，不但高級將領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職，甚至連長階級大多數亦是如此。這樣上下生活脫節，自然情感毫無，官兵既然如此對待士兵，士兵不叛變、不逃跑已算很好，何能望其聽命犧牲？

大家都養成自保自足的惡習。祇看到自己帶領的一部的利害，對於友軍的危難，整個戰局的成敗，幾乎是漠不相關，以致我們革命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傳統精神和我們軍人智信仁勇嚴必備的武德完全喪失。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要與兇頑狡猾的匪軍作戰，決無倖免於消滅的道理。

以上均係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一日對軍官訓練團學員講。

匪我兩方比較，我們的一切條件都要勝過共匪，但是各將領必須記取一句格言，就是「師克在和不在眾」。在任何危急的情況之下，只要我們前後的將領，能夠協同一致，和衷共濟，則無論當面的匪軍如何兇頑，人數如何眾多，都可以被我們打敗，被我們消滅。反之如果大家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勝則爭功，敗不相救，那就沒有不被匪軍各個擊破的道理。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對軍官訓練團學員講。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在人力方面，我擁有三百五十萬人之正規部隊，而匪軍連民兵在內，不過五十萬人，在物質方面，我擁有以抗戰為基礎之一切資源武器與器材，及美租借法案與剩餘物資，並接收投降日軍之全部在華物資，而匪軍則僅居於一隅，賴就地取材，極為有限，在此種對匪處於絕對優勢之比例下，欲完全消滅共匪，實乃易如反掌之事，然而由於我各級幹部精神方面之頹廢，紀律之廢弛，人謀之不臧，與大軍政之不協調，乃使剿匪軍事毫無進展，反而江河日下，使匪我兵力消長，漸成反比，以致造成今日之形勢。

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八月三日講「對戡亂軍事之總評及訓示」。

今天檢討會中，大家曾經想到各方面的問題，但是對於失敗的真原因，並未加以徹底研究。大家也提到軍隊腐敗，政治貪污，但這些只是失敗時候的各種現象，而不是促成失敗的根本原因。我們要進一步研究軍隊為什麼會腐敗，政治為什麼會貪污？據我研究的結果，我們所以失敗，第一在於制度沒有建立，第二在於組織不健全。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一月五日講「國軍失敗的原因及雪恥復國的急務」。

大家還要知道：我們這一次革命之所以失敗，並非敵人真有許多大的力量打倒了我們，而是因為我們本身具備了許多失敗的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黨內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認為本黨已經失敗，不惜充當漢奸的走狗，為共黨賣力工作，來賣黨變節，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魚，弄得廉恥道喪，醜態百出，以致民心渙散，士氣墮喪，形成崩離析的局勢。……

其次，我們還有一個失敗的因素，就是我們組織不嚴，因此共匪的偵探更易滲透我們的內部，真所謂「無速弗屆，無孔不入」。由此偷竊機密的情報，製造無稽的謠言，威脅黨員的精神，加速我們的崩潰。以致我們幾百萬軍隊，並未經過一個劇烈的戰鬥，就為敵人所瓦解，無數精良的武器，都奉送共匪來殘殺我們自己了。」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三月十三日講「復職的使命與目的」。

國軍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於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五月戰敗自戕於孟良崗。在其死前數日，曾有一封呈報主席的信，對於檢討剿共失敗方面，頗有所見。內云：

職師退蒙陰後，匪乘我立足未穩，大部集結，期殄我於主力分散之時。幸我占取山地，集結迅速，未為所乘。惟進剿以來，職每感作戰成效，難滿人意。目睹歲月蹉跎，坐視奸匪長大，不誰積極予以徹底性打擊。以國軍表現於戰場者，勇者任其自進，怯者聽其裹足，犧牲者犧牲而已，機巧者自為得志。賞難盡明，罰每欠當，彼此多存觀望，難得合作，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匪能進退飄忽，來去自如。我則一進一退，俱多牽制。匪誠無可畏，可畏者我將領意志之不能統一耳。竊以若不急謀改善，將不足以言剿匪也。

國軍將領葉錕撤退來臺後，曾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提供幾點剿共意見，其一云：

今日軍事之失敗，在將領不在士兵，在全體不在個體。……匪之所以勝，除組織力外，另有兩個法寶，其一為統一之戰術思想，其二為統一之戰鬥作風。以言戰術思想，如林彪之一點兩面戰術，所有共匪各級指揮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個整套體系。以言戰鬥作風，匪則不打則已，一打就猛，一打就狠，一打就硬，而且是殲滅性的。我則應付命令，敷衍任務，投機取巧，避重就輕，而且無戰鬥意志與戰鬥目標。但戰鬥詳報，則信口雌黃，亂吹法螺。故今後欲戰勝敵人，必須建立統一的戰術思想與統一戰鬥作風，使其全體化、整套化。

國軍第五師副師長余有壬，於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二十六日曾有信給我，其中有一句很扼要的話說：「一切問題均以貪污為焦點。」

國防部監察局上士文書陶文卿，於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向我投書言事，中有云：「將領中之貪污一日不除，則百姓一日被其毒，軍隊紀律敗壞，由於將領之貪污。」

國防部參謀次長林蔚文（蔚）兄，於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四月二十一日來信，也有一句要言不煩的話：「制吾人死命者為 經濟。」

有一位潘廣祺先生多次向我投書言事，三十六年三月一日函中有云：

共匪係純經濟戰鬥團體，其總方略為：使用軍事政治經濟各種手段，加速國民政府及所轄區域內官民經濟總崩潰。政府財政破產，所有軍政各費均無從籌措，雖有精兵良械，亦必不能作戰，政府自然倒台。

前美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巴爾，於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三月十六日答記者問：「中國國軍潰敗於中共者其原因如何」云：

中國國軍喪失其自信與戰鬥意志，並以失敗者自居。余不信蔣總統號令下之軍隊以缺乏作戰物資而失敗。官兵喪失其士氣有下述理由：

1. 軍隊領餉時所獲之金錢已大貶值。
2. 糧食不佳，戰區尤甚。
3. 根本談不到衛生醫藥勤務。
4. 訓練不足，有才從農村徵來即遣赴前線者。
5. 無條例規定征屬待遇。

「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是在中美兩國友好關係存在時，美國政府發表的一種極其背乎外交常態的文件，其中批評國軍失敗，雖然顯得太不客氣，但也足資吾人警惕：

中國政府之失敗，並非由於美援之不足，據我方在當地的軍事觀察員的報告，國軍在關係重大的一九四八年期間，沒有一次失利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方的觀察人員，早在戰爭初期，已於重慶發現腐敗現象。此一腐敗現象，已將國民政府之抵抗力量，斷喪殆盡。……

國軍已無須被人擊敗，他們已自行瓦解了。

司徒雷登大使於其所著《旅華五十年記》中，述說他對於國軍失敗的看法是：

一、國民黨的真正目的，原在建立一個西方式的民主政府，……蔣先生曾渴望實行這種改革，但當繁忙的軍政問題使他不克分心他顧時，種種舊的惡習又都死灰復燃。

二、逐漸惡化的通貨膨脹，與繼之發生的經濟崩潰，不滿的情緒乃告爆發。

三、許多離心的政治領袖與軍事指揮官，實際上都在陰謀反對蔣先生。其中有些人與共黨暗中勾結，他們增加了局勢的紊亂和對蔣先生的背叛。

因有以上因素，使蔣先生的威望逐漸喪失，才招致了大陸的失敗。

以上所錄已多，國軍是怎樣失敗的？我們應不難得到一個清楚的認識。

我自己也還有一些補充的意見，不妨一併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共軍之基本思想在求戰、求兵、求食。其指導原則在把握主動、活動、機動，以困我之點，斷我之線，控我之面。為實現這些思想與原則，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就

是行動輕快。如何才能行動輕快？又必須以減輕負擔爲前提，諸如守土的負擔、保民的負擔、保家的負擔、保產的負擔等等。自古至今，大凡爭天下者負擔少，守天下者負擔多，形勢使然，無可如何。戡亂軍事，我守而敵爭，亦爲先天注定之形勢，則主動、活動、機動，在敵易而在我難，因之困點斷線控面，遂成必然之結果。兵、食之源皆出於面，敵能控面，自然可以足食足兵。反之，兵力既捉襟見肘，餉糈又難乎爲繼，則一般不肖將領，方避戰之不暇，那裡還有協同友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勇氣？事至於此，雖使孫吳復生，恐怕也沒有打勝仗的把握。

二、大陸失敗，原因複雜，不可以一端論。但共產黨攻心戰術一直攻到我們大本營裡來，我們的參謀次長劉爲章（斐），就是爲共黨工作的，我們都被蒙在鼓裡，這樣的剿共軍事，還想要不敗，能嗎？劉爲章本爲桂系謀士，小有才，所以讓他當參謀次長。此人巧言如簧，最能先意承旨。我當參謀總長，常到各戰場上去，內部完全由他操持，全盤軍事幾無機密之可言。徐州方面，原由薛伯陵（薛岳）主持，因爲他挑撥離間，才換了人。薛伯陵如在徐州，徐蚌會戰決不會垮得那樣快。徐蚌一敗，大局遂愈發不可收拾。據說：毛澤東某次介紹劉爲章和高級共幹見面時，曾誇獎他是第一功臣，則此人關係之大可知。

三、陸宣公（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粗陳當時六事之失，我覺得對於我們大陸失敗情形，頗多吻合之處，誌其要點如後：

1.措置乖方：謂勝敵必先練兵，練兵有攻討之兵，有鎮守之兵，不可混爲一談，混爲一談，則乖其用。我曾主張將剿共部隊分爲三種：（一）進剿部隊；（二）防守部隊；（三）清剿部隊。三種部隊之編制裝備訓練，因需要不同而異，亦即此意。但因隔於種種阻力，卒未果行。此亦可作爲我自己德薄能鮮之一證。

2. 課責虧度：馭眾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眾，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這一段話和張靈甫的上主席書，很有相似之處。

3. 財匱於兵眾：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故兵多是財政破產的根源。半以事邊，尚且如此，何況十之七八的收入是軍費呢？

4. 力分於將多：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阝，眾散為弱，斯乃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欲令齊肅，其可得乎？

5. 怨生於不均：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

6. 機失於遙制：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遂令分闔責成之戰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凶靖難則不可也。

總之，大陸失敗是由於主義不行，以致千瘡並潰、百病齊發的結果。以上所言都不過是列舉其大端而已，歸咎於某一個人，或是某一件事，都不免有所偏失。我們應當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過在當政者負的責任更大罷了。

第二節 今後的展望

大陸失敗後，臺灣成了復興基地，剿共軍事，自然應當進入另一個新階段。這一新階段不能沿用全面戡亂的舊稱，「圍剿」、「清剿」，更不適用。新階段的新名稱，最恰當不過的就是反攻復國。

反攻復國也就是總統所說的我們今後革命的「第三期任務」。

這第三期任務怎樣才能達成？總統曾有很多寶貴的指示，而最重要的就是必須建立「分層負責」的行政制度。總統對於第三期任務的達成，具有絕對的信心。而共產黨的倒行逆施，殘民以逞，越來越變本加厲，無所不用其極。大陸人民忍受暴政的毒害，已到了無法再忍的地步。所以就目前的形勢看，共產政權在「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歷史鐵則之下，即使我們不反攻，它也會自行崩潰的。那麼內潰和反攻互相為用，共黨必亡，是一定的道理，祇是時間上的遲早問題罷了。

因此，今後的展望，光明樂觀，絕對不成問題。

但是爲了計策萬全，爲了集思廣益，我曾提出過四句口號，與黨中同志相切磋，這四句口號是：

立不敗之地，

策必勝之謀，

存戒懼之心，

行冒險之事。

所謂立不敗之地云者，即確保臺灣海峽，力求本身健全之意。

臺灣（包括金門、馬祖）雖是幾個蕞爾小島，但已成為反攻復國的基地，基地是不能動搖的。基地猶如草木之根本，所謂「根深葉茂」、「本固枝榮」者是也。十餘年來我們在臺灣的苦心經營，益以友邦的有力支援，在國防方面，已屬十分鞏固。對於確保臺灣之要求，我們已有絕對的把握。

在力求本身健全方面，關涉的問題很多，舉凡政治經濟文化各項設施，無不可以影響本身之健全。欲求事事之盡如理想，當然不無困難，但當發現有不合理想之處，一方面要不文過飾非，一方面要有接受批評的雅量，自能諂諷善道，而日近於理想之域。各項設施之日近理想，為力求本身健全之最捷途徑。孟子盛倡「仁者無敵」之論，「仁者」就是本身健全的施政者。「無敵」就是立不敗之地的意思。我們於鞏固臺灣的防禦之外，更力促各項設施的近於理想以求本身之健全，尚何患共黨之猖獗不滅呢？

所謂策必勝之謀云者，即反攻登陸，必先周詳策劃，不使稍有疏失之意。

就整個大勢講，我們反攻大陸的戰爭，正是戡亂戰爭主動被動形勢的易位。在戡亂戰爭中，我方因負擔太重，備多力分，故把主動的優勢輸給共軍。但反攻的時機到來，登陸的時間地點，可任憑我們選擇，以後進退攻守，我們也有較多取捨的自由。故前此我們的負擔，都成了敵人的負擔，主動之權，我們可以不爭而自得。主動是軍事上勝敗的關鍵，人人知之。姑捨「仁者無敵」的道理不談，既就主動被動易位一點而言，則前此敵人怎樣擊潰我們的，我們此次也會怎樣擊潰敵人。

在這種絕對有利於我們的大勢之下，如一開頭再打幾個有聲有色的勝仗，則先聲奪人，我們即可穩操最後勝利之券，實屬不成問題。

軍事的成敗，和民心的向背，有決定性的關係，這也是家喻戶曉的道理。但民心反共，卻不一定向我，縱向我也未必能助我，這一點卻不可不知。我在江西剿共時，

即曾有此經驗。江西人民初則怨我而迎共黨，繼而無不恨共黨刺骨，但他們雖恨共黨並不助我而助共黨，因為他們怕共黨，甚至連話也不敢和我們說。他們深深知道共黨和我們的作法不同，人民幫了共黨，被我軍捉著，大不了治他一個人，如人民幫了我，被共黨捉著，就要株連全家。這就是人民恨共黨卻還要助共黨的理由。今日大陸之共黨，對於人民的控制，其毒辣嚴密，遠非盤據江西時代所可比擬。則我軍剛一登陸，就希望出現「箪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場面，恐怕是一種太天真的想法。那麼打幾個先聲奪人的勝仗，實在是必要而又必要的。

登陸的時間地點，關係最為重大，應以能使三軍集中發揮力量為決定標準。開頭幾個勝仗打下來，大陸同胞有了信心，然後希望他們起而響應我軍，才當真成為可能。我軍既為民心之所歸向，復有民力為之後援，其必所向無敵，勢如破竹，乃可斷吾。大陸失敗，也不過失敗在幾個大會戰上。反攻復國之戰，於先聲奪人的形勢既成之後，再打幾個有決定性的大會戰，捕捉敵人主力而一一殲滅之，我想我們光復故物，也不過就是一兩年時間之內的事。

所謂存戒懼之心云者，即時時要作最壞的打算，不可一得自滿器小易盈之意。

語有之「勝敗兵家常事」，其故安在？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兵家勝敗亦猶是也。勝而驕，驕則必敗；反是，敗而哀，哀則必勝。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敗兮勝之所倚，勝兮敗之所伏。反攻登陸，先聲奪人之戰，我相信可能性非常之大，但如何保持先聲奪人的聲光，使其歷久不衰，這就要看我們能否經常提高戒懼之心以為斷了。

經常提高戒懼之心，是保持和擴大勝利成果的不二法門。唯能戒慎恐懼，才可免於一得自滿器小易盈的毛病。滿則損，盈則虧，我們古聖先賢，對於這種道理的垂教，可謂美不勝收。可惜我們為後世子孫者，能夠知所警惕的實在不多。譬如抗戰勝利

後的「接收」而成爲「劫收」，就充分表現我們一種得意忘形的醜態。一般文武官員的驕奢淫佚，寒透了收復區歸向祖國的民心。像這樣的勝利者，不敗何待！不亡何待！

得意不要忘了失意，勝利不要忘了失敗，自然時時能作最壞的打算。時時能作最壞的打算，則戒慎恐懼之心自能油然而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則「操心也危，慮患也深」，夫然後勝利的果實，才能確保，也才能擴大。

更進一步說，兵兇戰危，「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戒慎恐懼，是兵家必備的條件。勝而驕，是無異以殺人爲樂，驕而至於放辟邪侈，無所不爲，尚能說他是有人心的人嗎？

所謂行冒險之事云者，即反攻復國之戰，要有充沛冒險犯難的精神，不斤斤計較於公算觀念之意。

普通謂有形戰力的比較，就是公算。地大、物博、人眾，則戰勝的公算多，反之，則戰勝的公算少。這種觀念，是純唯物主義的觀念，西方人多主之。假如我們也引以爲同調，則敵之公算多，我之公算少，反攻復國之戰，遂根本成爲不可能。

不過，以寡擊眾，以弱敵強的戰爭，不但歷史上儘多先例，不遑枚舉，即就我們親身經歷的事實，如東征、北伐，都是在眾寡強弱懸殊的情形之下進行的，強大的軍閥們，並不足以當寡弱的革命軍之一擊。可見唯物主義的公算觀念，實在沒有斤斤計較的必要。

我覺得真正的所謂公算，於物質條件之外，精神條件是十分重要的。精神條件的領域，也很廣泛，這裡不想多說，但冒險犯難的精神，確實是最重要的一種。冒險犯難的精神，是合「敢戰」、「戰志旺盛」、「士氣高昂」而一之的一種精神。這種精

神在攻勢戰爭中關係特別重要。前美軍顧問團團長巴爾，批評戡亂軍事的失敗，是因為國軍戰鬥意志的喪失，這話不為無見。可知西方人也不完全都是物質主義者。戰志喪失既可使戡亂失敗，則以此戰志喪失的部隊反攻復國，將何以異於以卵擊石？

所以冒險犯難精神的提倡，是反攻復國軍事行動的先決條件。

以上就是我所提出有關反攻復國四句口號的解釋。要而言之，求人不如求己，這四句口號，都是以求己為本務的想法和作法。「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我很服膺這幾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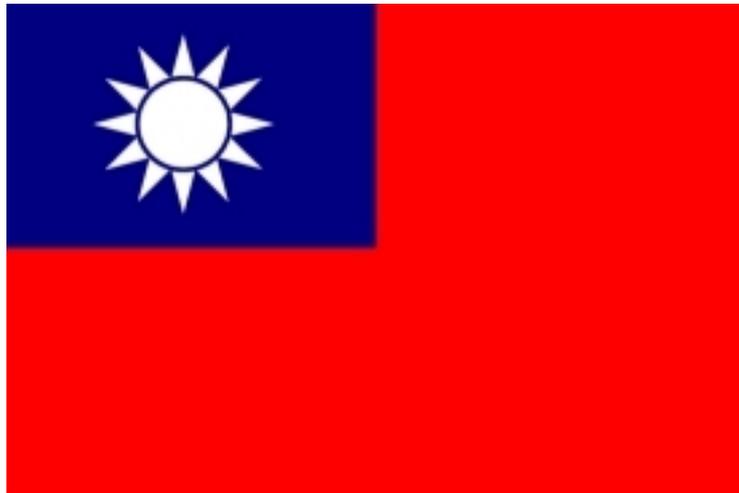
我們人人都能不怨天不尤人，痛切的反省自己，刻苦的砥礪自己，則今後反攻復國的展望，實在沒有稍涉悲觀的理由。

有一幅聯語說得好：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沈舟，百二秦關終屬楚；

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竟吞吳。

有為者亦若是而已。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